

# 天山雄鹰

——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

中国文史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一章 第一次见面

- 优秀青年.....( 1 )
- 天资聪慧.....( 6 )
- 不辞而别.....( 8 )

## 第二章 充满希望的年代

- 追求.....( 13 )
- 关怀.....( 17 )
- 幼苗.....( 20 )

## 第三章 “叛逆”子弟

- 流放沙湾.....( 26 )
- 青年教师.....( 29 )
- 智退彩礼.....( 32 )
- 卷烟纸.....( 35 )

## 第四章 一心为革命

- 结识朋友.....( 39 )
- 伊犁河畔.....( 43 )
- 组织起来.....( 46 )
- 寻找道路.....( 52 )
- 和幼儿谈心.....( 57 )

## 第五章 在风浪中搏击

- 攻打伊宁·····( 66 )
- 新的斗争·····( 70 )
- 革命的目的·····( 74 )
- 斗争受挫·····( 78 )

## 第六章 毅然和爱然

- 情爱初萌·····( 85 )
- 情丝不断·····( 89 )
- 阳光下的冰块·····( 93 )
- 遗嘱和誓言·····( 98 )

## 第七章 披荆斩棘 继续前进

- 斗争在继续·····(107)
- 建立新的组织·····(109)
- 送瘟神·····(113)
- 同大土耳其主义分子的斗争·····(115)

## 第八章 为维护和平条款而斗争

- 和平谈判·····(123)
- 击溃乌斯满·····(126)
- 针锋相对·····(131)
- 抵制麦斯武德·····(135)
- 支持吐、鄯、托人民起义·····(139)

## 第九章 南京之行

- 时机到了·····(146)

去梅园.....(148)

返回新疆.....(162)

## **第十章 坚强的革命战士**

旗帜鲜明.....(164)

调整民族关系.....(166)

迈入新的历史阶段.....(176)

## **第十一章 为了光明的明天**

在赛力木湖边.....(182)

和老牧民谈心.....(189)

北京喜讯.....(194)

伟大的历程.....(199)

烈士精神永存.....(201)

## 第一章 第一次见面

### 优秀青年

我和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第一次见面是在1937年7月。他还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呢。闹不清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祖辈曾作为俄国公民，生活在现今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一个叫哈拉库里的地方。我父亲在较早的时候迁回了自己的故乡阿图什。

阿巴索夫的父亲名叫阿西木阿克萨卡力。他比我父亲稍晚一些，于1926年8月也携带家眷和许多亲戚一起迁居到伊宁（以后又迁居到乌什县）。我们这两家不相认的亲戚第一次偶然相遇了。

1937年7月，我们在苏联塔什干学习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结束了学业启程回国。我们取道巴克图卡，回到我国的塔城。因那时发生了所谓的“南疆暴动案”，当局把所有的汽车统统调往南疆对付“暴动”。塔城行政专员公署安排我们搭乘马车去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报到。

我们这批共98名留学生分乘25辆俄罗斯马拉货车（新疆称六根棍车），从西北方向往东南方向，取对角横贯准噶尔盆地，开始向乌鲁木齐进发。

我们进入准噶尔盆地的時候，若干世纪以前发生在准噶尔盆地的一幕幕壮观的历史长剧，在我和同学们的直观中似乎没有露出任何痕迹。

我出生在塔里木盆地西缘的阿图什县。沙漠，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但是，准噶尔盆地这样浩瀚戈壁的气势，我却是第一次领略。它是那样的辽阔、广袤、沉静。如果不是偶尔看到成群的黄羊狂奔而去，真使人有一种进入生命绝境的感觉。

12天以后，我们总算走出了准噶尔盆地，到达安集海。这里地处天山北麓。这个地名虽然缀有一个海字，但是它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发源于天山的一条河流。沿着河流自北向南有一条约5公里长的自然林带，其间林木葳蕤，绿草如茵。这里是北疆交通干线伊犁——乌鲁木齐公路与塔城交通线交错的地方。

经过12天的戈壁之行，突然来到这样一个境地，真使人产生一种神游的感觉。顿时，同学们一个个雀跃欢腾，精神大振。车停下以后，我和赛甫拉也夫直奔附近的一家哈萨克族毡房，打算买一只肥羊。喀迪尔·艾山留苏前在军队里当过小军官，善于指挥，也乐于指挥别人，于是在他的领导下立即形成了一支后勤队伍。艾拜杜拉·热瓦杜拉负责点篝火。这样一来，这个一向喜欢大声疾呼的艾拜杜拉，不停地向四散寻找柴火的同学们发出指令。当我和赛甫拉也夫从哈萨克族毡房附近将一只两岁的壮羊连拉带

推。牵到篝火附近时，艾拜杜拉已经点燃了篝火。吊锅早已支起。在喀迪尔·艾山的提议下，由我操刀宰这只羊。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剥皮、肢解都已就绪，我洗净了手上的血迹和油腻，对艾拜杜拉半开玩笑地说了声：“肉熟了以后不要忘记叫我赛福鼎一声。旅途上独吞伙伴的食物，是要进地狱的。”

我拿上从不离手的《普希金诗集》，踩着河里的石头，向倒卧在河里的一根粗大的树干走去。坐在树干上将双脚泡在河水里，想打开诗集，又觉得心绪烦乱，想到阔别多年的母亲和兄妹，想到未来的生活道路。还有，在苏联听说新疆的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塔城处处感到人们的心情都很压抑，有些耳闻更使人忐忑不安……约莫过了半个小时，突然传来艾拜杜拉闷雷般的呼叫声：

“赛福鼎！”我下意识地认为这是肉熟了的信号，于是一跃而起，蹚着河水，上了河岸。只见同学们在篝火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车夫们有的在收拾马车，有的在喂马，吊锅里冒着热气，根本不是肉熟的样子。我正茫然的时候，赛甫拉也夫斜卧在草地上用手指了一下河边的一个小伙子对我说：“是他在找你。”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年青人。不等我开口，他就跨前一步，右手抚胸，恭敬地对我说：“真主保佑您。”发出的是标准的阿拉伯读音。我还礼以后认真地问：“这位兄弟，我怎么称呼您呢？”小伙子说：“我叫阿布杜克力木，是阿西木阿克萨

卡力的儿子，阿巴斯是我的祖父。”说到这里我立刻明白了，他原来是我的亲戚。这是我回国后遇到的第一位亲戚，由衷之情自不待言。阿巴索夫在乌鲁木齐读书，这时正返伊度假，路过此地打尖休息时，遇到了我的那些四处奔波寻找干柴的同学。交谈中，知道我们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阿巴索夫知道我今年毕业，一打听，果然我也在这里，于是找到了我。

我们席地而坐，我向他问候了他父母之后，立即打听我在伊宁谋生的哥哥的情况，打听我所能想起的伊宁的每一个亲戚朋友的情况。但是，我很快发现，阿巴索夫在非常简短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立即接连问起苏联的情况，问起苏联人民的生活，还问起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集体农庄的情况。使我吃惊的是，这些提问和阿巴索夫的年龄与文化程度，相距太远了。对于这些提问，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讲的每一个细小的事儿，都使阿巴索夫着了迷。尤其是当我讲述苏联人民当家做主，生活幸福和蓬勃发展的苏联文化教育事业时，阿巴索夫感慨地说：“苏联人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也应走苏联人民的道路。”接着他突然问我有没有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回来。特别是当他提到《资本论》、《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这些经典著作的书名时，我不禁大为惊奇，这个初中生怎么会知道这些书名！

我在国外数年，对新疆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尤其是对



于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卓有成效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少。不久以后我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阿巴索夫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完全是我党在新疆卓有成效的工作的体现。

阿巴索夫的提问不由使我认真起来，我说：“我带回来的这些书都是俄文和乌孜别克文的，你能读懂俄文和乌孜别克文吗？”

阿巴索夫惋惜地一笑，说：“可惜得很，我读不懂俄文，乌孜别克文倒是可以读懂。”他停了一下，接着说：

“有汉文的吗？我能读懂汉文。”听说他能读懂汉文，又使我大吃一惊，情不自禁地问：“汉文你真的能读懂吗？”

阿巴索夫轻轻点了点头，颇为自信地说：“我正在汉文学校省一中读初中。”听了他的解释，一种钦佩之情由衷而起。因为，当时在许多维族学生看来学会汉文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打开书箱，取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国家与革命》、《母亲》等书给他。阿巴索夫如获至宝，把书双手捧在怀里，非常激动。这一情景使我至今难忘。

“阿布杜克力木，上车啦！”一声呼唤打断了我的遐想，也打断了我的谈话。阿巴索夫回头看看纷纷上车的伙伴，惋惜地说了声：“赛福鼎大哥，再见啦！咱们后会有期！”“乌鲁木齐见。”我依依惜别地应了一句，又叮咛说：“到伊宁后向阿西木大叔问好；向哈希汗姨妈问好；向亲戚们问好！”阿巴索夫应了一声“一定”，转身

向马车奔去。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背影。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的脑际，方才他提到的问题，远不是象他这样年纪的其他年轻人所能关心和理解的。……

和阿巴索夫的初次接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一再想，这个稚气未脱的青年，怎么知道什么革命、哲学、无产阶级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派到新疆来工作的同志们辛勤工作的成果。而我由于在国外多年，加之当时反动当局的封锁，根本不知道我党在新疆进行的卓越工作。

## 天资聪慧

当我第一次见到阿巴索夫时，尽管我们的谈话是短暂的，可是他的言谈却感染了我，使我强烈地感到他求知欲强，上进心切，思想敏锐，抱负远大。他这些特点，磁石般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才华卓著的青年。

阿巴索夫的才华，可以从他那熠熠闪光的双目中，从他那试图对人和事的了解和探索中，从他独特的见解中明显地看出来。他从留学生中寻找我不仅仅是认亲戚，显然，他寻找我的主要目的，是想从我这儿听到革命道理，向我索取在新疆找不到的理论书籍。瞧，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青年竟如此渴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德啊！

我和阿巴索夫第二次相遇，已经是相隔六年之后的1943年了。从此直到1949年他不幸遇难，我都和他生活在一起。这时的阿巴索夫尽管还很年轻，但是因为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帮助，加之他自己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在很短时间里，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成熟的人。阿巴索夫已由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青年，成长为组织和发动一场在新疆史无前例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这时的阿巴索夫，既是我的同志又是我的亲密战友，在共同生活、学习和斗争中，我和他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莫逆之交。

1943年，三区革命的发动工作已经开始<sup>①</sup>。准备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三区革命的成败。在这个关键时刻，阿巴索夫从造革命舆论，到组织武装力量，做了大量工作，为三区革命的成功，做好了思想和物质准备。从打响三区革命第一枪后，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中，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伊斯哈克拜克·穆努诺夫、达列里汗·苏古尔巴也夫等同志一起，坚决粉碎了反动宗教上层分裂祖国的阴谋；勇敢地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果断地纠正了三区革命初期出现在民族关系上的一些失误；热情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宣传了毛

---

<sup>①</sup> 三区为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专区。1944年11月，伊宁爆发革命暴动，组成民族军队，消灭了原国民党驻军，先后占领以上三区；日本投降后，民族军发动进攻，一直推进到玛纳斯县的玛纳斯河西岸，距乌鲁木齐不到100公里。

泽东思想,并且积极主动地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三区革命。1949年,党中央派邓力群同志去伊宁,同三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通过三区和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取得直接联系,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8月,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达列里汗、罗志等同志,应毛主席、党中央的邀请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临行前夕,阿巴索夫在我的家里与我通宵畅谈。谈到激动处,他神采飞扬,一跃坐在我办公用的写字台上,大声地说:“曙光已经照亮中华大地,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领导下建设新新疆,建设新中国!”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敬仰。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彻夜长谈竟成了我们的最后的诀别。

新疆人民、全国人民过早地失去了一位优秀儿子,这对新疆人民和全国人民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 不 辞 而 别

在安集海,我和阿巴索夫告别时,曾说了一句:“乌鲁木齐见。”当时,我的目的地是乌鲁木齐,阿巴索夫去伊宁度完假后,也将返回乌鲁木齐。按理两人同在一地,

经常见面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情况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其时盛世才全力以赴对付“南疆暴动案”，在乌鲁木齐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不准人们集会，会亲访友也受到种种限制，特别是和“叛逆眷属”的成员会晤、交往是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整个乌鲁木齐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我到乌鲁木齐后数月，始终无法和阿巴索夫取得联系，我连他是否返回乌鲁木齐都不清楚。嗣后我便被派到塔城去了。

我们的马车队经过艰苦行程来到玛纳斯。盛世才的一位副官长率领几辆卡车专程来玛纳斯接我们。换乘汽车后，我们个个精神振奋，喜笑颜开。我们终于来到乌鲁木齐。当天，教育厅厅长孟一鸣在西公园设便宴接待了我们，也许这是盛世才对我们的“关怀”吧。但是，从孟一鸣的讲话中，我们领略到了政府对新疆局势的看法和对我们的要求，他说：“新疆的社会是安定的。在伟大领袖盛督办的领导下，我们平息了由帝国主义挑起的南疆暴动。麻木提师长已叛逃国外。现在，我们正在清除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在伟大领袖盛督办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从苏联学习回来了，今后你们要在伟大领袖盛督办的领导下，坚持执行六大政策，同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在新疆的走狗作坚决的斗争……。”

两天后，盛世才在自己的寓所——东花园的客厅接见了我们。看起来，他态度和善，说话平和。但他对我们提

出了更明了、更严格的要求，如果违背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心里不禁有惶恐之感。我们就是以这种思想和心情走出了客厅。这就是盛世才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盛世才的告戒并未就此结束，他还给我们上了两个多月的“课”，每周讲一二个小时，其他时间让我们讨论。

乌鲁木齐的局势日益紧张，不少人因受“南疆暴动案”的牵连而被镇压。紧接着又清洗了“帝国主义的间谍”，大规模逮捕“民族主义者”和“叛逆者”。结果，不少平白无辜的人相继被捕入狱或遭杀害。不久，哈密人民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霍加尼牙孜阿吉也被捕入狱。乌云笼罩了整个乌鲁木齐。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第一次镇压阴谋。

这个时期，盛世才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武装镇压，大规模捕杀无辜群众；另一方面又开展了比较进步的运动，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盛世才的所作所为，究竟哪些是真的？引起了人们的疑虑。

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在我们这些富于想象，以远大抱负留苏回来的青年中（在我们之前，第一批已有100多名青年留苏回国），比较普遍地产生了疑惑和失望情绪。但是，有些情况也使我们得到某种安慰。譬如：苏联和盛世才保持着友好关系，对盛世才推行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苏联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有不少苏联人以顾问身份在盛世才身边和其他部门工作，在执行镇压的公安部门中也有

苏联顾问。1938年，盛世才还去过莫斯科，据说斯大林对盛世才还以礼相待（一般无足轻重的人是不可能跨入斯大林的门禁的），等等。

在当时，我们这些留苏的青年都带着信赖苏联政府，崇拜斯大林的思想回国的，在新疆还有不少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存在这样一种信念，凡是苏联政府特别是斯大林支持的，都是对的，因此，盛世才和他的事业是不会错的。

盛世才另一个欺骗手法是，他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写信要了不少共产党的干部来新疆工作。这些同志来后，除少数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外，多数人被派往文化教育和宣传部门工作。这个时期，在报刊上，在大学的课本里，以及在一些会议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以及支持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也多起来了，甚至盛世才也亲自出马大搞欺骗性宣传。他说什么：“三民主义不能救人民。能够解放人民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我们现在的《反帝会》，就是以后将要成立的共产党组织的前身……”，等等。

以上，就是我们从苏联学习回来以后的新疆形势。一方面是欺骗，一方面是镇压。在社会上，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大搞特务活动，严密监视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少数民族进步知识分子的言行。凡此种种，在人们中间造成了互相猜疑、互相戒备的疑虑心情和生怕被捕、被杀的恐



惧心理。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叛逆眷属”的顾虑则更为严重（当时被捕的人统统都被指控为“叛逆者”。“叛逆眷属”要么被流放到偏僻的地方去，要么就地严加监视。由于阿巴索夫的父亲被抓，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弟弟被抓，所以，属于“叛逆眷属”的阿巴索夫和我，也就是在这样的监视下，陷入惶恐不安之中）。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我无法在乌鲁木齐寻找阿巴索夫，同样他也无法寻找我。在我去塔城之前，先是派我去师范学校教书，过不久，又派我去报社工作，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又派我去塔城工作。实际上这不是派我去工作，而是流放我。我要离开乌鲁木齐了，越加牵挂阿巴索夫的安危。临走之前，我鼓起勇气，偷偷去找在《反帝会》杂志社编委会工作的伊敏诺夫买买提。我问他：“能不能找到阿布杜克力木？”他悄声说：“你最好不要找他就走。”他和我，和阿巴索夫都有些亲戚关系。他的父亲也被抓了，也是“叛逆眷属”。可以觉察出来，伊敏诺夫的话包含着对我的警告。

就这样，我和阿巴索夫第一次见面分手时说的在“乌鲁木齐见”的希望，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 第二章 充满希望的年代

### 追 求

1936年，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乌什县小学。当时盛世才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尚未完全暴露；相反，在中国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推动下，新疆的各项事业，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即便是有着这样好的机遇，阿巴索夫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仍然是个大悬念。因为当时乌什县大部分维吾尔族家庭不愿意在孩子毕业于国立小学之后，继续让他们攻读所谓的新式学校，而愿意将孩子送进宗教学校去学习。阿巴索夫小学毕业后，一心想升入中学继续自己的学业，但是，乌什县中学的教育水平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渴望去教育水平较高的学校学习。要实现这一愿望，他就应去乌鲁木齐，有可能的话，最好去苏联求学。去苏联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政府官员的子弟，或者官员亲友的子弟，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否则，就是妄想。总之，要有靠山或者门路。对不少青年人来讲，光有这一靠山和门路还不行，还要取得父亲和家庭的同意和帮助。

这一次，阿巴索夫完全得福于他的父亲。他父亲阿西木阿克萨卡力，早年在侨居俄国期间曾做过管理中国侨民的工作（当时，中国设在俄国的使领馆，一般都是从侨民中选择有威信、有能力的人员管理侨民工作）。他处事秉公，为人耿直，颇受侨民拥戴，因而被人们尊称为“阿克萨卡力”<sup>①</sup>。阿西木阿克萨卡力在侨居俄国期间，无疑是受到了当时苏联的进步思潮的影响。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阿巴索夫的愿望得到了他父亲的完全赞同。除此，在1930年爆发的人民武装暴动期间，阿西木阿克萨卡力曾和霍加尼牙孜阿吉以及其他几位暴动头目相识，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位开通的父亲不顾亲友们的议论，毅然将儿子阿巴索夫送往乌鲁木齐读书。

阿巴索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乌什。从乌什到阿克苏的路上，我茫然地看着缓慢转动的车轮，意识到车轮每转一圈，我就离开父母兄弟远一步。就这样两三天以后到达阿克苏城。在我最初的印象里，这里简直是一个大的都市，人烟稠密，市井繁荣。在阿克苏停留了两天之后，第三天凌晨摸黑上了路。吃早饭时，我们已经离开了阿克苏县城，四周一片茫茫戈壁，视线所及看不见村庄，更不见人

---

<sup>①</sup> 阿克萨卡力是长者的意思；又因他当时负责管理侨民工作，故还有侨总的意思。

烟。这时，我突然想起在常识课本上看到的中国地图。在那个地图上，乌什和阿克苏的距离不足一个手指宽，我们却走了两三天。从阿克苏到乌鲁木齐的距离有一根火柴棍长，真主啊，这需要走多少天？接着想到课本里的全中国地图的东西足有一拃<sup>①</sup>长，南北也差不多有一拃宽，我们的中国该是多么伟大的国家啊！我越想越觉得我们中国的伟大和可爱。”

经过 30 多天的晓行夜宿，阿巴索夫于当年到达乌鲁木齐，借住在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家里。最初，阿巴索夫的父亲托当时新疆省副主席霍加尼牙孜阿吉将他安排在乌鲁木齐俄文中学读书，希望阿巴索夫将来作为新疆第三批留苏生派往苏联学习。可是，阿巴索夫在俄文中学仅读了四五个月的书，突然转入省立第一中学读汉文学校。

后来阿巴索夫向我说起他当时选择中学的情形时说：“我从乌鲁木齐第一次体会到我们的国家之大。从乌什到乌鲁木齐只不过是从小疆的偏南的地方来到了新疆的中部，居然这么长的距离。我们中国有几十个新疆这样的省份，可见我们的国家是非常大的，我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就得学会汉语。”

从阿巴索夫初来乌鲁木齐的心情可以看出，对他来讲，那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自 1937 年直到 1940 年这一段时间，是盛世才大搞血腥

① 一拃：表示张开的大拇指和中指(或小指)之间的距离。

屠杀和强化法西斯统治的时期。但是他没有赤裸裸地推行他的反动政策。他采取伪善政策和进步口号，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掩饰了他的反动政策的实质。他用这种欺骗手法企图牢牢捆住人们的手脚。这在当时也确实收到一定的效果，迷惑了不少人，使一些人对他抱有幻想。他的伪善政策的主要表现是：站在苏联一边，支持中国共产党，表示脱离南京蒋介石政府和“三民主义”。盛世才要推行这一伪善政策，就无法公开拒绝人民的正当要求，不得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允许人们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这特别是进步知识青年的一个难以拒绝的要求。不管盛世才怎样施展他的欺骗伎俩，但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允许发展文化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这就给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造成了良好机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新疆工作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利用这一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整顿财政，肃清吏制，发展生产，推动教育，新疆的社会状况大有起色。这时，正值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反帝抗日的口号成为团结新疆各族人民的巨大凝聚力，成为推动新疆社会进步的巨大感召力。各族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社会进步的呼声高涨，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疆的政治气氛非常活跃。阿巴索夫这位年方十六七岁的青年，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内心自然充满了希望。

## 关 怀

阿巴索夫虽然在父亲的支持下毅然地进入了省立一中，但是，多年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仇视和隔阂，留在他幼小心灵中的戒备心里却没有因此而消失。阿巴索夫进入省一中的第一周期间，显得非常拘谨，下课以后常常一个人留在教室里。他对周围的汉族同学很不了解，尽量不去接触他们，害怕遭到欺辱。

省立一中的大部分学生是住校生。阿巴索夫借住在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家里。从这里到一中足足有两公里半路。进入一中第二周的头一堂课，阿巴索夫迟到了。那天是乌鲁木齐秋季常见的风雨天气。阿巴索夫冒雨徒步两公里半赶到学校时，上课铃早已响过。这时他已经全身湿透，惶恐地慢慢走到教室门口。正在犹豫该不该推门进去时，教室里传出了刘子平老师的声音：“请阿布杜克力木同学进来！”阿巴索夫胆怯地走进教室不敢入座，双手垂在裤线上，站在一边等待着体罚。刘老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浑身透湿的阿巴索夫，深有感触地对全班同学说：“这位维吾尔族同学这么大的风雨天还赶来上课，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阿巴索夫因为当时还不怎么懂汉语，他误解了刘老师的意思，一急之下，他不顾老师和同学们能否听懂，大声地用维吾尔族语替自己申辩，说他不是

故意迟到的。语言的隔阂使双方一时无法了解对方的意图。幸好，班里有一位伊犁来的汉族同学通晓维语。他先把阿巴索夫说的话翻译给老师和同学们，又把老师说的话翻译给阿巴索夫。阿巴索夫听完翻译以后，激动地跨前一步，双手抚胸向刘老师深深一鞠躬，然后回过身来又向同学们深深一鞠躬，表情严肃地说：“往后，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要按时来上课。”当那位伊犁的同学将阿巴索夫的话翻译成汉语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一位男生大声说：“真是儿子娃娃（男子汉的意思）！”

另一位同学建议说：“眼看冬天到了，阿布杜克力木同学这样每天跑来跑去太受罪了，我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他，请他到学校来住。”另外几个同学也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床位让给阿巴索夫。

阿巴索夫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听不大懂老师和同学们说了些什么。不过从他们对我友好的眼神里，我发现了一颗颗善良的心灵。当我知道同学们的意图后，一股暖流涌到心间，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第一次感到，汉族同胞中间同样是有好人的。从此我的戒备心理完全消失了。以后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心里总是火烫火烫的。”

经过初一学年的学习，阿巴索夫的汉语有了很大的进步。语言的勾通，舒展了阿巴索夫性格中的聪慧天赋。他集父亲和母亲优良品格之大成，认真、踏实、友情、重

义气。1946年我和阿巴索夫在新疆联合政府任职期间，谈到个人成长过程时阿巴索夫说：“在省一中读初一时，我最推崇的是汉族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观点。”说到这里，阿巴索夫用维语详细解释了这句汉语的含义。他接着说：“用阶级的观点区分敌我友，是我在新疆学院听林基路老师讲课时才弄明白的。”

天赋的性格，初立的信念（推崇义气）使阿巴索夫很快在同学中间找到了许多朋友。他的交际网由初中部甚至延伸到了高中部。这时，他是那么活跃。至今，他在周末文艺晚会上潇洒的维吾尔舞姿，他在篮球场上矫健的投篮姿势，人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初一年级的期末，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有一天，阿巴索夫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悄悄对他说：“刘老师是共产党！据说我们学校的李志梁校长也是共产党！”这个消息使阿巴索夫大吃一惊。他很快将刘老师、李校长和村里的老人常说的苏联红党（直译成汉语当时为红腿子）联系在一起。那些从苏联逃来乌什的乌孜别克富户们谈到红党时，真有些谈虎色变。

整个初二学年虽然功课很重，但是刘老师、李校长与苏联红党的问题一直盘旋在阿巴索夫的脑海里。

阿巴索夫后来向我谈起这段生活时说：“自从那个大雨天我迟到之后，刘老师就成为我崇拜的偶像。他落落大方，威严中带着和蔼，待人接物男子汉气概十足。他不仅

知识渊博，身体也很健壮。对于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常常慷慨解囊相助。我想，如果刘老师这样的人是共产党的话，那么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的红党都是一帮了不起的人组成的党。对共产党人有了好感，这是我初中时期获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阿巴索夫特别强调最后这句话。

## 幼 苗

1937年，阿巴索夫结束了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升入新疆学院高中预科部。

新疆学院坐落在乌鲁木齐城南郊的一处丘岭上。地名叫三桶碑，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乌鲁木齐的市中心了。但是，阿巴索夫在新疆学院读书的那个年代，从新疆学院进一次城（指现在的大小十字）真有从乡下进城的感觉。

由于人为的（军阀割据）和自然的（交通艰难）障碍，一向信息闭塞的亚洲腹地——新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洪流中，逐渐复苏了起来。祖国中原地区的情况随着抗日战争的消息，一起传到了新疆。欧洲的情况随着苏联红军对德作战的消息也传到了新疆。新疆云集着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尤其是新疆学院，更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林基路任教务长，茅盾、史枚等均到院任教，张仲实等不少共产党人也在学院从事过教学工作。



阿巴索夫进入新疆学院的最初日子里，统一的校服，高大的校舍，宽敞的运动场，都给他一种全新的感觉。这些都不是省立一中所能比的。在省一中期间，阿巴索夫只是在公众大会上见过所谓世界六大领袖之一的盛世才<sup>①</sup>，而在新疆学院，每隔一段时间，这位主席兼督办的盛世才都要到学院给学生亲自讲六大政策<sup>②</sup>。盛世才挺拔的身躯，堂皇的军装，还有他讲话时洪亮的嗓音，以及浓眉下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都给阿巴索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阿巴索夫和我谈起盛世才的印象时说：“那个时候，我确实认为盛世才这个人物与他的名字所表达的一样，是世界性人才。可是不久，盛世才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因为当时我还不大会汉语，因此，阿巴索夫特意给我解释了“世才”这两个字的汉语意思。

这是新疆学院师生思想最活跃的时期。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唯物主义等等都是可以公开谈论的题目。升入新疆学院的阿巴索夫不久便显示出他是一位极为活跃的学生。他精通汉语，仪表堂堂，精力充沛，功课出众。更重要的是，他对学院的所有政治活动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在街头演活报剧，扮演日本鬼子活灵活现。他在街头演讲热情奔放。尤其是他用维语在南关一带维吾尔居民集居

---

① 盛世才自称是世界上六大领袖之一，其他五大领袖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

② 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

地方演讲，给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46年，阿巴索夫出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秘书长职务时，很多维吾尔群众说：“他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听过他的演讲，那时他嘴上还只长了一点汗毛。”

阿巴索夫奔放的政治热情，自然引起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同志的关注。有一天，下课钟敲过后，主讲政治课的林基路同志正在收拾讲稿，阿巴索夫突然起立大声说：“林老师，我有个问题！”这贸然而来的发问使全班同学大为疑惑。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阿巴索夫身上。

林基路同志抬起头，认真地问：“是个什么问题？”

阿巴索夫急切地问：“林教务长，六大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吗？也是消灭阶级吗？”阿巴索夫将六大政策与共产主义硬行比较的提问，使全班同学哗然。林基路沉思片刻，对阿巴索夫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已经下课了，今天晚上自习时我在办公室等你，我尽量回答你的问题。”

从此，阿巴索夫成为经常登门拜访林基路同志的学生之一。后来，阿巴索夫向我谈起林基路同志时，深有感触地说：“林基路教务长只比我大了几岁，可是他那渊博的知识，冷静的头脑，坦荡的胸怀，还有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成为我一生的楷模。”言谈话语和表情中，流露出对林基路同志由衷的仰慕之情。

有一天，林基路同志应邀参加民族同学举行的晚会。

阿巴索夫代表同学们讲话，用的是维语。他刚说第一句话：

“同学们，今天，林基路大哥……”这时，他身边的一位同学用维语悄悄提醒说：“应该说林教务长。”听到这个劝告，阿巴索夫也有些发怵了。不料林基路同志却风趣地说：“阿喀（大哥）这句维语我听懂了。同学叫我林基路阿喀我很高兴。在座的同学比我小的，我就是你们的大哥，比我大的，你们就是我的大哥。”

当阿巴索夫把林基路的话翻译给同学们时，场内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打破了过分拘谨严肃的局面。

阿巴索夫在新疆学院的同学回忆阿巴索夫与林基路同志的关系时，都称赞说：“林教务长和阿布杜克力木简直就象亲兄弟一样。阿布杜克力木对林教务长非常尊重，林教务长对阿布杜克力木非常信赖，甚至林教务长生活中需要上街采办的一些事情，也常常交给阿布杜克力木去办。”

1946年，新疆和平条款签定之后不久，在我们到乌鲁木齐和国民党当局最后商量组成联合政府细节时，有一天，阿巴索夫忙里偷闲，一定要我陪他去参观他的母校——新疆学院。为了不惊动国民党当局，我们选择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既没有带警卫，也没有带司机，由我驾驶汽车直奔新疆学院。这所学院这时几乎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举目只见瓦砾遍地，杂草丛生，树木凋零，偶尔遇见一两个没精打采的学生从我们身边走过。

阿巴索夫目睹这荒凉的情景，深沉地说：“当年，这是一所充满活力的学院，这里的学生也都是充满活力的青年，而林基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些有为青年的核心。”

整个下午，阿巴索夫带着我走遍了这所破败萧条的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把他当年的宿舍、课堂、篮球场、俱乐部、食堂都一一指给我看。他介绍了杜重远、茅盾的办公室和宿舍，尤其详细地介绍了林基路同志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甚至能回忆起在这些地方和林基路同志谈话的许多细节。在二楼的一间贴着封条的门前，他说：“这是林基路大哥最早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林基路大哥给我开导过许多问题，从为什么猴子会变人到什么是阶级，特别是关于民族问题，林基路大哥的教导已成为我的座右铭。林基路大哥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对我说：‘民族问题必须和阶级问题一起解决，不联系阶级问题而谈民族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必将导致对共产主义有害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在新疆，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阿巴索夫对自己在新疆学院的生活是非常怀念的。1947年3月，在人民革命党高级干部酝酿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的一次会议上，阿巴索夫坚决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在阐述自己的这一主张时，他说：“我在省一中读初中时，从刘老师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品质，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好感。在新疆

学院读书时，又从林基路大哥那里受到了教育，从而确立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这个党有着崇高的政治目的，而它的党员为人忠诚，心地善良，目标远大，勇于斗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当今，除了中国共产党，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备拯救中国的条件和资格。”

## 第三章 “叛逆”子弟

### 流放沙湾

1938年，盛世才炮制所谓“大阴谋案”，进行大肃清。从当年9月至翌年11月，先后逮捕2千余人。这是新疆近百年史上的又一大冤案。及至1940年2月，阿山哈萨克牧民抵制收缴民枪，大举暴动，盛世才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扩大兜捕范围，致使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牢狱，无数人在狱中被折磨致死。他们的家属被定为“叛逆家属”，子女被定为“叛逆子女”。

1938年，阿巴索夫的父亲阿西木大叔被捕入狱，并在狱中被杀害。两年后，阿巴索夫也以“叛逆子女”的身份被流放到沙湾县。沙湾县距乌鲁木齐180公里，是准噶尔盆地北缘的一片绿洲。

和阿巴索夫同时流放的学生中有新疆学院本科生，也有预科生，还有一部分中学生和师范学生。有汉族，还有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押送这些“叛逆子弟”的汽车从乌鲁木齐的各个角落汇合到西大桥附近进行编组，组成车队后，押车的军官宣布了戒令，其中有一条规定是，途中潜逃者就地枪毙。

阿巴索夫等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去处。清晨，车队慢慢起动，前边一辆满载荷枪实弹兵士的军车开道，最后有一辆同样的汽车殿后。车队开过黑山头以后，阿巴索夫等人只知道他们是往西走。

车队进入沙湾县城后，沙湾县警察局如临大敌。几名警察模样的人提着驳壳枪登上汽车驾驶室两边的踏板，其他的警察平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随行在车队两侧。车队停在县警察局门口后，押车的军官大声通知：“阿巴索夫下车！”一种不祥的预感涌向阿巴索夫的心头。他慢慢从座位上站起，默默环视了一下同车的伙伴。大家也报以悲愤的目光。他们的表情说明，他们这是诀别。

阿巴索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突然觉得，我死也要死得象抗日战争的英雄们那样。于是振作了一下精神，有意识地站在车箱板上，一纵而起，轻轻落在地上。我昂首挺胸地把双手插入裤兜，等待发落。那位军官对沙湾县警察局长说：‘督办训令，这个名叫阿巴索夫的叛逆子弟由你县监管！’这时，我才明白等候我的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后果。”

接着，同伴们把阿巴索夫的行李搬到车下，车队又慢慢起动。阿巴索夫和自己的同伴们互相默默地挥了挥手，大家都不知命运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汽车走出10多米远之后，突然停住了。那位军官走下驾驶室，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阿巴索夫的身边，大声说：“检查一下

东西都全了吗？”阿巴索夫以为自己拿错了别人的东西，或者错拿了这位军官的东西，急忙环视了一下身边仅有的一双皮箱和一件行李，确信没有拿错之后，便对军官回答说：“全是我的东西。”

军官点了点头，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阿巴索夫的行李，以仅能使阿巴索夫听到的声音，低声用纯正的维吾尔语说：“往后，自己要关照好自己。一切，托付给真主吧。”

这位军官除了车队在乌鲁木齐的西大桥出发时，宣布简短的戒令和把阿巴索夫移交给沙湾县警察局长时，说过几句话外，一路上几乎没听见他说过话。这位军官马靴铮亮，军服笔挺，武装带和手枪带的位置和方法，绝对符合条令标准，早已引起阿巴索夫和同伴们的注意。这时，他用如此纯正的维吾尔语对阿巴索夫说出了美好的祝愿时，不禁使阿巴索夫瞠目结舌，其中有感激，更有惊讶。阿巴索夫急切地刚用维吾尔语低声说出一个字：“您……”这位军官突然又改用汉语对他大声说：“往后有半点过失，军法处置！”说完，头也不回地大步向自己乘坐的汽车走去。

三区革命方面和国民党当局签定和平条款后，当我们准备赴乌鲁木齐出任省联合政府职务时，有一天饭后，阿巴索夫来到我家闲聊。他回忆起这件往事，说：“这次到了乌鲁木齐，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他的样子，我



永远不能忘记。

到乌鲁木齐后，阿巴索夫果然四处打听这位军官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一天，他深感遗憾地对我说：“象他这样的好人，我断定已经被盛世才杀害了。”

## 青年教师

阿巴索夫在沙湾县度过了两年多的流放生活。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被安置在县城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小学任教。沙湾镇是往来商旅打尖休息的地方。这个小小的有利条件给这个小镇带来了生机。这里居住的有汉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还有俄国十月革命后迁来的一些俄罗斯人，他们来此谋生，客观上促进了小镇交通、商业的发展。这里的汉族人大多经营商店和车马店，维吾尔人和俄罗斯人大多经营饭馆，哈萨克人则主要向小镇提供奶制品和肉类。

当县政府文教科所派的伙役赶着马车将阿巴索夫送到那所小学校时，已经是傍晚时候，天上还下着毛毛细雨。一位年逾古稀、耳聋眼花的哈萨克族校役接待了他，把他安排在办公室里。阿巴索夫点燃油灯，环顾四壁，眼前除了山墙正中贴有一张盛世才画像之外，室内别无它物。连其他学校必备的学生课程表、教员课时表和学生名册也没有。阿巴索夫心里不禁凉了半截，心想：“这也算得上是一所学校吗？！”

第二天清晨，阿巴索夫急忙起床，他想了解一下自己将要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他走出房间，两间孤零零的土房立即映入他的眼帘，两间土房以外则是农田、丛林，四周没有围墙。两间土房的左右和前后，是杂乱的石头和土块，还有漂浮在积水中的牛羊粪。阿巴索夫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头，走到土房前，从窗户向里看去，只见土块垒起的几排高高低低的土台。他心里顿时全明白了：这就是他将要任教的学校！

想到这里，阿巴索夫木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盛世才推行所谓“六大政策”时期，新疆还有这样的角落。这些年，他始终听信了盛世才的欺骗宣传。即使在他被驱逐出新疆学院流放沙湾时，对盛世才的所谓政绩仍然是坚信不疑的。

目睹眼前的一切，阿巴索夫突然觉得自己的精神支柱崩溃了。后来他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我站在窗前发呆了。不久以前我还坚信不疑的东西原来都是假的。想到这里，我顿时感到心灰意冷。直到那位老校役问我早上吃点什么，我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开始阿巴索夫简直把教学看成是一种苦役；可是，过不多久，他便把这里的维族和哈族学生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把教学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更好地和学生交流思想，他努力学会了哈萨克语。他先是在体育课上用哈萨克语上课。后来，算术课、地

理课，他也用哈萨克语讲授。他还独出心裁地编排了一套游戏化的体育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度过了冬季，初春很快到了，新任县长要到学校来视察。学校校长请了许多维族和哈族头面人物来作陪。因为校长是哈族，又按照哈族人的习惯特意布置了一间客厅。

那天下午，县长在县府要员和学校要员的簇拥下步入校门，他们在充作教室的两间土房教室的窗前向里瞥了几眼，马上便被请入客厅。这位县长以为，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听得懂汉语，加之他又是个江南人，语言不通，一时成为县府、学校要员和头面人物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校长一急之下打起了手势，想表达对县长“欢迎之至”的心情，奈何双方都没有学过哑语手势，怎么比划也难以理解对方的意思，一时气氛十分尴尬。这时学校教务主任对校长耳语了几句，校长立刻如获救星似的，一边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珠，一边连声说：“快请，快请！”

正在给学生上课的阿巴索夫被请进临时客厅。这时，不论是县府要员，还是维族、哈族头面人物，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请阿巴索夫来参加，因此，谁也没有正看他一眼。只有校长心里有数。校长恭谦地让阿巴索夫坐在自己身边，低声说：“今天，无论如何请你帮忙！”

阿巴索夫入座后，漫不经心地说：“请说吧，是什么事？”

校长说：“你瞧，我们现在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

阿巴索夫明白了。他说：“这事好办，我让你们互相听懂就是了。”

校长清了清嗓子，重复了对县长“拨冗莅临敝校”的感激之情。当阿巴索夫发音纯正、用词准确地将校长的套话逐字逐句翻译成汉语之后，举座无不惊讶，那些维族和哈族头面人物更是瞠目结舌。

从此，阿巴索夫不论是在学校师生中，还是在附近的维族和哈族百姓中，都被说成是一位传奇人物。此后不久，阿巴索夫果然干了一件近似传奇的事。

## 智退彩礼

阿巴索夫所教的班上有一名哈族学生，一连几天没有来上课，他是全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出于关心，阿巴索夫在一个星期天，骑着学校的公务马走了十几公里路，到了这个学生家。这时那个学生不在家，一位年约十七八岁的姑娘正在给一位重病卧床的老人喂饭。经过双方自我介绍，才知道老人是学生的父亲，姑娘是学生的姐姐。阿巴索夫问老人这些天为什么没让孩子去上学。老人顿时涕泪交加，随后道出了这样一段难言苦衷——

原来，附近有个年过花甲的哈萨克牧主看中了老人的女儿。他不问姑娘家愿不愿意，便依照哈萨克人的习惯，强

行送来了一份所谓的“彩礼”：3匹马、5头牛和20只羊。可是姑娘誓死不嫁，还说要寻短见。老人一急之下病倒了。因此，学生好几天没去学校，在家和姐姐一起伺候父亲。

听了老人的叙述，阿巴索夫非常惊讶。这种仗势逼婚，特别是一个可以当爷爷的人，竟然强娶一位完全可以当他的孙女的姑娘作妻子，这种事情过去他只是在文艺作品中才读到过。阿巴索夫简直不敢相信，生活中真有这样不合情理的事！愤懑不平，不由使他怒火中烧。他对老人说：“您让我试试，能不能帮忙。”

阿巴索夫离开哈萨克老人家，一路上边走边琢磨办法。他想起了汉族的一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立即绕道直奔那家牧主的帐篷而去。

这位牧主可能在学校欢迎县长的临时客厅里亲自见识过阿巴索夫的本领，因而一打照面，他便显出敬而畏之的表情。先是传话送茶，继而传话送奶，最后又命人为阿巴索夫宰羊。

按照哈萨克族的习惯，为客人宰的羊，要经过客人过目，由客人在羊头上摸一摸，然后方可牵去宰杀，以示对客人的诚意。因此，工夫不大，佣人就牵来一只壮羊，请阿巴索夫亲自过目。

阿巴索夫对牧主说：“绝对没有这个必要。现在倒有一件比这更为急切的事，希望您表现对客人的真诚意

愿。”

牧主眼看阿巴索夫拒绝摸羊头，再瞅瞅阿巴索夫的严峻表情，忐忑不安地问：“我能办得到吗？”

阿巴索夫压低声音：“你完全可以办到。”

“那么，请您说吧！”牧主满怀狐疑地说。

阿巴索夫清清嗓子，故作逼真地对牧主说：“有人要我用汉文给县长写了份状子，说您仗势逼婚，酿成人命。”

牧主猛然一惊，接着失魂落魄地絮叨说：“没有听说出人命呀？……”

阿巴索夫煞有介事地说：“就差一丁点儿了。如果您再继续逼婚，那么人命官司不发生在今天，就发生在明天！”

牧主张皇失措地说：“那么，阿布杜克力木先生，您有什么办法？”

阿巴索夫拍了拍早已放在餐布上的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套，有意加重语气说：“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用汉文写成了状子，就装在这里面。县长今天吃晚饭时，这封信可能出现在他的饭桌上。”

牧主想到那天阿巴索夫在县长面前轻松地讲着汉语的情景，他对阿巴索夫刚才的话是深信不疑的。

阿巴索夫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土财主毕竟经不住洋学生的恫吓，这个老家伙当场以真主的名义对我发誓：‘明天就收回送去的彩礼，宣布退婚。’作为交换条

件，我当场烧了那个装满一叠废纸的信套。这场对老牧主来讲是悲剧，对那姑娘来讲是喜剧，对我来讲是闹剧的一段插曲，结果就这样收场了。”

洋学生智斗土财主的事，在阿巴索夫流放沙湾的两年多时间里，的确只是一段插曲。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学习，特别是革命理论的学习，并在学习中反省和思考。

## 卷 烟 纸

阿巴索夫离开乌鲁木齐时，宁可丢下过冬的毡靴，而在行李中却夹带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理论书籍。在沙湾的第一个漫长冬季里，这些书籍成了阿巴索夫的生活伴侣，精神寄托。他逐字逐句地阅读，读完一本，接着读另一本，每天除了教书，几乎手不释卷。

对照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阿巴索夫联系眼前的实际，许多问题渐渐引起他的思考：被报纸和各种演讲所肆意吹捧的盛世才以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衡量，到底是些什么货色呢？盛世才搞的真是社会主义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是社会主义，那么它的政治纲领是怎样体现的呢？社会主义各尽所能的原则是如何实

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又表现在哪里呢？……

冥思苦索得不出答案，阿巴索夫陷入迷茫和苦闷之中。但有一个意识却一天一天明晰起来，这就是，盛世才的偶像在他的心目中倒塌了。从此，阿巴索夫开始留意新疆的政局，全国的政局，世界的政局。

在此期间，由于共同学习和思考的兴趣，阿巴索夫结识了乌依古尔·沙依然和郭奎兴。

乌依古尔曾就读于莫斯科，比阿巴索夫早些时间以“叛逆子女”身份流放在沙湾，并在同一所学校任教；郭奎兴是我在苏联中亚国立大学的同期同学，当时是沙湾县政府的一位职员。

有一天，阿巴索夫和乌依古尔在镇上遇到了往乌鲁木齐运送沥青的一队四轮马车。这个车队约有30多辆车，赶车的全是俄罗斯人。乌依古尔在和车队头目用俄语聊天时，那头目给阿巴索夫和乌依古尔每人递过来一张卷莫合烟的小块纸片，裁剪得整整齐齐。阿巴索夫一眼看到自己手里这张小纸片上正好印着《真理报》第四版等字样。无疑这正是苏联《真理报》的第四版版肩那一部分。阿巴索夫伸过头去再看乌依古尔手里的那张纸片，只见上面只剩下年、月。照那上面的时间推算，这是前一个月的报纸。

阿巴索夫用维语小声对乌依古尔说：“我们卷烟用的纸是《真理报》，想必这老兄的车上还有其他有用的东西。”乌依古尔为人机警，他立刻明白了阿巴索夫的用意，于是就



对这位赶车的头目作出更加友好表示。不等莫合烟抽完，乌依古尔便主动做东。在一家窗明几净的饭馆里，那头目变成了阿巴索夫和乌依古尔殷勤款待的客人。几杯烈酒入肚之后，乌依古尔和阿巴索夫交换了一个眼色，拿出三瓶古城烧酒摆在这位俄国人面前，接着提出愿意用酒交换他车上所有的俄文报纸。这个俄国人一听正求之不得，欣然答应了这一要求。

阿巴索夫和乌依古尔把这一大包报纸拿回宿舍清理之后，发现都是15天以前的《真理报》。这一夜，两人异常兴奋，逐一阅读了每一张报纸，从中知道了几个月以来未曾了解的苏联和世界各国的重大新闻，也从苏联报纸的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政治动向。

也许是为了友情，这个马车队的头目以后每隔半个月路过此地时，总要带来一批他所能收集到的俄文报纸和杂志。

除了阿巴索夫和乌依古尔之外，郭奎兴是这些俄文报刊的第三位秘密读者。他们三个人经常聚在一起，通宵达旦地讨论俄文报刊上的消息。后来，阿巴索夫又提出，我们还要想办法弄到我国的汉文报刊，以便印证各种报道。当局是禁止“叛逆子弟”阅读报刊的，因此，只有在县府任职的郭奎兴才有机会弄到汉文报纸。

为了不引起当局的注意，一周之后，他们三人都先后在镇上的民族饭馆里包了伙。他们三人都是单身汉，在饭

馆包伙是很自然的。每天晚饭之后，阿巴索夫和乌依古尔就用郭奎兴带来的汉文报纸包上他们第二天早餐用的食品。而郭奎兴则用阿巴索夫和乌依古尔读过的汉文报纸包上自己第二天早餐用的食品，先后离去。这样，在郭奎兴的办公室里，人们也很难发现报纸短缺的现象。

阿巴索夫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深有感触地说：“学习、反省、思考的结果，我对盛世才政权由失望、不满，进而转化为对立。决心照林基路大哥在政治课上讲的那样，武装推翻反动统治，在新疆，在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而奋斗的信念，开始在我的心中萌发。”

1941年，新疆政局发生突变，盛世才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全然暴露。到了这个时候，他既无法重新得到苏联的帮助，也无法重新获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最后只得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势力迅速渗入盛世才的各级军政机构，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濒临土崩瓦解。这时，对所谓“叛逆子女”的监管也就放松了。

1942年，经沙湾县警察局和沙湾县政府核准，阿巴索夫被准许去伊宁探望患病的母亲。

## 第四章 一心为革命

### 结识朋友

从1942年开始，国际和国内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随着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入，国际反法西斯运动更加壮大。在我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日益剧烈。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上不少意志薄弱、目光短浅的人，看到希特勒的“闪击战”一时得逞，担心苏联会被消灭。一些反苏反共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反动派，竟得意忘形地叫嚷“俄国的红色政权完蛋了”。但是苏德战争爆发一年以后，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英勇奋战，阻遏了希特勒的进攻。特别重要的是，苏德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由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转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德、日法西斯在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对我国抗战产生了不利影响。日军要在广阔的太平洋上作战，亟需巩固它在陆上的基地。而这时蒋介石却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争的殊死搏斗中，“苦撑待变”，度过了危机。为了保存实力，他继续执行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一面指使怂恿其留在敌后的部队大批投敌，一面加强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但是，中国共产党动员一切革命力量和广大人民，组织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紧张，新疆的形势也日趋复杂。1943年盛世才的第三次大捕杀开始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撕下了他亲苏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伪装，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蒋介石也趁机拉拢盛世才，于1942年6月派宋美龄到新疆“宣抚”。并于1943年春在新疆建立了国民党组织。国民党政府逐步直接统治新疆后，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强化了对新疆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民族压迫，引起了新疆人民的极大不满，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此伏彼起，最后终于在伊犁地区，爆发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

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就是在这动乱的时刻来到伊宁的。他到伊宁后，和各族人民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他发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进行公开斗争的条件业已具备。这使阿巴索夫备受鼓舞，长期萦回在他的脑际的那个“怎么办”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斗争的勇气顿时倍增。

回到伊宁不久，阿巴索夫由杨凤仪和她的长兄推荐，

先是在杨凤仪任教的伊犁女子中学教书，后来又兼任伊犁行政专员公署的翻译。这对阿巴索夫来说真是一个极好机会：一方面，他可以通过接触和翻译各种公文，了解国民党统治当局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剥削的内幕、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当局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等等，有时甚至还能了解全疆的动态；另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便，阿巴索夫结交了不少各民族进步青年。比如文斐然当时任公署的科长，阿巴索夫和他认识后很快就成为知交，因为政治观点的一致，使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和共同思想。通过接触，文斐然发现阿巴索夫是一个思想进步和有远大抱负的青年，文便对他进行了热情帮助。

阿巴索夫在女子中学还结识了学校的一批进步教师，并与他们在思想上建立了密切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巴索夫和女教师杨凤仪在密切交往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彼此逐渐加深了解，由志同道合变成一对情侣（他俩的这一关系，拟在另一章中详述）。除此，阿巴索夫还和不少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俄罗斯、锡伯和蒙古族进步青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阿巴索夫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以及谦虚好学、以诚待人、严以律己的品德很快赢得朋友们的尊敬和信赖。

阿巴索夫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并将所掌握的

材料提供给朋友们，一起进行讨论、分析。他不满足于自己所了解的有限情况，积极地想方设法掌握整个伊犁以至全疆的情况。就在这时，行政专员公署组织了一个去伊犁地区各县的调查组。阿巴索夫和文斐然都设法参加了这个调查组。政府当局交给调查组的任务是：调查人民的反抗情绪和那些带领群众进行反政府活动的人，宣传政府的所谓“廉洁”政策。而这对阿巴索夫来说，正是一次了解国民党反动当局罪恶事实，广泛接触各族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进行社会调查的极好机会。后来，阿巴索夫向我谈起他参加调查组去各县的所见所闻时，说：

“我这才认识到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在农村，解决问题的力量也在农村。”

阿巴索夫在伊犁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工作、学习和调查研究，进一步了解了各族人民的疾苦，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气虚力竭、外强中干的本质。伊宁市的局势，伊犁地区乃至全疆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越来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阿巴索夫通过他所结识的许多思想进步、意志坚定、可以信赖的朋友，逐渐认识到，只要一心为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是肯定会成功的。他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更坚定了。剩下的重大问题是，这场革命如何进行，如何组织革命队伍等，便成为阿巴索夫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到了1943年，苏联也认清了盛世才的真面目，转而同情和支持新疆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在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在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维吾尔、哈萨克文杂志，相继刊登声援和支持新疆人民斗争的文章。这些杂志冲破反动当局的封锁和查禁，通过各种途径在伊犁、塔城、阿勒泰等边境地区广为流传，极大地鼓舞了新疆人民的斗争。不久，在群众中也出现了革命传单，这些传单有时以《新疆解放》的名义，有时是以“毛拉斯拉木乡总”的人名散发。毛拉斯拉木乡总是阿勒泰的维吾尔人，因为反对国民党而遭追捕，以后逃到苏联境内，在吉木乃对面的苏联境内继续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以后还组织了游击队。三区革命爆发解放阿勒泰时，他也参加了战斗。

苏联对新疆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支持，使新疆人民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热情更加高涨起来。开始革命行动的机会来了。阿巴索夫和他的朋友们都期待着采取行动。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开始惶恐不安起来，他们觉察到革命风暴即将爆发，千方百计地进行了防范和镇压，妄图扑灭革命之火。……

## 伊犁河畔

一天早饭后，阿巴索夫在穿衣镜前正了正领带，对

正在收拾餐桌的母亲说：“妈，今天我大概回来晚一些。”

母亲认真地说：“是啊，你年纪也不小了，自己的事应该当回事了。可惜啊，如果她是一位穆斯林姑娘就好了。”母亲说完发出一声长叹。老人家以前为儿子的安危担心，如今又为儿子的“终身大事”犯愁。

阿巴索夫走出大门，伊宁市的喧嚣顿时迎面扑来：沿街两侧饭馆和小贩的叫卖声，疾驰而过的“六根棍”马车的串铃声。……街面上，只见西装革履的公子哥儿，趾高气扬的军官和他们的浓装艳抹、牵着巴儿狗的太太，间杂着沿街乞讨的男女乞丐。……这一切，构成了伊宁这座祖国边城特有的音响和画面。

回到伊宁不过几个月时间，阿巴索夫就深深地预感到，在这表面升平景象掩盖下的，正是不断凝聚并行将迸发的革命洪流。

这一天，阿巴索夫并不是去同女友杨凤仪约会，他是去参加伊宁市青年们在伊犁河边举行的一次野餐会。阿巴索夫准时到达伊犁热电厂附近的兰桥上，这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位男女青年，他们衣冠整洁，充满活力，不时为一半句幽默的话语或动作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身着深色西服，结红色领带的青年，他们风度翩翩，气质不凡，阿巴索夫从他们西装上兜别着的圆形校徽上，猜出他们是当时伊犁最高学府——伊犁中学的教员。其中有赛甫拉也夫、司马义·依布佐拉尤夫等所谓的



“塔什干派”，也有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安尼瓦尔·汗巴巴等所谓的“莫斯科派”。阿巴索夫的到来，使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热烈欢迎他来参加野餐会。

10点钟以后，数十名各民族青年男女分乘10余辆轻型马车赶来了，他们聚集在伊犁河畔。初秋，伊犁河清波荡漾，芦花飘飏，衬托着远山的松柏，幽美、纯静、清新、生机蓬勃。

野餐会在烤羊肉的飘香中，在喇叭作响的啤酒开瓶声中和伊犁青年特有的骤起骤落的笑声中开始。但是，话题很快转到了政治范畴。聚在这里的各族青年男女，以族别为区分，分属于好几个组织。阿巴索夫对近年伊犁地区纷纷成立的各种组织，作过深入调查，已有概括的了解。他很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政治见解。因此，他对每个人的发言都非常注意。

在痛斥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盛世才方面，发言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在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上，却显示出明显的不同。如果不是一些机敏幽默的和事佬用诙谐的语言从中调和的话，双方意见的分歧很可能变成一场不愉快的争持。阿巴索夫特别留意那些所谓“塔什干派”和“莫斯科派”的见解和主张。

后来阿巴索夫在谈到他参加这次集会的心情时说：“我第一次感觉到，在反对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上，与会者的感情是一致的；但是，再进一步，在诸

如政治目标、政治口号等问题上，处于不同阶级立场上的青年，看法也截然不同。许多人似乎缺乏时代感，更缺乏政治感，他们之中不少人仅仅凭借一股强烈的民族意识去想事，去处理问题。看着他们那一股盲目的激情，我确实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我也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不少人，特别是所谓‘塔什干派’和‘莫斯科派’的一些人，他们不仅具备丰富的知识，而且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干，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振奋。……”

## 组织起来

阿巴索夫对这次野餐会上出现的政治分歧十分忧虑。此后一连数天，他多次拜访了赛甫拉也夫、艾斯海提、安尼瓦尔·汗巴巴、喀斯木江·坎巴尔等人，同他们一起讨论时局问题。他们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包括伊犁地区的政治形势、全省的政治形势、全国的政治形势、世界的政治形势，也包括云集在反对国民党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盛世才反动统治这一旗帜下的各种势力和团体的政治态度，以及他们的政治目标等。讨论中，阿巴索夫向大家提出，必须建立起一个纲领明确、观点正确的革命组织的设想。阿巴索夫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特定环境和条件下，要马上建立起一个纲领明确的统一的革命组织，还有不少困难，他通过同大家研究，决定先组织一个过渡性的统一

战线的组织。

这一时期，在伊犁地区进行反对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艾里罕吐热。艾里罕吐热出身宗教世家，乌孜别克族，原籍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先后在库车等地布道行医，30年代末被盛世才逮捕入狱，40年代才获释出狱。1943年底，我第一次见到此人，是在伊宁市最大的清真寺——拜吐拉清真寺。当时，我只是想见识见识此人。礼拜开始后，只见一位中等个儿、留着花白短须、头缠白布、身穿伯克赛木绸长袍的长者，迈着缓慢的步子走上诵经台，用傲然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台下的信徒，先用阿拉伯语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接着便用乌孜别克和维吾尔两种语言混杂着开始诵经。信徒们都虔诚地洗耳恭听。此人极善辞令，语言生动，很有吸引力。他以宗教身份出现在群众中有一定的感召力。此外，他还得到了以艾克木拜克霍加为首的维吾尔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支持。

在建立统一战线组织这一问题上，阿巴索夫考虑很有必要利用艾里罕吐热。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战友们之后，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他接连多次拜访了艾里罕吐热。艾里罕吐热是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始终不肯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时，全疆各地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特别是伊犁地区，民情沸腾，势在必发。蓬勃兴起

的革命形势，迫使革命者必须刻不容缓地组织起来。

1943年夏天，我被国民党当局解除公职，旋即迁来伊宁，帮我表哥阿吉卡里管帐。我的这位表哥主要经营土布生意，他的住所便成了我和阿巴索夫以及其他战友们聚会和讨论问题的理想场所。

一年一度的穆斯林斋月<sup>①</sup>来临。这天中午，我和阿巴索夫、赛甫拉也夫三个人在一家背街的回民饭馆聚会，这里的雅座很僻静，是我们在斋月常来吃饭的地方。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来没谈过重大问题，凡属阿巴索夫当时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是在我家里，或在赛甫拉也夫的单身宿舍里谈。这天，我们却一反常例，准备在这里最后商定对艾里罕吐热其人的基本态度。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这里既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并非闹市通衢，不论是反动当局，还是艾里罕吐热的追随者，都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谈论什么重大问题。我们开始海阔天空地扯了几句闲话之后，我先说：“阿布杜克力木，你说说艾里罕吐热的情况和我们今后的打算。”

阿巴索夫留心听了听四周的动静，然后小声说：“艾里罕吐热真是一块难以消化的肉。”

“也可以说，是一块难以消化的肥肉。”我接过阿巴索夫的话说。

---

<sup>①</sup> 伊斯兰教信徒在每年伊斯兰教历的9月实行封斋，封斋期间的一个月，叫做斋月。

阿巴索夫说：“是的，确实象赛福鼎大哥说的，是一块难以消化的肥肉。丢掉他，就等于舍弃一大部分群众；同他合作吧，这个人只要一碰到关键问题就吞吞吐吐，卖关子。更使我厌恶的是他那十足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尽管这样，在反对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一问题上，我们与他总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阿巴索夫接着说：

“现在问题很紧迫，从乌鲁木齐到塔城，从吐鲁番到喀什，天山南北已经出现了各种名目的组织，特别是以各种名义散发的秘密传单到处出现，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我们应支持这些革命行动，进一步做好鼓动工作。据说，现在艾里罕吐热正在筹划建立组织，目前亟待决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建立独立组织呢？还是同这个所谓的‘真主的代言人’合作建立组织？”

赛甫拉也夫沉思片刻，用他习惯的称呼严肃地问我：

“那么赛福鼎，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我说：“鉴于世界上，以及我们中国都有过不同政治倾向势力之间的合作，我们不妨也和这位老头儿合作，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干我们自己的事情。”

赛甫拉也夫点了点头，说：“对，也许这是在当前形势下可以使用的一个好办法。”

阿巴索夫用筷子一面慢慢地夹着菜，一面遐想地说：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能这样做。这个人在群众中有威望，他讲话有号召力，更主要的是，他反对盛世才——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可以利用他去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服务，这是根本的。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又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危害，群众又一时难以认识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危害性，这就会给我们的斗争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既要和他合作，又要同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是斗争策略问题，一定要注意，这关系到我们利用艾里罕吐热能利用到多大程度。总之，在同他的合作中，主动权一定要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

赛甫拉也夫说：“你是想说，我们利用艾里罕吐热可能取得好的效果，但他又是一匹脱缰之马，很难为我们所制约？”

我说：“我们得想个办法，给这匹马套上笼头，把缰绳拉紧一些，这样就好办了。”

“谁去掌握这根缰绳？”赛甫拉也夫认真地问。

“当然是阿布杜克力木了。”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

赛甫拉也夫疑虑地望着阿巴索夫。

阿巴索夫微微一笑：“如果您们要我掌握这根缰绳，我一定努力去掌握好。”

我们三人商定后，又去征求了其他战友的意见，最后我们决定和艾里罕吐热一起组建一个“解放组织”。

不久，“解放组织”即告成立，领导成员共12人：主席艾里罕吐热，其余成员为阿巴索夫、喀斯木江·坎巴尔、热合木江、加尼·尧力达西、努尔丁拜克、阿布杜肉

夫·买合苏木、沙力江巴依、穆义丁、买买提江·买合苏木、祖龙·提依波夫、乌买尔江等。1944年，国民党政府强化了伊犁地区的治安体制，派新疆省警卫处少将副处长刘秉德兼任伊犁地区警察局长。刘秉德原籍伊犁，回族，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曾任盛世才的翻译。此人利用自己的籍贯、族别以及语言等便利条件为媒介，罗织了一张范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更主要的是，他为人奸诈和狠毒，鬼点子多，给伊犁地区的革命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困难。他利用内奸的告密，残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镇压、瓦解了一些组织。

1944年夏季，一天傍晚，阿巴索夫突然接到“解放组织”召开秘密会议的紧急口头通知。在这以前，“解放组织”的会议都是由阿巴索夫提出，经艾里罕吐热同意后再决定时间和地点的。这次艾里罕吐热不与阿巴索夫商量便自行决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不禁使阿巴索夫隐约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最近以来阿巴索夫与艾里罕吐热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

会议以夜宴的形式召开。客厅两壁挂着豪华艳丽的壁毯，屋顶悬挂着光泽柔和的吊灯，在三角壁桌上，留声机里发出轻柔婉转的歌声。这天晚上，艾里罕吐热头缠大如圆盆的缠头布，身着黑白兰三色间隔的条状长袍，神态庄重，一副宗教绅士的派头。与往常不同的是，他这天没有过多题外寒暄，等人一到齐，立即开宗明义宣布了会

议的内容，阐述了他的全部观点。他说：“目前局势越来越紧，我们的组织已受到严重威胁。从今天起，我们停止组织的一切活动，哪怕是暂时这样也行。今后，我们之间，就算你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你。”说完，他透过眼镜环视了一下与会者，想从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

听完艾里罕吐热的话之后，不少人感到很突然，互相看看，默不作声。有几个人则显得如释重负，点头称是。显然，要么是艾里罕吐热说出了他们一直不敢说出的话，要么是他们在会前早已商定了。

这时，阿巴索夫说话了，他坚决反对艾里罕吐热的意见，激动地大声说：“当初，我们参加这个组织时，不是大家都手捧古兰经发过誓吗，难道都忘了？我坚决反对解散这个组织。”

艾里罕吐热言不由衷地解释说：“不是解散，是暂停活动。”

阿巴索夫用坚定的语气说：“暂停就是胆怯、后退，这和解散有何区别？你们若执意解散这个组织，那就请便；但是，我仍将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完，阿巴索夫愤然离席而去。“解放组织”从此陷入瘫痪。

## 寻找道路

事态发展到不可调和、又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当时形势下，尽管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一点上阿巴索夫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在认定这场斗争的性质这一重大问题上，他的主张一时还不可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更严重的是，阿巴索夫的主要支持者赛甫拉也夫等人，迫于反动当局的追捕先后都离开了伊犁，或避入苏境，或匿藏于他处，或被捕入狱。阿巴索夫自己也被置于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内情是在警察局工作的一位朋友透露给他的。面对此情此景，阿巴索夫已难于在伊犁坚持斗争了。一天深夜，他来到我家，向我们通报了上述情况。嗣后，他不无感慨地说：“看来，我应暂时离开这里。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都想起陈潭秋、毛泽民同志和林基路大哥这些共产党人。今天，要是他们来引导我前进，那该多好哇！可惜的是，他们都已牺牲在盛世才的屠刀下了。”他极痛苦地沉思了半晌，接着说：“现在，我只有去苏联，到那里再探索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除此，我看再无别的路可走了。……”

记得几天之前，我还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还未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时听他讲完之后，我立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我说：“你说得对，现在我们除此再没有别的法子。你到那边去，既可保存自己，又可进行准备，一举两得，是好办法。苏联方面过去间接地支持过我们的革命活动，今后我们可以直接得到他们的支援了。”以后我们又商定，这事要告诉哈希汗姨妈，以免她老人家担惊受怕。

那是一个初秋的深夜。晚餐早已吃过，而阿巴索夫和喀斯木江·坎巴尔仍然面面相觑地坐在餐桌旁。喀斯木江·坎巴尔是阿巴索夫的好朋友，逢年过节自不待言，就是平时，茶余饭后也经常一起聊天，有时长谈竟通宵达旦。喀斯木江·坎巴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阿巴索夫非常喜欢他那幽默而开朗的性格。尽管这天墙上的挂钟已敲了11下，可是，喀斯木江·坎巴尔既没有离去的表示，也没有象平时那样，对哈希汗姨妈顽皮地申明自己要留宿这里。他们神不守舍，欲言又止。哈希汗姨妈不想再叨扰他们了，自顾坐在灯下做起针线活来。

这时，库茨明突然推门而入。这是一位俄罗斯人，30岁开外，是阿巴索夫的一位要好朋友，平时常来常往，因此，哈希汗姨妈对他的来临习以为常。请他入座后，姨妈替他从茶炊里兑了一杯浓浓的红茶，刚要继续手里的活计时，杨凤仪又推门而入。

在阿巴索夫的朋友圈子里，这位汉族姑娘是姨妈最关心的人。老人家一直在设想，这位汉族姑娘迟早会成为自己的儿媳妇，只要我儿子喜欢她就行了，要是能使她成为一个穆斯林姑娘，那就再好不过了。

杨凤仪能说维吾尔语。但是，这天她向姨妈问候时，语气中带着忧虑，神情也显得不安。哈希汗姨妈下意识地感到今天的气氛有些异常，她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给杨凤仪让座，并忙着给她兑茶。杨凤仪劝姨妈坐下，让她自

已动手。姨妈无心继续手中的活计了，坐在桌旁陷入了沉思。老人家心里直犯嘀咕：虽说今夜先后来的都是阿巴索夫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这个家里的常客，可他们从来都是很讲礼节的，而今天一个个都不敲门便推门而入，显得颇为神秘。再则，库茨明的衣着大大超过了初秋御寒的限度。还有杨凤仪以往从不离手的精巧的手提包，眼下却换成了中型旅行包。前一阵子，哈希汗姨妈听说当局又在捕人的消息时，他猜想儿子可能会出走避难。……想到这里，她忍不住急切地问：“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总该告诉我才对呀！”

喀斯木江·坎巴尔歉意地说：“大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阿布杜克力木今晚要和库茨明去苏联，他们在那边待一段时间就回来。”

哈希汗姨妈顿时惊呆了，半晌还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这时，我来到阿巴索夫家，只见哈希汗姨妈坐立不安，满面愁容。屋里其他人都默默地无可奈何地看着姨妈。姨妈见我进屋，好象一下找到了治病的良方妙药一样，脸上掠过一丝笑影。不等我开口，她就指着大家说：“来，赛福鼎！孩子，你来的正好。他们象是说阿布杜克力木要逃往国外？”

我说：“姨妈，阿布杜克力木不是逃跑，是到外面去避避风声。现在不这样做不行了。他们说得对，您放心好啦，我保证不会发生意外的。”

“原来你们早就商量好啦！”姨妈又犯起愁来。阿巴索夫强作笑容说：“妈，我很快会回来的。”

哈希汗姨妈双目失神地默不作声。

“大妈”，杨凤仪安慰老人家说：“您放心，有库茨明大哥作向导，不会有有什么事的。”

库茨明爽朗地说：“有我们的上帝，有杨小姐他们的天老爷，还有您们的胡达保佑我和您的儿子。”听了这话，哈希汗姨妈才擦了擦泪水。看了看库茨明和其他人，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库茨明又半开玩笑地说：“这就对了！我们俄罗斯人，是不兴用眼泪为上路的人送行的。”

“姨妈，我们和您一样，大家都非常爱护阿布杜克力木。”我坐在哈希汗姨妈身边，轻轻抚摩着她的肩膀说，“为了人民，为了您，也为了我们大家，阿布杜克力木需要暂时离开您，您答应了吧？”

姨妈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说：“好罢孩子！只要这样对阿布杜克力木安全，那就让他去吧！近来，我一直提心吊胆，夜里睡不踏实。去吧！我相信你们，相信赛福鼎不会把阿布杜克力木带到有危险的地方去。”说完，姨妈微微笑了，大家这才松了口气，都感到很高兴。

深夜，阿巴索夫和库茨明悄悄离开伊宁，沿着伊犁河北岸，避开大路，西向潜行。快到惠远时，又顺着一条弯道拐下去，走了一程，他们决定在一片茂密的芦苇地里稍

作休息，便把马的前蹄并排拴住，解下马鞍和笼头，让它们去吃草，两人则以皮囊和马搭子做枕头躺下休息。阿巴索夫思前想后，毫无睡意，躺了片刻便坐了起来。他打开皮囊，想取本书看，顺手抽出一本汉文书一看，是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临行时，杨凤仪装在他挎包里的，并附耳告诉阿巴索夫：“里面有一封信。”临行匆匆，阿巴索夫当时没有来得及细问，直到这时，他才掀动书页，找到了信，只见信上写道：“这本书是你在旅途中的伴侣，迷失方向时可做你的灯塔，斗争时将给你力量。——你的朋友杨凤仪”。这件礼品和杨凤仪那言简意赅的赠言，顿使阿巴索夫无比振奋，他和杨凤仪之间的美好往事，不禁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 和幼儿谈心

突然，从芦苇外边传来一阵隐约的马蹄声。阿巴索夫警惕地向那边望去，一面急忙把库茨明叫醒，一面迅速把书装入皮囊。这时，由远而近听见有人说话：“看，马蹄印朝这边过去了，这里可能有人。”阿巴索夫和库茨明急忙向马跑去，他们解开拴马蹄的绳子，刚要备马鞍，四个骑马的人扬鞭向他们奔来，很快就将他们围在中间。其中一个留有花白胡子的胖子问：“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阿巴索夫回答：“我们去霍尔果斯，在这里休息。”

“去霍尔果斯不走大路，来到芦苇丛中干什么？”胖子说完，不等回答便以命令的口气对旁边几个人说，“把他们捆起来。他们若不是坏人，就是走私犯！”

旁边那三个人立即下马，把阿巴索夫和库茨明捆了起来，接着备好马鞍，把他俩扶上了马。扶阿巴索夫上马的那个哈族青年，动作并不很粗暴，阿巴索夫善意地瞧了他一眼，又看地上的皮囊，哈族青年拾起皮囊挂在阿巴索夫的脖子上。他们押着阿巴索夫和库茨明向东，穿过芦苇丛，前面出现一块草场。一条渠水从草场流过，渠边有两顶毡房。四个人把阿巴索夫和库茨明的手反绑着，分别带进两顶毡房，拴在毡房木架上。

拴阿巴索夫的这顶毡房是一顶不大的普通毡房，木架因长年烟熏火燎已变成黑色，木架上的毛毡破碎不堪，好几处开了洞。房内除了几床打了补丁的被褥和几件简陋的炊具外，别无它物。一位上了年纪的哈萨克族老妇人在毡房里收拾东西。她不时偷看一眼阿巴索夫。毡房中间架着一个旧火炉，一个大约刚满周岁的男孩正在炉旁玩耍。那个青年不时进出毡房。要走的人先后都走了，过了一阵，青年回到毡房里。他看了看阿巴索夫，问：“你渴吗？”阿巴索夫点了点头。他提起火炉上的茶壶，倒碗开水又掺了点牛奶，稍稍放凉之后，把碗捧到阿巴索夫嘴边让他喝下。阿巴索夫渴极了，这时哪怕一口水都是非常宝贵的，

没想到竟给他喝了一碗奶水。他一边喝，一边瞧那双手捧碗的青年，尽管这青年竭力不看阿巴索夫，但两人的目光却不期而遇。阿巴索夫从这青年的眼神中，感觉到他没有恶意。他看上去3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膀大腰圆，相貌和善。阿巴索夫喝完奶水，表示了谢意，并说：“我们不是坏人，也不是走私犯。”

那青年用半信半疑的目光，把阿巴索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回身对老妇人说：“娘，我去看看牛群。”说完便走出了毡房。

那老大娘头发灰白，额上布满皱纹，长年繁重的劳动，已将她的背压驼了。阿巴索夫慢慢开始和她搭话。开始，当阿巴索夫提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时，老大娘只是看看他，并不回答。随后，阿巴索夫讲了许多激起她同情的话，他说：“我也有和您一样的老妈妈。她和您一样，是一位慈善的好老人……”听到这里，老大娘对阿巴索夫投以同情而不知所措的目光。阿巴索夫趁此机会深深动情地说：“大娘您也有和我一样的儿子，假如您儿子也象我这样，凭白无辜地被人抓去交给国民党，您一定会和我妈妈一样，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同样，您会日夜向胡达祈祷儿子平安无事，时刻盼望您儿子回到您的身边。刚才，我已对您儿子说了我们不是坏人，我求您解开我的手。您放心，我绝对不会逃跑。”

这些话打动了老大娘，怜悯心终于起了作用，经过短暂

踌躇，老大娘一边替阿巴索夫松绑，一边说：“我可怜你的妈妈。……但是，在我儿子没有回来之前，你不能出去。”

阿巴索夫揉了揉发麻的双手，背靠房架坐下休息。老大娘打开餐布，摆上食物，又倒了碗奶水，让阿巴索夫吃。她自己则坐在一边替小孙子补衣服。

阿巴索夫一边喝奶水，一边看着在炉旁玩耍的孩子。孩子光着腚，脸上又抹了不少炉灰，但这并不能掩盖这孩子活泼可爱的小脸蛋。阿巴索夫看着这自幼就在沙土中滚爬的孩子，不觉心中泛起了一股爱抚之情。他挪动了一下身子，坐到孩子身边。孩子见他是生人，便把身子微微向后挪了一下，看样子并不怕他。阿巴索夫轻轻把孩子抱进怀里，亲昵地抚摸他。孩子没有挣脱，乖乖地依偎着阿巴索夫。阿巴索夫掏出手帕，轻轻擦掉孩子脸蛋上的炉灰和鼻涕。这一切，老大娘都看在眼里。

阿巴索夫象和大人谈话一样对孩子说：“哟，多么好看的孩子！看看我，嗨！这才显出你的白脸蛋来。”他一边擦孩子脸上的污垢，一边逗得孩子发出吃吃笑声。突然，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借这孩子作媒介，把自己想对大人说的话，都对这孩子说出来呢？……想到这里，他轻轻抚摸着孩子，娓娓说道：“瞧你这一身，连条裤子都没有，也没有一件象样的上衣。每天，你能吃饱肚子吗？难说！这能怨你爷爷、奶奶和你的爸爸吗？把这些都归罪于他们，那可太冤枉他们了。兴许，你的爷爷，奶奶在他们小



时候，日子过得比你还苦呢！这些事，你要是问起你奶奶，她准会流着眼泪，向你倒出一肚子苦水，哪怕讲它10天10夜也讲不完。……那你呢？等你长大了，你以为会比他们好吗？当你刚满五六岁，应该上学读书的时候，家里会让你拿上一根树枝，去放巴依的牛犊，从这时起，你就开始过那饥餐饱顿、破衣烂衫的奴隶生活。……不光是一家过着这种苦日子，还有那成千上万的贫苦牧民，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的黑暗：有钱有牲畜的巴依，可以任意奴役穷苦百姓。这还不算，他们手里还握着刀把子哪！他们象杀羊一样，任意宰割人民。你看那草原上死了多少无辜的穷苦牧民！……”

讲到这里，阿巴索夫瞥了老大娘一眼，只见她不停地用衣袖擦眼泪。他接着说：“这个世道能这样继续下去吗？”那孩子好象听懂了阿巴索夫的话，用可爱的小手摸摸他的脸，又揪揪他的耳朵。这时，大娘干脆停下手里的活计，用一只手支撑着下巴颏儿，望着他俩，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了，她看着从孩子降生到满周岁，从没有人逗他这样的欢笑过。这倒不是家里的人不愿这样做，而是因为凄凉的岁月使人无心去这样做。大娘从头至尾留神听着阿巴索夫讲的每一句话，越听越觉得这年轻人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

阿巴索夫感到自己的话产生了效果，便进一步说：“为了摆脱痛苦，就要夺过刽子手手里的屠刀，夺过恶霸

手中的大棒。受苦受难的人民应该起来当家作主。孩子，你还不懂这些道理，但是大人们应该懂。你的爷爷、奶奶应该懂。你爸爸是个好人，我想他会懂的。……我不是坏人，我是受压迫人民的朋友，是你爷爷、奶奶、爸爸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你看到了吧，我们已是朋友了。”

这时，青年进来了，见此情景不禁惊呆了。没有想到，阿巴索夫竟松了绑，和孩子玩耍，居然还象远方来客似地坐在自己的毡房里。

“怎么回事儿？娘，你为什么把他解开了？”

大娘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对儿子说：“孩子，不要惊慌。你过来坐下。这是个好人的朋友，他和我们是一条心。你坐下我告诉你，你也好好听听他的话。”

老大娘拉儿子一起坐在阿巴索夫身边。青年坐下后，想把孩子从阿巴索夫怀里抱过去，可是孩子紧紧搂着阿巴索夫的脖子，不愿找他爸爸。青年看着孩子干净的脸蛋，又看看阿巴索夫，看样子他很想做出一点热情的表示，事实上却显得有些拘谨。阿巴索夫友善地看看他，挪挪身子，给他腾出一块地方，看着孩子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呀！他那样喜欢你，上你爸爸那儿去吧！”说着，把孩子递给那青年。孩子看着阿巴索夫吃吃直笑，高兴地投入他爸爸的怀里。青年把孩子抱在怀里，探询地望着他母亲。

大娘把她为什么替阿巴索夫松绑，阿巴索夫怎么给孩子擦脸，怎么对孩子讲话，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儿子。她说：“孩子，他说应该把刽子手手里的屠刀，把巴依手中的大棒夺过来，这说得太对了。把他放了吧，让他走自己的路去。”大娘的儿子一面抚摸孩子，一面低头听母亲的话。等他母亲讲完后，他仍在低头沉思。阿巴索夫热情地说：“来，咱们交个朋友吧！我叫阿布杜克力木，你叫什么？”说着伸出了右手。

“我叫朱玛泰。”青年轻轻握了一下阿巴索夫的手，随后犹豫地对母亲说：“就怕爸爸不同意，何况区里又已经知道了。”

“想个办法吧！”大娘说。朱玛泰沉思片刻后，说：“这样办吧，我爸爸从区上回来之后，区里会派人把他们二人押走的，到时我也一起走，等押送上路我再想办法。”

朱玛泰显得成竹在胸，很有把握。因此，阿巴索夫觉得毋需再问什么，便以信任的目光看着朱玛泰，再次紧握他的手说：“谢谢你！朱玛泰。”

少顷，外面传来了马蹄声。朱玛泰使了个眼色，很快又把阿巴索夫捆在屋架上。……

太阳快落山了。一条小路曲曲弯弯伸向远方。小路两旁长满了一人高的茂密芦苇。区里的两个警察和朱玛泰正押送着阿巴索夫、库茨明沿着这条小路往区里走去。阿巴索夫和库茨明被反绑着双手，各自骑在自己的马上，皮包

和皮囊也挂在马鞍上。阿巴索夫一边走一边细心地观察小路的两旁，又盯着库茨明，使劲眨了眨眼睛。库茨明猜想事出有因，轻轻点了点头，表示会意。两个警察走在前面，一个背着长枪，一个腰挎手枪。朱玛泰走在最后，有意勒马慢行，远远落在两个警察后面。警察走到一个拐弯处向左拐去，转瞬就见不到人影。说时迟，那时快，朱玛泰三两下很快解开了阿巴索夫和库茨明被捆的双手，然后跳下马去。阿巴索夫让库茨明在马上监视两个警察的动静，自己迅速下马，按朱玛泰的吩咐，把朱玛泰双手反剪起来，按在地上，而后翻身上马，照朱玛泰指引的方向，沿着左边伸延到芦苇中的一条小路飞奔而去。直到二人走远，朱玛泰这才大叫：“快，跑啦！他们跑啦！”两个警察闻讯赶来，朱玛泰躺在地上佯装被打，不停地呻吟说：“他们跑了。”这时警察按朱玛泰指的方向，向右边芦苇丛中的小路，一边追赶一边开枪。阿巴索夫和库茨明则快马加鞭，早已向着伊犁河方向走远了。枪声越来越远了。

当天深夜，阿巴索夫和库茨明来到塔里克。两人催动坐骑，蹚过霍尔果斯河，进入苏联国境。

1944年9月，在伊宁以东的尼勒克县，以艾克拜尔和艾尼、帕提克为首的游击队打响了人民起义的第一枪，并顺利地攻开了尼勒克县政府、警察局和国民党县党部，伊犁专区所属各兄弟民族纷纷响应。

这期间，阿巴索夫积极联络避居苏联境内的各族青

年，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很快组建了一支由他领导的近百人的游击队。苏方给游击队战士全部配备了武器装备。这一年10月底，阿巴索夫率领这支游击队越过边境，很快和尼勒克游击队取得联系，开始着手准备攻打伊宁的作战计划。

## 第五章 在风浪中搏击

### 攻打伊宁

1944年10月3日，在尼勒克的乌拉斯台山林，打响了尼勒克起义者的第一枪，拉开了伊犁人民反对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序幕。

引起尼勒克人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当局于1944年9月掀起的名曰“贡献”，实为掠夺的“献马运动”。起义首先在乌拉斯台山林爆发。后来被誉为游击英雄的哈萨克族青年阿克拜尔和塔塔尔青年帕提克是起义的领导者。随后艾尼和其他人也参加了起义者的行列。

反动当局过于轻视乌拉斯台这个山村响起枪声的意义，他们只出动了少许警察部队，妄图驱散“聚众闹事”的所谓“暴民”。然而，事态发展到了绝非少许警察部队所能应付得了的地步。不久，尼勒克县城附近也陆续出现了游击队的踪迹。反动当局仓促抽调了一支部队，开赴尼勒克县城。

当这支军队尚在途中缓慢行动时，尼勒克县城已被阿克拜尔、帕提克、艾尼等人率领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起义者所攻克。接着，巩留、昭苏等县人民也纷纷举事。反

反动当局在伊宁以东各县的军政建制完全瓦解。他们的势力全部收缩在伊宁，从而造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局部地区兵力集中的优势。因此，攻克伊宁便成为伊犁人民起义成败的关键。

1944年10月初，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率部越过国境后，便立即派人与艾克拜尔、帕提克、艾尼等人联络。同月，阿巴索夫在霍尔果斯县城以北的大西沟山村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攻取伊宁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11月10日为攻取伊宁的时间。计划还规定：帕提克由东部方向，艾尼由南部方向，阿巴索夫由西部方向会攻伊宁。

会后，阿巴索夫率领的游击队战士化整为零，乔装成农牧民，走山路向伊宁汇集。帕提克和艾尼率领的游击队或走山路，或行芦荡，向伊宁以东、以南方向移动。

尽管阿巴索夫等人部署非常保密，但是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反动当局终于发现了我方的意图，在伊宁大肆增设和加固各种防御设施，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突袭各交通要道，妄图搜捕四出活动的游击战士，在伊宁市区则更加残酷地追捕和残害言论、行动可疑的群众。

鉴于新的情况变化，阿巴索夫决定将会攻伊宁的日期提前到11月7日，并将这一决定通知给帕提克和艾尼。

11月6日深夜，阿巴索夫在伊宁新城区六号街一处宅院建起了指挥所，并立即召集了伊宁各地下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阿巴索夫向与会者介绍了会攻伊宁的部署，解

释了提前行动的原因。

阿巴索夫环视了一下与会者，沉着镇定地说：“我们将要和强大的敌人拼搏。在我们面前摆着生死存亡的战斗。只要我们密切配合，英勇杀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国民党还有不少军队，有优良的武器，看起来是强大的，但已被我们包围，成了惊弓之鸟。全城人民已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只等我们打响攻城的第一枪了。”稍停片刻，最后他以必胜的信念结束讲话说：“愿各路英雄明天在城内会师！”他的话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一时群情激越，斗志昂扬，纷纷表示一定要按阿巴索夫的部署战斗，在城内胜利会师。这时，艾里罕吐热要求发言，用他惯用的宗教术语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为了神圣的伊斯兰教，愿我们沿着真主所指引的道路去进行圣战，牺牲者将升入天堂，活着的将成为英雄。最后，我要为大家向真主高声祈祷，真主保佑我们成功。”

就在艾里罕吐热慷慨陈辞的时候，一些宗教上层分子感动得痛哭流涕。接着，阿巴索夫宣布了治安、宣传、军需方面的负责人。最后，经他提议和全体与会者一致同意，会议决定以城西的枪声作为伊宁起义的总信号。随后，阿巴索夫宣布会议结束。各个游击队的负责人立即返回各自的战斗岗位。

1944年11月7日，东方尚未泛白，阿巴索夫乘黎明前的黑夜，率领自己的游击队和一些新加入游击队尚无武器



的青年，早已来到纳威古鲁特乡旺卡迪尔的果园，埋伏在果园围墙后面。围墙前面有一片空地。在空地和果园之间有几排树林和一条水渠相隔。驻守城西的国民党军队，每天清早就在这片空地上操练。天亮了，数百名国民党士兵，编成四人一排的队伍，在一名军官指挥下，跑步来到场地。他们顺着果园围墙，以一班为一组，把步枪交叉架在地上，开始操练。

等这些士兵远离武器后，阿巴索夫向身旁的战士使了个眼色。霎时，游击队战士们越过围墙，猛虎般地扑向空地夺取武器，然后便向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士兵开火。敌军这时乱成一团，一个个抱头鼠窜。在他们还没清醒过来时，大部已被击毙，有的跑出了空地，也被游击队战士追上去击毙。不费多时，战斗大获全胜，我方无一伤亡。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们的士气。

与此同时，城内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很快，城南响起紧密的枪声。阿巴索夫知道艾尼已发起进攻。而城东，却一直听不到枪声。由于帕提克没按预定时间在城东投入战斗，致使阿巴索夫在城西发动攻击后，整个攻城战斗是颇不顺利的。

阿巴索夫迅速集合部队，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发给没有武器的战士，将他们编入队伍，并发出了攻打警察局和活捉警察局长刘秉德的命令。

刘秉德的住所距警察局不远，派去的几名战士刚刚走

到刘的住所附近时，只见刘乘着一辆轻型马车，向警察局仓皇疾驰。战士们高声命令他停车，但马车仍继续向前狂奔。游击战士出于无奈，开枪将刘击中。刘从疾驰的马车上摔了下来，当即毙命。这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这时，攻打警察局的战斗打响了。警察局四周，建有又高又厚的围墙，墙上有垛口，火力很强，战士们一时难以靠近，伤亡人数急剧增加，战斗十分激烈。几经周折，游击队终于攻克了这一顽固堡垒。接着乘胜追击，很快又攻克了伊犁行政专员公署，敌军分别被包围在北大营和飞机场等几处孤立的据点内。至此，国民党在伊犁地区的反动统治的崩溃已成定局。

## 新的斗争

维吾尔族有句谚语说：“城池攻破以后，英雄就多起来了。”事实上，伊宁市尚未全部攻克，“英雄”就多起来了。他们贪天之功，招摇过市，哗众取宠。

1944年11月12日，组成了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艾里罕吐热自任主席，艾克木拜克霍加任副主席。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于政府之外。

同日又通过了九条政府宣言。这个宣言在至关重要的许多问题上，诸如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关系、宗教和政府部门的关系等，都有严重的错误，虽曾遭到以阿巴索夫为首的一些人坚决反对，但在付诸表决时仍以多数通过。

在宣言通过的当天下午，阿巴索夫约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到达时，他正与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和喀斯木江·坎巴尔交谈。

过去，我和阿合买提江有过几次交往，但没有深谈过。不过，我对他的身世、为人和学识早有耳闻。不久前，阿巴索夫又向我详细介绍过阿合买提江的政治见解。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经照面，我和阿合买提江犹如故交。

阿合买提江体态端庄，表情深沉，语调平稳，表现出很高的涵养。

阿合买提江原籍伊宁，童年时随舅父移居苏联潘菲洛夫城。后来就学于塔什干、莫斯科等地。1942年回国，不久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4年10月获释后来到伊宁。

我和喀斯木江·坎巴尔交往很深，因此，对他点头一笑便坐了下来。

阿巴索夫请我入座后，表情严肃地说：“大家都不是外人，请各位来是因为有些紧急情况必须商量。可能你们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请提出来一起商量。”

我抢先说：“今天一早，街上出现了许多旗帜，一种

是绿底上绘着白色星月标志，另一种是白底上用金粉写着‘除了真主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是怎么回事？”。

“赛福鼎大哥，”阿巴索夫思索着说：“情况远比您看到的更为复杂。今天上午，那位老人家凭着人多势众，强行通过了这个所谓的九条宣言。”说着他把三页复写的材料推到我的面前。接着自我解嘲似地说：“现在的情形真有点象应验了一年前我们在那家回族饭馆里的谈话。”

喀斯木江·坎巴尔指着手中的宣言说：“这匹马现在不光是脱了缰，而且正把革命的车拉向邪路上。”

我翻看复写的宣言，情不自禁地说：“从这个宣言的政治纲领、指导思想，以及政策措施等等看来，我们甚至可以肯定，艾里罕吐热等人篡夺了人民的斗争果实！”

阿合买提江表示同意我的见解，他说：“赛福鼎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

“当然，”我继续说：“社会的情绪，群众的觉悟，干部的准备，特别是我们对革命的宣传工作，应该说，现在都不算成熟。尽管如此，只要缰绳还攥在我们手里，我们就应该想办法驾驭这匹马。现在，进步的思想在一部分群众特别是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还有一定影响；更主要的是，阿布杜克力木兄弟掌握着内务部门和宣传部门。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

阿巴索夫征询阿合买提江的意见。阿合买提江点头说：“赛福鼎先生的意见，我看是目前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阿巴索夫又征询喀斯木江·坎巴尔的意见。喀斯木江·坎巴尔说：“我同意赛福鼎的主张，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首要一条，阿布杜克力木要尽快使自己主管的各个部门充分发挥作用。”

意见统一了，对策也有了，大家的心情总算平静下来，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

那天我们在阿巴索夫办公室商量的结果是：喀斯木江·坎巴尔去军事法庭任职，我则协助喀斯木江·坎巴尔参加军事法庭工作，阿合买提江去报社作编辑工作。

九条宣言公布以后，遭到了社会进步力量的抨击和反对。迫于形势的压力，艾里罕吐热等人不久对九条宣言作了部分修改，但是其中许多带有根本性错误的观点仍旧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对立的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便一天天明朗和尖锐起来。只是鉴于当时伊宁尚未全部解放，离革命政府所在地不到三公里之处，战斗正激烈进行，反动军队正凭借飞机场等据点负隅顽抗。因此，我们都不愿意因政见分歧激化内部矛盾，给反动派以可乘之机。决定集中力量，解决当前的主要危险——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 革命的目的

随着起义迅速发展，斗争形势也越来越复杂。未几，伊犁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分别被包围在霍尔果斯、绥定、惠远等设防据点。他们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广大农村和牧区，甚至各县城近郊地区也都被起义群众所控制。然而就在这时候，起义者发现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杀后被扔进警察局监狱厕所和水井里的近百名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等少数民族百姓的尸体。一时社会沸腾，民情激愤。混入革命内部的反动分子，利用这一机会，煽动民族仇恨，把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当局暴行的义愤，转变成对汉族人民的敌视。于是几天之间，接连发生了抢劫、甚至杀害汉族百姓的事件。因此，肃整社会治安成为燃眉之急。阿巴索夫动用了内务部、警察局和军事法庭的全部力量加以制止。在最紧张的日子里，阿巴索夫甚至授权内务部人员就地枪决那些滥杀无辜的暴徒。同时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保护汉族百姓的第一个决定。

一天下午，我赶回军事法庭。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正好阿巴索夫也在。他身着皮夹克，脚蹬长统靴，半坐在喀斯木江·坎巴尔的办公桌上正对电话筒大声下达命令：

“坚决制止！什么？他们不听？那就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是的，这是我，阿布杜克力木内政部长的命令！”阿巴索夫猛地挂上电话耳机，愤怒地对我说：“在伊犁河边，一帮混蛋要枪杀俘虏。内务部人员制止时，他们还叫嚷要先开枪打死内务部人员。这还了得！”

我表示同意阿巴索夫的意见，并向他们谈了社会治安情况。我说：“现在街上秩序很乱，肇事的动机和原因极为复杂，引发暴乱的因素又非常多。我建议将城市的汉族居民暂时集中起来加以保护。”

喀斯木江·坎巴尔说：“我同意赛福鼎先生的办法，阿布杜克力木兄弟，你的意见如何？这个问题由你决定！”

阿巴索夫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陷入沉思。最后，他认真地对喀斯木江·坎巴尔说：“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把赛福鼎大哥的这个办法实施到绥定、霍尔果斯、清水河、芦草沟这些汉族群众聚集的地方？”

阿巴索夫的各项决定很快便在伊宁、霍尔果斯、清水河、芦草沟等地实施。给每个成年汉族居民发了盖有内务部公章、写明“不准伤害”字样的袖章。集中在伊宁的汉族居民在飞机场攻克后，即予遣散。集中在惠远的汉族居民于第二年，即1945年春季社会治安全面恢复之后，也予遣散。

防范民族仇杀和清除民族隔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不仅所用的方法不同，而且面临的难度也不一样。对前者，借助强制性手段，经过坚持

不懈的努力，各地的社会治安很快得以肃整，基于仇视的暴行很快得以杜绝。而民族之间由于仇杀而造成的情感上的隔阂，却一时很难消除。特别是大部分汉族居民，一段时间仍疑虑重重，惶恐不安。因此，阿巴索夫在雷厉风行地肃整治安的同时，又于11月中旬亲自登门拜访当年在新疆学院的汉族同学吴辛武，请他尽快出面主持出版汉文报纸。吴辛武是新疆学院政经系本科毕业生，和阿巴索夫同时被流放，他家是伊犁汉族大户。阿巴索夫在沙湾县受监管时，吴辛武也在阿勒泰受监管。吴辛武没有辜负阿巴索夫的重托，很快出版了三区革命的第一张汉文报纸。

阿巴索夫又邀请杨凤仪的父亲杨从，以及伊犁商界的代表人物晏思波等人出面组织汉族文化协会，实际上是汉族居民的代表机构。

不久，发生了一件有意损害汉族居民利益的刑事案件，成为民族问题上两种意见公开交锋的导火线。有几个惯犯闯入一家汉族居民住宅，抢劫了贵重财物，又把事主杀死。警察局逮捕了这些杀人抢劫犯，法院判处首犯死刑。这个判决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些人声称：“杀死一个黑大伊(汉人)算得了什么！”另一些人则叫嚷：

“哪里有为了一个黑大伊去杀死一个穆斯林儿子的道理！”并威胁要劫法场。

当问题最后呈报内务部长决定时，阿巴索夫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执行枪决的命令。



在处决犯人之后，阿巴索夫利用其政府委员的职权，在政府委员会上正式提出必须明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动议。他尖锐指出：“要么我们就干脆称我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解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人民将作何处理？要么，我们就明白不误地阐明，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各民族被压迫人民。但是，我要声明，如果有人主张我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解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我将坚决反对，并且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反对！”

洞悉阿巴索夫性格的那些反动宗教上层分子，完全明白阿巴索夫所说的“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反对”这句话的含意和分量！

在以阿巴索夫为首的一些进步委员的坚持下，委员会作出了进一步保护汉族居民生命、财产的第二个政府决定。阿巴索夫依据这一决定，通过内务部和军事法庭，进一步肃整了社会治安。很快，社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

度过了艰苦的1944年至1945年的秋季，国民党当局在天山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的反动统治体系全部瓦解。距乌鲁木齐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成了三区革命武装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对峙的分界线。

## 斗争受挫

同年2月，在酝酿整顿三区游击队为民族军的会议上，有人突然发言，提议授予艾里罕吐热以元帅军衔，委他以指挥全军的权力。这是艾里罕吐热及其追随者们策划已久的一个阴谋。一人提议，其他人起哄附合。于是，这个动议便在一片嘈杂的支持声中通过。阿巴索夫和我们几人在会上处于绝对少数。于是，这位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阿訇兼郎中，一夜之间便成为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主席兼元帅。

但是，就是艾里罕吐热圈子里的同伙心里也明白，靠艾里罕吐热指挥军队与国民党作战，无异是异想天开。于是帕林诺夫开始被任命为中将衔总指挥，不久由中将衔的伊斯哈克拜克接任总指挥。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广场上举行了民族军成立授旗仪式和阅兵式。一贯头缠白布、身着一通到底长袍的艾里罕吐热，这天改穿军装，腰扎武装带，肩扛元帅肩章，头戴特制大沿军帽，突然出现在人们的前面，使人感到又惊讶，又滑稽。

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此时任三区政府副秘书长）和我们一帮人作为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被安置在检阅台的中排座位上。我回头看看，在我们后面的座位上坐着艾

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和赛甫拉也夫等人。阿巴索夫悄悄对我耳语说：“这真是个时代的怪胎！”说着，他目示了一下身着戎装的艾里罕吐热。

整个仪式按部就班逐一进行。轮到这位元帅授旗时，他将一面旗帜交给受旗的军官。这时，鼓乐齐鸣，阅兵式开始。艾里罕吐热不知道是该以手抚胸行穆斯林礼呢，还是应将手放在帽沿上行军礼？他时而将右手放在胸前，时而又举过帽沿，当把手举到帽沿时，整个手心竟朝外翻了。面对艾里罕吐热这幅滑稽像，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艾里罕吐热虽然不通军礼军仪，但他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愚蠢无知。他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一次，他突然对我说：“世界上有各种管理办法，我觉得布尔什维克的办法最好。”当时，我对他的话并没怎么介意，因为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象他这样思想离奇古怪的人与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

1945年年中，我的正职艾比布·尤尼奇病逝，由我接替他的职务，并列入政府委员。过了一段时间，根据阿巴索夫的意见，我很快拟出了恢复汉族学校的建议案。实际情况是：当时三区各地的汉族学校停办了差不多半年多了。

在政府委员会上，我的建议被艾里罕吐热一口否决，并说：“我们这里将成为伊斯兰的圣洁之地，我们将以神圣的伊斯兰法管理这块土地。”

这使我猛然想起他不久前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布尔

什维克的管理办法好。”其含义原来如此！问题提出得这样突然，阿巴索夫又没有参加会议，阿合买提江又是列席会议，因此我心里作好了应付不测的准备。这时，艾里罕吐热的追随者们却眉飞色舞，争先发言。有的说：“真主是伟大的，按真主的意志行事绝无差错。”有的说：“艾里罕吐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他们急不择言，以致在艾里罕吐热的称谓上乱嚷一气，这边喊“元帅阁下”，那边叫“主席阁下”。有的索性大嚷“吐热①老人家”……发言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不是“完全同意”就是“坚决拥护”。

最后，艾里罕吐热说：“一切学校统统由宗教厅监督。”

艾里罕吐热这种突然袭击的伎俩，引起我极大愤慨，我不客气地质问：“宗教厅监督的内容是什么？”

艾里罕吐热尽量克制住自己，一字一顿地说：“对一切实行监督！”

我也极力用一种平稳的语调问：“如果是那样，政府的性质不就变了吗？”这时艾里罕吐热的追随者们坐不住了，他们中有人竟大嚷：“赛福鼎，你的本意是反对宗教监督，为什么不挑明呢？”

我顿时感到受辱。我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诸位都不肯对监督的内容作出说明，那么，问题就无法解决。”

---

① 吐热是老爷的意思，在艾里罕的名字之后缀上“吐热”，既有老爷的意思，又是尊称。

会场一时喻声大作。使我感到慰藉的是，阿合买提江居然安之若素，不为所动。他压低声音不慌不忙地说：“如此重大的问题，全体委员不到会，不能讨论吧！”这时，有人恶狠狠地冲着阿合买提江大叫：“阿合买提江先生，你说说现在谁不在场？”

“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先生！”阿合买提江对他们的叫嚷不屑一顾，以沉着的口气回答。

艾里罕吐热作了个手势，喧闹声稍许平息一些。他用 在礼拜寺颂经的口吻说：“真主的意志，穆圣的理想，古兰经的戒律，这就是我们的准则。包括政府委员在内的我们，都是真主的奴仆。多一位，少一位都是无足轻重的。”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清清嗓子之后，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对于我建议的宗教监督，诸位还有什么见解？”

他的话音一落，便有人带头高呼：“拥护元帅阁下！”

“拥护主席阁下！”艾里罕吐热紧接着说：“真主作证，我的建议已被通过！”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我朝阿合买提江看去，正碰上他向我投以无可奈何的目光。整个会场只有他和我袖手而坐。掌声一过，艾里罕吐热便大声宣布：“散会！”

我走出会场刚踏上蹬板正要上皮包车时，阿合买提江向我走来，半开玩笑地问：“此行何处？”我说：“去阿布杜克力木家。”阿合买提江说：“好，我也去。”

我们的马车在阿巴索夫的院前停住后，我和阿合买提

江先后下车。没等我们上前敲门，杨凤仪就开门迎了出来。我们走进屋里，只见阿巴索夫斜躺在床上。他的面前，摆着刚收拾起来的碗盏，看来是吃过午饭不久。想不到才几天时间，阿巴索夫竟被病魔拖垮了，脸上又黄又瘦。他患的是伤寒病。杨凤仪拉出桌边的座椅，请我们入座。

阿巴索夫生病后，一直是杨凤仪在侍候。对于杨凤仪的理智、善良和执著的品格，我与阿合买提江以及阿巴索夫的其他朋友们都是十分敬佩的。眼看着杨凤仪因护理阿巴索夫日渐消瘦，我们曾几次劝她休息休息，由我们来替换她。她每次应允之后，至多休息一两个小时，便又亲自来护理。阿巴索夫的母亲一提起这些，就不由得掉泪。

阿巴索夫不等我们开口，便微笑着说：“赛福鼎大哥的表情告诉我，二位好象在外边吃了点亏。”

我走到穿衣镜前，镜面里的我确实是一副沮丧、阴暗的表情。我转身对阿巴索夫说：“你算是说得不错。我和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先生，就是想来向你谈今天会议的情况。”

杨凤仪听说我们要向阿巴索夫谈会议情况，马上起身对阿巴索夫说：“我到隔壁房间去，有事叫我！”

“等等，”我拦住了杨凤仪说：“那些家伙靠别人的施舍混日子时，你已经和阿巴索夫兄弟并肩战斗了，你是

最早的革命者之一，有什么好回避的！”

阿合买提江忙给杨凤仪拉过椅子，亲切地说：“杨小姐，我们都是自己人。”阿巴索夫看着杨凤仪重新入座，感激地向我们点了点头。

我和阿合买提江把会议情况详细向阿巴索夫作了介绍，最后我余怒未消地说：“看来，必须二次革命。”话一出口，我又感到自己用语不当，随即补充说：“当然不是托洛茨基所谓的二次革命。”我这唐唐突突的话不禁把他们三位逗笑了。

“看来，今天赛福鼎大哥真有点动气了。”阿巴索夫尽量想把气氛缓和下来，故意以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这样说。

这天下午的谈话，虽然不时穿插一些幽默、诙谐的话题，但是，我们四人都清楚意识到局势的严重。直到伊犁火电厂的汽笛突然拉响，我们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5点30分，是下班的时候了。我和阿合买提江这天居然连午饭都忘了吃。当意识到已是下班的时间，这才顿感饥肠辘辘。杨凤仪好象看出了“问题”，歉意地说：“我真糊涂！大概赛福鼎大哥和阿合买提江大哥今天连午饭都没吃吧？”不等我们回答，杨凤仪马上起身说：“我这就给您们做晚饭去！”

饭后，阿巴索夫心情沉重地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着是艾里罕吐热胜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重新思考问

题！”

分别时，大家心情都很郁闷。

这一年，艾里罕吐热往各个部门都派驻了一名宗教顾问，在军队团一级单位也派驻了阿訇。



## 第六章 毅然和爱然

### 情爱初萌

毅然和爱然，是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和杨凤仪的笔名，以后又成了他俩相爱的标志和进行革命斗争时使用的名字。

毅然<sup>①</sup>是一种落叶乔木，枝干光滑挺拔，叶子呈掌状分裂，秋季变成红色或黄色，非常好看，其木质坚韧，是优良树种。在绥定县山区，有一个地方叫毅然卡布克，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带长有茂密的毅然树而得名的。据阿巴索夫讲，在这一带生长的各种树木里，他最喜爱毅然树。因为这种树挺秀、美丽、木质优良、不易腐朽，既能美化大自然，又能为人类奉献优质木材。嗣后他在伊宁中学任教时，写了一篇文章，需要用笔名发表，他就用“毅然”作为自己的笔名。以后他给杨凤仪说明为什么用“毅然”这一树名作自己笔名时，杨凤仪听了表示她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过不久，杨凤仪也需要一个匿名，她就取名“爱然”。以表示她对阿巴索夫的爱慕，表明她所爱的是和毅然树一

---

① 是槭树的维吾尔名称。

样具有坚强意志、永不变质的品德高尚的人。

“毅然”和“爱然”这两个名字把两个革命青年互相爱慕之心紧紧地联接在一起，成为他们志同道合的象征。随着时间推移，他俩越来越觉得这两个名字饱孕着各自人生道路上的深刻内涵。因此，他们在尔后的书信往返中一直使用着这两个名字。在一起相处交谈时，也亲昵地互称“毅然”和“爱然”。

杨凤仪出身于伊犁名门大家。父亲名叫杨从，曾任伊犁商会会长，人们习惯叫他“杨会长”。然而，杨凤仪的思想根本不属于她出身的那个阶级。她在伊宁读完初中后，就去乌鲁木齐上省立女子中学。当时，阿巴索夫也在乌鲁木齐省立一中求学。杨凤仪和阿巴索夫一样，也是女子中学的一位活跃分子。女子中学和省一中相隔不远，在两校学生互相交往中他们相识了。据阿巴索夫说，他第一次见到杨凤仪时，并非因为她长得眉清目秀，体态动人，主要是她那进步的思想 and 敏锐的观察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凤仪也对阿巴索夫有种无法言状的好感。从此，他俩开始接触、来往。

杨凤仪就读于省立女中时，正值许多共产党人在女中任教。潜移默化，这位女中学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熏陶和影响。阿巴索夫在伊宁与杨凤仪相处的短短数月间，相互接近的政治观点，使他俩很快成为过从甚密的朋友。

据阿巴索夫说：“杨凤仪在乌鲁木齐女中时，就对理

论学习发生了浓厚兴趣，在共产党的引导下，她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学得了初步的理论常识和革命道理。”在伊宁期间，她又着重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后她又和阿巴索夫一起反复学习了这两部著作。有时，她选出自己在学习中没有弄懂的问题，如怎样联系中国和新疆的实际，解放新疆，拯救人民于水火，使新疆各族人民走苏联人民的道路等问题，同阿巴索夫一起讨论。每次讨论，最后总是归结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盼望共产党早日解放全中国、解放全新疆，彻底打倒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点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对提高他们两人的理论水平，无疑是很有益的。

情爱初萌的这一对青年男女，都越来越感到对方在自己心灵上的位置。但是，他们一个是维族，一个是汉族，民族的不同，象一条鸿沟，横隔在他们中间。这是今天的青年很难理解的。

阿巴索夫讲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他俩正在教师休息室里交谈。杨凤仪的一位好朋友小赵进来了，她对阿巴索夫的态度极为冷漠。阿巴索夫感到很尴尬，便出去了。离开房间不远，就听见小赵的吵嚷声，阿巴索夫正要回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正好上课铃响了。下课后，阿巴索夫问杨凤仪发生了什么事。杨凤仪告诉他，小赵发现她和阿巴索夫亲近以后，前几天便对杨凤仪极为不满地说：“你

怎么和缠头交上朋友了？”今天，小赵见到她俩在屋里坐在一起交谈，更不由火冒三丈，一气之下冲进屋里。阿巴索夫出去后，小赵恶狠狠地说：“你那么亲热地和缠头坐在一起，干脆嫁给他好了！”杨凤仪说：“其实，我还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嫁给维族人，又有什么呢？”小赵听后怒不可遏地把杨凤仪斥责了一顿。

从此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阿巴索夫和杨凤仪的面前变得更加突出了，两个人都在冷静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只是不象学习理论一样，把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就是了。对于这样严肃的问题，杨凤仪在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果断地做出了“我嫁给维族人又有什么呢？”的答复。她自忖：我嫁给维吾尔人到底为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我能嫁给他吗？他会要我吗？他有这个勇气吗？我爸爸、妈妈又会说什么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中。阿巴索夫则想：她说“嫁给维族人又有什么呢”，瞧这姑娘多么坚决！她能正视因民族偏见而产生的社会舆论的压力，真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位多么好的姑娘！但是目前的社会环境允许我和一个汉族姑娘结婚吗？……想到这里，他觉得眼前荆棘丛生，不免踌躇起来。但一想起杨凤仪的话，他两眼又发出兴奋的光采……好长时间，他俩都未向对方吐露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俩都从对方的眼睛里觉察出了爱情的火花。

## 情 丝 不 断

到了1944年的下半年，阿巴索夫的秘密革命活动越来越紧张，担子也越来越重了。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把各族人民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斗争行动，并通过思想政治、宣传组织等工作，为起义积极做好准备。为了搞好这些工作，有必要及时掌握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运动的阴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特务和军事活动。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杨凤仪给予阿巴索夫以有力的帮助，有时她甚至做了不少阿巴索夫的其他战友无法做到的工作。杨凤仪的哥哥名叫杨风沛，他也是一个倾向进步的青年。因工作之便（担任伊犁行政专员的私人翻译），他每天接触国民党当局的大量内部机密，杨凤仪便通过她哥哥获取了国民党当局的大量情报。开始，杨凤仪向她哥哥询问内部情况时，她哥哥疑虑重重，不大愿意讲。后来，他慢慢认识到妹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为劳苦大众争自由、得解放，使他受到了很大鼓舞，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加之他平时目睹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对反动政权早已失去信心。当他明白了妹妹和阿巴索夫急于了解国民党反动派内幕，正在从事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之后，便开始主动给杨凤仪提供情报。

在革命斗争中，通过不断接触加深了解，阿巴索夫越

来越认识到杨凤仪是自己生命的“力量”和“保障”，他对杨凤仪寄予了无限的希望。1944年6月24日，阿巴索夫在写给杨凤仪的信中说：“你写的那篇东西我已看明白了。从此起我对你抱着无限的希望呢！”

“朋友：您，只有您才会给我生命的力量！……我知道，您，只有您才是我生命的保障……”

同年8月30日，阿巴索夫在写给杨凤仪的一封信中，称杨凤仪是“我忠实的朋友”，信中说：

“您早已在他和他同志的眼中，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女人，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因此我对您说，决定我和我几十个同志的命运的政治问题，而且我以后打算并且很愿意向您报告决定几百青年命运的政治问题呢！”

杨凤仪的父亲知道女儿和阿巴索夫的来往后，就对女儿冷淡起来。一天，吃晚饭时，父亲向杨凤仪警告说：“不许你和缠头来往。”杨凤仪说：“他不是缠头。”并反问：“维吾尔人都是坏人吗？”这使她父亲更加气愤。

“缠头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父亲把筷子狠命地往桌上一甩，继续说：“这些人反对我们汉人，10年一小反，30年一大反。他们杀了我们多少汉人，你知道吗？现在伊宁又开始动荡了。”

“您不要生气，爸爸，我不能同意您的话。首先，要找出维族人为什么反对汉族人的原因。”杨凤仪毫不示弱地看了父亲一眼，语气平和地继续说：“汉族当官的可以

任意杀维族人，维族人无法忍受起来反抗，难道这能原谅汉族当官的，而去指责维族人民吗？这样太不公平吧！”

“你给我闭嘴！”父亲怒吼起来。他全身颤抖着说：

“你是一个汉族孩子，你懂什么？你竟敢在我面前袒护反对你的民族的缠头，以后你要再和什么阿巴索夫来往……”

“好啦，好啦，吃饭吧。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话也值得生那么大的气吗？”杨凤仪的母亲打断了丈夫的话，接着对杨凤仪说：“你也不该和你爸爸犟嘴。回你屋去。”说完把杨凤仪领进了里屋。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下来。但是，这不是父女之争的结束，恰恰相反，是更大争吵的开始。但是任何人也未曾想过父女之间这一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竟会以女儿自杀而告终。

第二天，杨凤仪将她和父亲的争执，自己痛苦的心情告诉了阿巴索夫。这一情况也使阿巴索夫深感不安。阿巴索夫开始认识到，问题并不象他想的那样简单，脑际不由闪过一种不祥的预兆。但是为了安慰杨凤仪，阿巴索夫冷静地说：“这不奇怪，你爸爸如不这样说，那才是怪事哩！汉族人和包括维族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仇恨，造成这一仇恨的原因在汉族统治者。他们一方面压迫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又惧怕少数民族，你父亲也是其中之一。不少属于上层阶级的汉族人，他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民族，而是自己的财富，这是自然的。”杨凤仪以茫然的

目光静静地听着阿巴索夫的话。阿巴索夫看了看坐在身旁的杨凤仪，继续说：“这虽然是你们父女之间的争论，但它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重大矛盾。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你父亲本人的因素外，社会舆论也对你父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是更大、更主要的因素。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不仅来自你们汉族人一方，同样也来自我们维吾尔人一方。有一些维族人，也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惊小怪，议论纷纷，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则以我们的关系为借口，别有用心地对我进行诽谤，造谣中伤。这些都是民族隔阂和宗教偏见造成的，是旧的世俗观念的产物。目前，我们处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的首要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我不是说从今天起就终止我们的关系，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的命运已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在今后的个人生活中，同生死，共患难，这是我们的决心。我坚信，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我们是光明磊落的，任何邪恶势力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阿巴索夫说到这里，停下来看一下杨凤仪的眼睛。只见杨凤仪那满面愁容已荡然无存，双眸迸出希望之光，她坚定地说：“你的话使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我的心是永远不会变的！”听到了杨凤仪的心声，阿巴索夫感到极大的欣慰。他说：“你不必再和你父亲争论了。再争论下去，不会出现什么好结果，相反，会使你们父女关系更加紧张。我们另想办



法。总有一天，你父亲会改变态度的。”

阿巴索夫这样说，是他对未来抱有希望，同时，也是为了安慰杨凤仪。但是，如何越过眼前的鸿沟，他并没有十分的把握。

## 阳光下的冰块

三区革命初期，社会秩序动乱的时候，阿巴索夫为了防止意外，把杨凤仪等数家汉族安顿在自己家里保护起来。当社会秩序好转后，他们就搬回了自己的住处。这期间，阿巴索夫和杨凤仪的交往更密切了。有时，杨凤仪就住在阿巴索夫家里，帮助阿巴索夫分检、整理从国民党政府和警察局的档案中弄来的材料，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初，阿巴索夫身患严重的疟疾，卧床不起。因医院秩序较乱，便决定在家里为阿巴索夫治疗。杨凤仪也就在家里陪伴和侍候阿巴索夫，一直到他病愈。

曾有几天，阿巴索夫连续高烧，不省人事。哈希汗姨妈对儿子的病情深为担忧。姨妈看到杨凤仪一连几夜不睡觉，眼睁睁地守候在阿巴索夫的床前精心侍候，不由深为感动，由此她对这位汉族姑娘产生了感激之情，并彻底改变了对姑娘的态度。有一天，我听说阿巴索夫的体温又急剧升高，处于半昏迷状态，便急忙去看他。只见阿巴索夫躺在床上呼吸急促，不停地做些使人听不清的呓语。杨

凤仪守候在床边。哈希汗姨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啼哭，见了我，马上擦泪请我进屋。我见姨妈两眼下陷，脸色苍白，心绪不宁地直叹气，便安慰她：“姨妈，您不必担心，阿布杜克力木的身体素质好，有医生的精心治疗，又有杨姑娘的细心服侍，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姨妈听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有所放心似地说：“感谢胡达，但愿情况和你说的一样，孩子。”说完又擦了一擦眼泪。为了暂时解除老人心中的忧愁，我把话题引向了杨凤仪。我以试探的语气指指阿巴索夫的房间问：“姨妈你看那姑娘怎么样？”她一听，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嘴角现出了微笑，欣慰地说：“孩子，这姑娘不同一般的黑大伊，是个贤惠的好姑娘。”我听后心想，一个汉族姑娘能得到哈希汗姨妈的喜爱，看来杨凤仪的确不是一般的汉族姑娘。但是，姨妈能不能同意杨凤仪做自己的媳妇，这还难说，还需要做工作、等待。

我差不多每天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时，都要去看一看阿巴索夫。他每次见到我都显得格外高兴。哈希汗姨妈也愿意和我聊天。一天，我下班去看望阿巴索夫，院子里静寂无声，人们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影响阿巴索夫休息。他的体温开始下降，我去时，他刚刚入睡。医生嘱咐让他好好休息，不许惊扰。我轻手轻脚地踏上台阶，走过前廊进入外屋，在走近阿巴索夫的房前时，听见从屋里传出一个汉族姑娘的歌声。我轻轻地推开门向里一瞧，只见阿巴索夫

闭目躺在床上，在床头的桌子上摆着一部留声机，杨凤仪把身子倚在桌上，正在听唱片。我以为阿巴索夫在睡觉，正要退出时被杨凤仪察觉了。她站起来，关掉了留声机，说：“请，请进来，赛福鼎大哥！”阿巴索夫马上睁开眼，抬起头，高兴地说：“是赛福鼎大哥吗？请进来！请进来！”当我走近床边时，他已坐了起来。杨凤仪在他的身后垫了个枕头，我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阿巴索夫对杨凤仪说：“你放唱片吧。这也是赛福鼎大哥喜欢听的一支歌曲。”杨凤仪重又打开留声机，从留声机里发出一位汉族姑娘深沉的歌声。说真的，我的确喜欢这支歌，尽管我还不懂歌词。我觉得，这支歌深沉悲愤，歌曲的伴音也很低沉。这是一支当时的流行歌曲，据说是叙述一位姑娘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她对现实的不满，也反映了广大青年对现实的不满。以前，我去阿巴索夫家时，他也是放这个歌曲，一边听，一边赞扬这位姑娘的勇敢精神。

歌放完了。我拉起阿巴索夫的手，仔细看了看，发现他虽很瘦弱，但精神还好。我问他：“你好了吗？”他轻轻说：“高烧已退了，我精神好多了，只是感觉困乏，老是觉得睡不够。我已好多日子没有听歌曲了，所以刚才又想听这支歌曲。”说完，他向杨凤仪要过那张唱片，让我看写在唱片中心目录纸上的一句汉语，他说：“这是杨凤仪写的，意思是阳光下的冰块。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不告诉我。你说说这是什么意思？”我笑着对杨凤仪说：

“这只能由你回答了。”她还是笑而不答。我又问阿巴索夫：“你是怎样理解的？”他看看杨凤仪，笑着对我说：

“她是不是说我是一块在阳光下不溶化的冰？”我说：

“我以为，这句话不一定是对个人而言，可能是针对社会上的某种邪恶势力讲的。”杨凤仪微笑着，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她以征询意见似的表情，笑着看阿巴索夫。

“从杨凤仪的表情看，好象你说对了。”阿巴索夫说着，又对杨凤仪笑笑说：“你比我想得深，想得广。”

杨凤仪用掺杂着汉语的维语说：“现在是革命的年代。在全世界，全中国，全新疆，到处都爆发着革命。……各地都出现了共产党，无产阶级在觉醒，在斗争。但是，解放全世界，那是遥远的事。”

“说得对，太阳出来了，但是冰块尚未溶化。”我看着杨凤仪说。

杨凤仪满意地点点头。

阿巴索夫用钦佩的口吻对杨凤仪说：“你想得好，讲得也好！比我站的高，看的远！”

“好啦，你说得太过份了！一个笨姑娘，哪能比得上你这位哲学家呢！”杨凤仪亲昵地斜视着阿巴索夫，笑着这样说。

我说：“你俩都不要争了。哲学家也好，政治家也好，两者结合起来，那不就有利于尽快溶化阳光下的冰块吗！”他俩听后，都笑了。

在杨凤仪家及其亲戚朋友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很快受到了阿巴索夫和以他为代表的三区革命进步势力的坚决保护，很多人免遭杀害，多数人的财产免遭洗劫。这使他们受到深刻教育，认识到在维吾尔人中同样也有好人，消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偏见。他们一反常态，积极支持阿巴索夫和杨凤仪的婚事。而阿巴索夫和杨凤仪之间的纯真爱情，也越来越赢得了阿巴索夫的亲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阿巴索夫患病期间，杨凤仪在床头夜以继日地看护、照料，使哈希汗姨妈深为感动，她越来越喜欢杨凤仪了。但是，在另一部分人中间，阿巴索夫和杨凤仪的关系却成为他们诽谤攻击阿巴索夫的一个口实。他们用最易刺激群众宗教感情的语言，在各种场合下中伤阿巴索夫的声誉。

有一天，一清早阿巴索夫的母亲哈希汗气喘嘘嘘地来到我们家。我和阿依木都大吃一惊，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阿依木赶紧帮老人家取下头巾、扶她入座。不待我说话，老人家就带气地说：“赛福鼎，你是我儿子的朋友，又是他的兄长，现在满街都在议论阿布杜克力木和杨姑娘的事，你们这些当朋友、做兄长的为什么都不过问一下？”听到这里，我心里明白了，不由得一阵兴奋，老人家终于吐口了。但是我要最后试探一下这位老人家，于是故意说：“难就难在杨小姐是一位汉族人，你老人家想过这件事吗？”

“噢，你赛福鼎也说这种话。”姨妈一时发作，大声地说：“阿布杜克力木病了这么长时间，谁能象杨姑娘那样关心他。我早就看出了杨姑娘是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她待我如亲娘。她每天到我家里来，帮我做这、做那，和家里人一样，成了我的好帮手。我和阿布杜克力木一样，也喜欢上这个姑娘了，有这样的姑娘做我的儿媳妇，我就省心多啦。”

阿依木连忙解释说：“这不是他的心里话，他也和你一样，经常夸奖杨凤仪是一位好姑娘。”这样，哈希汗姨妈才消了气。

知道了大婶的态度后，我立即找其他人商量，决定派人去杨凤仪家，向她父母正式提亲。但是我心里很不踏实，因为杨会长是坚决反对自己女儿与阿巴索夫接近的。

事情和我预料的一样，果然杨会长坚决回绝了提亲人的要求。

当晚，我把消息转告给阿巴索夫时，他一语不发，呆坐在椅子上。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痛苦。过了好大一会儿，阿巴索夫慢慢地起身，打开床头桌上的留声机，又放了那张汉文唱片。这本来就有伤感情调的唱片，今天使屋里的气氛变得更加郁闷，而且带点忧伤。

## 遗嘱和誓言

随着阿巴索夫和杨凤仪两人关系的发展，来自家庭和

社会上的那股扼杀他俩之间纯真爱情的邪恶势力也紧逼而来。

尽管阿巴索夫在杨家人受到严重威胁时，曾设法保护了他们，尽管阿巴索夫和杨凤仪真诚相爱已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一切都未能打动杨凤仪父亲的心。随着他俩关系的日益密切，杨凤仪的父亲也越来越反对他们互相来往。在阿巴索夫生病期间，杨凤仪住在阿巴索夫家里服侍他，他父亲认为她这样做是伤风败俗，给自己脸上抹了黑，败坏了汉族人的声誉，觉得无脸见人。因而，对杨凤仪的行为横加指责，限令她断绝和阿巴索夫的关系。杨凤仪的母亲则支持她和阿巴索夫的关系，甚至同意他俩结婚。她常常替女儿说情，想说服丈夫。可是杨会长执意不听，非常固执。有几次他大吵大闹，以威胁的口气说：“你女儿要是嫁给他，我就不要这样的女儿！”母亲对女儿的处境非常忧虑，为了缓和家里的紧张关系，母亲劝杨凤仪说：

“你不要顶撞你爸爸，不要着急，以后或许有什么法子。”

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杨凤仪进行了痛苦的思索。怎么办？听从父命和阿巴索夫断绝关系，她绝对做不到。她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和一切阻力同阿巴索夫继续来往，以至最后结婚！可是，当时的环境又迫使她不能不考虑父亲的警告。因为她一旦被父亲撵出家门，就需要尽早和阿巴索夫完婚。她如果这样做，从当时三区政府的政治、宗教情

况和维吾尔人民族情绪等方面看，一个汉族姑娘(异教徒)嫁给一个维吾尔小伙子(穆斯林)，尤其是象阿巴索夫这样的维吾尔领导干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杨凤仪面临着重重困难。

阿巴索夫知道杨凤仪的处境后(为了体谅阿巴索夫，杨凤仪并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他)，焦急万分，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的确为此事动了一番脑筋，想了不少办法。打通杨凤仪父亲这一关，倒是不难解决的；只要把杨凤仪接到阿巴索夫家里完婚，她父亲也就无可奈何了。但是，在阿巴索夫这边，宗教、民族偏见，传统习俗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要消除这一切障碍，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决心帮助阿巴索夫和杨凤仪冲破这重重障碍，实现他们的美好愿望。为此，我决定一方面尽量关心体贴杨凤仪，同时找和她父亲要好的汉族上层开明人士商量，等待时机，创造条件。

就在我们积极做工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月4日，我在家刚刚吃完早点，阿巴索夫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去他家。他的声音有些急促焦虑，我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当我放下电话赶到阿巴索夫的家时，已是早上8点半了。进了屋，只见他在房里焦急地踱来踱去。见到我，他急忙拿起桌上的一封信向我念起来。尽管他对汉文是很精通的，那天他读信时却结结巴巴，非常吃力，手在



微微颤抖。我当时还不太懂汉语，半天也听不出所以然。我想急于知道信的内容，要他把信翻译给我。信中写到：

毅然：这包东西我希望你能在明天早上来看，在这里我愿意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列宁在敖德萨的时候，有一个退伍的残兵和他要好；当列宁离开，去圣彼得堡的时候，这位残兵送给列宁一封信，上面写着要他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才能打开看。列宁正在做革命工作，在沿途受了很多风波，经过了三年才到了圣彼得堡。打开来一看，上面仅仅写着这样的几句话：我真崇拜你的人格，我真钦佩你的信用，我真恭敬你的支配与忍耐性。毅然，你愿意和我一同做这种游戏吗？

阿巴索夫读完信后，我立即拿起了桌上的大信封，要把它撕开。阿巴索夫一下抓住我的手哀求说：“不要打开，不要打开，赛福鼎大哥！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我毫不犹豫地说：“你不要死心眼，肯定发生了什么事，马上打开！”我说着把信拆开，里边有许多以往的书信、照片和一本红皮日记本。除此还有一封封口的信，我打开这封信，抽出信纸给阿巴索夫让他快念。他看完了信的开头，顿时面无血色，两手颤抖起来。“写些什么？”我感到情况严重，急促地问。“是遗书！……”他艰难地说出这句话后，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我马上看表，已是9点了。我拿起信封，急忙装进衣袋：“快去，快！”我边说边拉着阿巴索夫的手，奔出院子，让他坐在我的马车上，告诉车夫：“快赶车！”让他们直奔杨凤仪家。而后，我让阿巴索夫的车夫套好他的马车后，乘他的车去了机关。

进了办公室，我坐卧不宁，无心工作，急不可耐地等待阿巴索夫的消息。过了一会，阿巴索夫神色恍惚地走进了办公室。不待我说话，他便象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来。我扶他坐在椅子上，我已明白了一切。但是我又怕真的发生我所估计的情况，不知说什么好。阿巴索夫不等我开口，痛哭流涕地说：“完了，杨凤仪完了。赛福鼎大哥，这下我可离开了杨凤仪……”阿巴索夫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见此情，我悲痛万分，泪水夺眶而出。我擦去眼泪，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劝他不要悲伤。等他情绪稍微稳定些后，我拿出“遗书”，让他念。他哽哽咽咽地哭着，念了遗书。

遗书原文：

毅然：

我觉得我现在根本没有向你说话的资格……

我在你面前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可是都要请你原谅……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我完全都错了，到今天我觉得已经没有资格接受你的办法，我不愿意去原谅我自己，我现在已经大胆地判决了她，就让她吃饱了痛苦吧！当你看到这条的时候，这一只可恨而卑鄙的黄羊也就是刚才离开了人间……

阿兄：我在死去的前五分钟，我要求你允许我答应我向你说出下面的几句话：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件东西，我愿意送今生爱了的你，崇拜了的你。你如果不愿意要，随便你将它怎样毁掉，我都愿意。

最后我默祝你：

永远年轻!!!永远快乐!!!

我更希望(新疆)这一部分(革命)成功后,你们能和中国共产党拉起手来,在亚洲的土地上再建立起来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已经没有资格来看这一幅美丽的图画了。  
在临死的最后两分钟都崇拜你的朋友。

爱然

绝笔书

毅然:手枪会和我一同牺牲吧!真有点对不起你……

朋友:你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你说:“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我希望你快乐一点的话,我在九泉之下都甘心。

最后更有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就是你的照片……

我把我的死期延长到今天还是没有……

毅然:

我要求你允许我向你说出下面的几句话,在这个紧张的时间里,我们家里的人一见到枪,他们不知吓得慌成什么样子……

在这个时候,你愿意给他们帮一点忙吗?我现在还向你提这样的要求,不会骂我太无耻吗?

爱然

毅然:当我死去的那一刻,我真不敢想我的母亲吓得成什么样子,她一定会想回家去叫爸爸来,而他也许糊涂得连路都认不得。如果你愿意可怜她和帮她的话,请你现在来一趟,一方面可以将手枪拿走,这个事如果让父兄知道一定感谢你,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手枪,而你能完全……(以下字迹不清)而没有其他的风波,你想在这样紧张的时刻,她们除过感谢你还会有什么呢?

我要求你马上就来,马上就是,子弹排在中间桌子上的抽

屈里。

你再帮我这一次，我来世变成牛羊都会报答你，且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母亲和石太太说有人来，你一定要说是飞子打死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一颗子弹打伤的。不然的话你们的家庭很危险。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你，你如果愿意，希望你常常到我家来玩来吃饭，这样能给她很大的安慰。

毅然：你给我留下了永不能消灭的痛苦！……

爱然

1945 4/3下午3时

我详细地问这些东西的来历，阿巴索夫说：“昨天下班后，我去杨凤仪家，陪她聊天到晚上10点。我告辞的时候，她就将两封信交给了我，她指着一封已封口的信说：‘这封信你回家后看。’她又指着另一个未封口的大信封说：‘看过后你就知道这封信你可以什么时候看。’……”最后，她要求阿巴索夫把手枪留下，说她夜里害怕，担心坏人闯进屋里。阿巴索夫把手枪交给了她。在她送阿巴索夫时，和平时显得不一样，想说什么，又显得迟疑不决。当阿巴索夫开口问她时，她立刻强作笑容，紧紧地搂着阿巴索夫吻了他。在分手时，她没有说平时告别时常用的话“再见”。但面颊上的两行热泪泉涌般地流下。

我让阿巴索夫先回家休息。晚上，我去他家，他仰卧在床上，两眼泪汪汪。桌上放着厚厚的一叠信纸，我拿起来一看，才知道是阿巴索夫写给杨凤仪的悼辞。现抄录如下：

善与我今生最爱、最崇拜的朋友——爱然

爱然：

你不幸而死的那一刻我真愿意我们俩在一个墓穴里，一同永别人间，在九泉底下过永远相爱相敬的日子，决不愿意离开你，但是爱然……

爱然：当时的客观环境战胜了我的主观要求，因此你死去的那一刻中，我真恨我自己，恨当时的客观环境，恨这个世界……

爱然：

你故去的那一天，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糊涂得未能完全的……

而给你送去的一封坦白的求婚书来求你……

爱然：我现在觉得世上最大的痛苦还是“后恨”。因此，那么对于我一颗子弹是可惜的，一个毒辣的刺刀是应该的。

爱然：你的故去成了我一个永不能灭掉的痛苦。可是我决不恨你，一定而且已经原谅你，但是你故去那天起，我却不原谅自己，我愿意随你死去，我真愿意不仅是别人，就是我个人来替你严厉的解决我自己——这个糊涂虫!!!

爱然：你死去了……，你坚毅的思想，你不可比的热情，你伟大的人格，你特有的忍耐性……永远埋在我纯洁的心灵之最深处。

爱然：我愿意你的灵魂在我未死之前，时常陪我工作，陪我实现我们的理想，就是为你的遗嘱而奋斗。只有这样你也许给我以很大的安慰。

爱然：我更愿意有可能的话，就是我自己，没有可能的话就是我的灵魂永远陪你在九泉之下安眠。

爱然：我知道，你真的为我而死了。而现在真的为你而活，你的遗嘱——就是我的生命力。

45.4.4

几天后，半夜 12 时，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的弟弟阿布杜力米提给我打电话，问阿巴索夫上我这儿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来，怎么啦？”他说：“到现在不见他回家，我打电话询问他可能去的任何地方，都说他没有去。”我知道这几天阿巴索夫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要去杨凤仪的坟头，估计他可能在那里。我乘上马车去汉人街后面的坟地，在坟地一侧的小路上站着阿巴索夫的车夫和警卫员。在月光下，我站在围墙的阴影处向墓群看去，看到远处一个人的背影。过去一看，果然是阿巴索夫。他默立在尚未干的坟前，一点都未觉察出我的到来。我过去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这时他才转过身来擦眼泪。夜已很深了。他手持一束鲜花，佇立在坟前，长久默念致哀的神态，使我深受感动。这里倾注着阿巴索夫对杨凤仪的深切的爱和无限的怀念。他把花摆在坟前，我扶他往回走。在我们快走出坟地时，他转过身去，看着杨凤仪的坟，发出了长长的叹息……

在月光下，从隐约可见的坟墓处，仿佛听到杨凤仪在说：“莫要忘记血泊中的妇女。”这句话，是她用自己的血在生前所画的一幅画上题写的词。

我们的脚下是丛生的荒草，泥泞的小路……

## 第七章 披荆斩棘 继续前进

### 斗争在继续

至今，我十分佩服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坚强的意志。到了1945年夏季，阿巴索夫总算从失去爱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杨凤仪逝世的最初时期，阿巴索夫悲痛欲绝的精神状态使他的同志和朋友都十分不安，即便是过去因杨凤仪的事诽谤过他的那些多少还有点良知的人，也都追悔自己的过失。阿巴索夫和杨凤仪的纯真爱情更使他们深为感动，认为他俩算得上是我们时代的一双“莱丽——麦吉侬”。<sup>①</sup>

最终抵消了阿巴索夫感情痛苦的，还是他强烈的政治抱负。

1945年，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声势更加浩荡，地域范围更加扩大。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人民和柯尔克孜人民的武装力量迅速增长。天山南部的重镇莎车、阿克苏等地出现了与国民党正规军公开抗衡的游击力量，喀什、吐鲁番、哈密甚至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统治中心的乌鲁木齐也出现了各种地下组织，进行反对国

<sup>①</sup> 这是一部维吾尔悲剧爱情长诗里的一对男女主人公。

民党反动统治的宣传活动。

大好的革命形势在三区革命领导层中的反应是，政见对立的双方都似乎得到了激励。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等进步力量的代表主张加强领导，迅速发展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为全国解放做好准备。但是，以艾里罕吐热为首的保守势力的代表们则奢望将这斗争纳入他们的泛伊斯兰的思想范畴，在全疆建立他们伊斯兰模式的制度。换言之，建立在结构上完全脱离中国版图的伊斯兰政权，破坏祖国领土的完整。

在一次重大的会议上，艾里罕吐热谈到全疆的斗争形势时，得意忘形地说：“我的话就是真主的话，我的话就是穆罕默德圣人的话。只要我一祈祷，我就会把中国的回民全部解放出来。而后我将登上昆仑山顶，再一祈祷，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将建立伊斯兰政权。”

但是，艾里罕吐热派往各部门的宗教顾问由于缺乏文化和实际工作能力，加之由于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完全失去了他们的“监督”作用，事实上已名存实亡。

艾里罕吐热并未就此罢休，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看宗教厅未能实现他的愿望，又强行成立了所谓的“战士宗教审判委员会”，妄图用宗教手段把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 建立新的组织

1945年夏季，三区革命内两种势力的对立日益严重，斗争日益激烈。在新的形势下，一天，阿巴索夫把几个战友召集起来，谈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设想：建立正确思想指导下的组织。第一步，建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第二步，建立青年组织。理由是，由于宗教势力的膨胀，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入歧途。我们原来的革命目标，除了推翻国民党在三区的反动统治外，没有一条得以实现。封建制度没有触动，劳动人民的地位没有改善，政治民主成为空话，民族平等被完全曲解。

因为教育青年组织青年，是大家都在考虑的问题，过去也交换过看法。听了阿巴索夫的设想后，大家觉得这一设想比较具体，一致同意。讨论的结果，当即宣布成立由七人组成的马列主义小组（后来曾改为哲学学习小组），规定了学习的时间、地点。学习的内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列宁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前两种书都有乌孜别克文版和哈萨克文版，唯有最后一种，只有汉文版。因此决定《新民主主义论》由阿巴索夫亲自口译宣讲。

马列主义小组是一种地下性质的组织。首先，马列主义这个概念就是艾里罕吐热所深恶痛绝的。马列主义解放

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也是与艾里罕吐热等人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回避艾里罕吐热等人自是不待而言的了。此外，我们还需要回避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是由于艾里罕吐热等宗教上层的蛊惑，许多群众对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由不理解转而恐惧，甚至敌视。在一些人的口语中，“红腿子”是被列入贬意词汇中的。

马列主义小组的学习，以各种形式作掩护，如聚餐、郊游、宴请等，不时地更换着地点和时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阿巴索夫表现了极大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他将杨凤仪当年赠送给他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给我们作了透彻的宣讲。这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毛泽东同志，并通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的小组不断地增加着新的成员。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小组成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于1945年底成立了以阿巴索夫为主席的公开的群众性组织——“青年组织”。口号是：“学习、团结、进步”。在内部，阿巴索夫依据《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为青年组织确定了推翻国民党，建立新新疆，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纲领。

就组织结构而言，青年组织是伊、塔、阿三区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出现的第一个群众性革命组织。除了中央委员会，在各县、专区分设了县、专区的工作委员

会，在区级单位分设了支部。青年组织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员就达一万人之多。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其中不少是青年妇女，对于试图建立伊斯兰模式社会生活的宗教上层来讲，这真算得上是一次勇敢的冲击，因为艾里罕吐热等人曾顽固地坚持禁止妇女参加社会活动。

学习的口号激发了青年人追求知识的本能欲望。科学、技术自然地冲淡了迷信、盲从。

团结的口号对于消除民族的隔阂起了很大的作用。青年组织中，汉族青年和其他青年享有绝对平等的地位。他们一起活动，一起学习，一起娱乐。

进步的口号使青年人大胆地去冲击旧的礼教。衣着、社交都不再受宗教的约束。

青年组织的蓬勃发展，对阿巴索夫和他的战友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阿巴索夫在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我们要为明天奋斗”的战斗口号。

有人问：“为明天奋斗意味着什么？”

他说：“准备干部、发动群众、解放新疆、迎接全国大解放。”他分析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干部的准备。准备干部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知识，没有正确的观点，我们将一事无成。1944年，我们受挫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此。”

接着他讲了发动群众的问题。他说：“不是要制造声势，而是形成力量，只有靠这种组织形式的力量，我们才

能抵挡住一切，包括那些最反动势力的代表。”

这是一次极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比青年组织更严密的组织。

阿巴索夫和几位战友一起筹建新组织，并亲自主持了这个新组织纲领和章程的起草工作。1945年11月，新的组织人民革命党秘密成立了，维吾尔语缩写字母为HEP。选举产生了以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七人中央委员会。接着阿巴索夫宣读了人民革命党纲领和章程。

宣读完毕后，阿巴索夫自豪地说：“如有人问人民革命党章程和纲领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可以坦率地告诉他们，人民革命党的章程和纲领没有依据，有蓝本，蓝本就是联共(布)和中共的章程和纲领。”

人民革命党的章程和纲领一致通过后，接着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一致推选阿巴索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研究确定了每个中央委员的工作职责。最后，为了安全和便于开展工作，给每个中央委员取了化名。

七位中央委员的化名是：黎提甫（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伊力旦（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努尔（赛福鼎·艾则孜）、伊力尔（扎克洛夫）、尼加提（赛甫拉也夫）、乔力潘（安尼瓦尔·汗巴巴）、伊力多斯（伊敏诺夫·买买提明）。

这七个化名的第一个字母连写起来便是LENINQI，译音为“列宁奇”，意为列宁主义者。因而在内部我们常常

把人民革命党称列宁主义者党。

人民革命党很快地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并建立了严格的登记制度。迫于形势的需要，这个组织遵循严格的保密制度，甚至联系都采取单线形式。

到了1946年10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人民革命党的成员已发展到15000多人。在伊、塔、阿三个专区和各县都成立专区、县的委员会。同时，在国民党统治的乌鲁木齐市和其他七个专区也积极开展工作：建立组织、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展开有组织的斗争。为了适应工作和斗争的需要，这年8月，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由7人增加为11人。

## 送瘟神

1945年和1946年，在我国，在全世界，实际上是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进行决战的时期。在伊、塔、阿三区，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当以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为首的进步势力以极大的努力进行艰巨的组织工作和政治斗争的时候，以艾里罕吐热为首的保守势力则加紧进行着更大的政治冒险。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摧毁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告结束。当饱经战乱之苦的各国人民尚未尽

情地发出自己内心庆幸的时候，世界的政治势力便开始了新的组合。争占新的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镇压革命运动，对抗革命力量，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进攻解放区，妄图将全国再次拖入痛苦的战乱之中。

国民党为了稳住新疆，解除后顾之忧，向三区政府发出了和平谈判的建议。经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等人研究，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为了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意国民党的建议，拟以和平谈判为主要方式，同国民党继续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并组成了以三区政府委员、大校衔政府军事部长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政府谈判代表团，作为三区政府主席的艾里罕吐热却未能率团去谈判。这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对艾里罕吐热来说，一旦谈判成功，他就会失去“主席”、“元帅”等桂冠，失去他实现泛伊斯兰政权的基地，他的美梦将彻底破灭。因而他便极力反对和平谈判，拣起他造谣中伤、蛊惑人心的惯技，大肆攻击阿巴索夫等同志。说什么“有人要出卖革命果实”，“想讨好黑大伊”，“出卖维吾尔人的利益……”等。特别对阿巴索夫发起了一系列人身攻击，语言之恶毒，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看来，同艾里罕吐热形式上的合作也难以继续下去了。正当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等人研究对策，与艾里罕吐热进行公开斗争的时候，又获得情报，说艾里罕吐热为

了扩大势力，破坏和谈，已派密使去青海和马步芳联络，妄图联合建立包括甘、青两省在内的伊斯兰政权。艾里罕吐热的阴谋彻底败露了。

消息传出后，引起三区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愤慨。他们纷纷谴责艾里罕吐热的罪行，不少过去对艾里罕吐热抱有幻想或追随他的人，也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艾里罕吐热陷入了孤立的绝境。

两种势力的决裂已势在必行，从三区政府的肌体割除艾里罕吐热这块毒瘤的时机已成熟。一些进步人士公开谴责艾里罕吐热的罪行并提出要他辞职。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和我们一起研究后，决定支持群众的要求，一致同意劝艾里罕吐热离职，

1946年6月，艾里罕吐热及其家属搭乘汽车，于深夜离开伊宁，随后离开国境。艾里罕吐热践踏人民起义成果的时期结束了。

从此以后，由正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三区代表团团长阿合买提江取代了艾里罕吐热，担任三区政府主席。

## 同大土耳其主义分子的斗争

本世纪初，在亚洲西部，一批政客提出了突厥语系诸族为同一民族。接着，又给他们这个观点赋予政治内容，声称要建立一个突厥人的国家。这个观点很快被帝国主

义所利用，成为他们妄图用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武器。而那些觊觎我国天山南北地区的殖民主义者们以及国内妄图分裂国家的分子则将这个观点用于他们的反动目的。这种观点后来概括为大土耳其主义<sup>①</sup>。在新疆，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特别是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新疆以后，帝国主义者更是大肆活动起来。事实上，美国、英国很早就在新疆建立了领事馆，他们在反对苏联这一点上显然是一致的。无论是推行殖民主义还是反对共产主义，他们都要在新疆寻找各自的代理人。从我自身所经历的斗争中即可看出，同大土耳其主义分子的斗争，以及后文还要谈到的同乌斯满、尧乐博斯、麦斯武德的斗争，无一不表现为国际、国内斗争的复杂交织。有鉴于此，苏联与之针锋相对地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三区革命，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在30年代，大土耳其主义观点在新疆甚嚣尘上，成为分裂主义的一大思想武器。麦斯武德、买买提明、艾沙等人当时是这种观点的主要鼓吹者。后来新的政局发生了变化，这帮反动分子也都作鸟兽散，或流窜国外，或避居内地，分别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所豢养。

为了对抗和瓦解三区革命，40年代中叶以后，这些人陆续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放出笼。尤其是在和

---

① 原拼写为：PAN TÜR KIZIM



平条款签定以后的最初日子里，他们在新疆更是肆无忌惮，又是结社，又是办报，公然提出“我们的故乡是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的民族是TURK（土尔克，即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以对抗三区方面提出的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社会进步的政治口号。

就其实质来讲，麦斯武德、买买提明、艾沙等人的大土耳其主义观点和艾里罕吐热的泛伊斯兰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分裂国家，妄图建立大土耳其主义指导下的宗教模式社会秩序的目的，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从较深的意义上讲，对麦斯武德等人大土耳其主义观点的斗争，不只涉及到三区方面的利益，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了国家领土能否得以完整的问题。这些大土耳其主义者还一批凶恶的反共反苏分子。

阿巴索夫协助阿合买提江，对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果断地领导了思想领域内反对麦斯武德为首的大土耳其主义思潮的斗争。

联合政府组建的时候，三区方面明确表示，将不与麦斯武德为首的大土耳其主义分子合作，并严厉指出，他们所代表的绝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联合政府成立不久，有一天，在一次私人宴会上，买买提明对阿巴索夫说：“既然我们都是土尔克民族的儿子，代表着民族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携手相处呢？”

“先生，”阿巴索夫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们是不是

代表着民族的利益，这个问题可以先不去讨论。现在至关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我们各自的族属问题。我是维吾尔族人，是维吾尔族的儿子，而阁下呢？”

买买提明一时发怵，不知所对。

阿巴索夫的一个朋友接过话头说：“阿布杜克力木副秘书长，你想知道这个问题吗？不难，我来回答。”说着，他用舞台夸张的举止整整了整领带和西装上衣，用买买曾<sup>①</sup>召唤礼拜的腔调说：“我们的故乡是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我们的民族是土尔克！”他那诙谐的动作，幽默的表情，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只有麦斯武德等人端坐不语。

笑声过后，我对买买提明说：“既然你我并不属于一个民族，那么第二个问题自然就没有必要讨论了。依我看，还是先吃抓饭吧，不要冷淡了主人的盛情厚意。”我这打买买提明身上的一根软棍，使买买提明显得十分尴尬。

第二天，阿合买提江和我谈起头天晚上宴会的情形时，我们对阿巴索夫严正的政治立场非常赞赏，对他的机智和勇敢非常佩服。这是我和麦斯武德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尽管他们派出买买提明这个接受过英国和日本训练的老手，我们年青的阿巴索夫，只一个回合就使买买提明败

---

① 召唤教徒礼拜的阿訇。

下阵来。这怎么能使我们不高兴呢？

这次宴会的情况很快传播了出去。关心三区方面政治态度的人从这次宴会上阿巴索夫与买买提明的第一次交锋中，得到了答案，思想进步的人更加放心了：三区代表在政治上立场坚定，观点鲜明，他们所代表的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而追随麦斯武德等人的思想反动的分子，则从三区代表的政治态度上看到，他们的阴谋是难以在三区代表身上得逞的。从而他们对三区代表由拉拢转而进行公开的中伤和诽谤。他们重复艾里罕吐热的伎俩，造谣说三区代表是一批“红腿子”、“亲苏派”，要消灭宗教等等。这些陈词滥调尽管在伊、塔、阿三区早已破产，但是在其他七个专区一些不明事理的人们中间还有市场。后来，麦斯武德等人对三区代表的诽谤不断升级，蛊惑人心地大肆宣传三区代表背叛了民族的利益。因此，坚决回击这些反动分子，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工作。

我们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这一工作。我们在乌鲁木齐先后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作了大量的宣传。明白无误地申明：三区方面坚决反对麦斯武德等人的观点，在新疆我们要实现的是政治的民主，民族的平等和社会的进步。三区方面的这些政治主张得到新疆各族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乌鲁木齐地区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等其它进步组织和三区代表一起共同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且与人民革命党建立了密切的联

系。

1947年以后，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三区革命进步成员领导的新疆意识形态里的斗争，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页。尤其对阿巴索夫来讲，这在他个人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事实证明，麦斯武德等人是一伙民族败类，他们和国民党顽固分子一起成为镇压和屠杀新疆各族人民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分裂国家的凶恶势力。他们的残余分子，甚至在80年代，还流窜于国外，干着分裂国家的罪恶勾当。

在这场斗争中，体现了人民革命党政治观点的三区代表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全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其明显的证据是按照和平条款在全疆七个专区进行的选举中，支持三区政治主张的人士都以多数票当选。

三区的威望与日俱增，因此各种势力向我们靠拢过来，包括那些一向在各派势力之间进行钻营的一伙伪君子。1947年1月，阿巴索夫召集人民革命党的负责干部开会，分析了全疆的政治形势，同时也排比了全疆各地相继出现的政治性群众组织，最后，确定人民革命党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早年接受过陈潭秋、毛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影响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于1944年11月在乌鲁木齐建立的政治性群众组织，是乌鲁木齐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特别是在争

取十一项和平条款签订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秘密刊物《战斗》，积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大量转载了新华社电讯，不断报道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捷报，是当时乌鲁木齐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喉舌。

为有利于形成核心力量，统一行动，统一斗争，阿巴索夫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精神，在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把人民革命党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的建议。经过讨论，这一建议被一致通过。接着，经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协商并征得他们同意后，于1947年2月3日召开了两个组织领导人的联席会议，重新选举了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主席<sup>①</sup>。中央委员会主席继续由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担任。赛福鼎·艾则孜、赛甫拉也夫、艾斯海提、李泰玉、阿布杜拉·扎克尔(扎克洛夫)、安尼瓦尔·汗巴巴、陈锡华、罗志、禹占林、于昌志等人任中央委员(新入选的汉族同志和禹占林同志均系原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负责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在取得一致认识的基础上，安排了当前的任务。

---

<sup>①</sup> 会上曾有人建议合并后将组织名称改为民主革命党，并增选艾斯海提、李泰玉二人为副主席，与会同志对此未提出异议，决定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其他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的意见后再定。后征求意见时，他们不同意。因而这个问题未形成最后决议。以后，也有些同志称合并后的组织为民主革命党。

1948年8月1日，成立了阿合买提江为主席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后来改名为“新疆民主同盟”（简称新盟），人民革命党党员一律转为盟员，成为新盟的骨干力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创办了《前进》报，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增强民族团结，实现解放、自由、平等等明确的政治口号。

## 第八章 为维护和平条款而斗争

### 和平谈判

1945年和1946年是三区革命成就最显著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顽强地拼搏着，建立并领导了人民革命党，重创了艾里罕吐热等人的气焰，还组织并领导了对天山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进军。阿巴索夫不仅显示了他的组织才干，也显示了他的军事才干。

这两年不论是在阿巴索夫个人历史上，还是在三区革命的历史上，甚至在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处理新疆问题的过程中，都是重要的两年。为了镇压伊、塔、阿三区人民的武装起义，国民党当局不断更换新疆的首席官员。先后在新疆投入兵力达八万人之多，牵动了他们在西北地区的部分军事布置。但是，这一切全无济于事，三区人民的武装力量仍然屹立在天山北部3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945年10月，国民党最高当局，终于承认三区革命势力是国民党与之谈判的对象，并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建议。

国民党最高当局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显然是经过了严重考虑的。蒋介石虽然在新疆步步失利，但是，这时他对苏联还是心里有数的。因为，早在当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

美、英首脑为了换取苏联的对日作战，不惜牺牲远东有关国家的利益，后由美国作为中介，促成国民党当局同苏联政府谈判，并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条约中明确表示，无意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同样的，这个建议的提出，在三区内部也引起一阵风波。问题又回到1944年11月的那个时期，即如何认定三区人民武装起义的性质。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进步力量的代表，一开始就认定起义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实现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社会进步。尤其是阿巴索夫建立和领导人民革命党以后，这个政治目标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民革命党内部明确地提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新新疆的口号。不言而喻，进步力量一致认为：三区革命是中国内部人民群众反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因此，我们主张在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但是，艾里罕吐热为首的保守势力则要在承认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条件下，与国民党接触，否则便拒绝谈判。这个主张的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伊宁起义的最初的岁月。当时，他们利用篡夺的权力发表了那篇九点宣言极端错误观点。实际上那就是他们政治主张的总体现。他们的目的是要肢解国家领土。这也是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进步力量决心驱逐艾里罕吐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5年10月17日，三区革命方面和国民党当局开始谈



判，地点在乌鲁木齐西大楼。

三区代表团在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的领导下历时八个多月，几经周折，经过顽强斗争，终于与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十一项和平条款。

阿合买提江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了卓越的才干。他的为人，他的知识，尤其是他那为维护人民利益而勇于牺牲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博得了全疆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艾里罕吐热被驱逐之后，阿合买提江成为三区革命政权的首脑。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的时候，他作为三区方面的首席代表出任联合政府的第一副主席。从此，他便以深受群众信赖的领导人而闻名全疆。阿巴索夫则以联合政府副秘书长的身份全力辅佐阿合买提江，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宣传鼓动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因而也赢得了全疆人民的尊敬。

和平条款签订后，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首的三区代表，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贯彻执行和平条款的工作，希望通过落实条款精神，推动新疆的和平民主事业，实现社会进步，逐步改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局面。因而，他们博得了全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欢迎。但是，迫于形势才在和平条款上签字的国民党当局，只是把和平条款做为自己一时赖以喘息的权宜之计。和平条款的墨迹未干，国民党顽固分子就迫不及待地制造事端，妄图使和平条款成为一张废纸。为了维护和贯彻和平条款，三区代表和国民

党顽固分子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阿巴索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斗争中的突出表现，我至今记忆犹新。

## 击溃乌斯满

对于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首的三区代表维护和平条款的诚意，国民党顽固分子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响应，更没有激起他们的责任感。

实际上在和平条款签订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就在为自己物色破坏和平条款的代理人。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的时候，被任命为省府委员的乌斯满没有到任。处心积虑破坏和平条款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注意到了这个人物，尤其是注意到了这个人物的政治动向。经过多方面的审视和权衡，他们确定乌斯满作他们在三区的代理人。

乌斯满早年在阿勒泰专区揭竿而起，反对过盛世才的反动统治。他所追求的目的，是要作新疆的世袭封建统治者。因此就其实质而言，他与艾里罕吐热、麦斯武德等人是一致的。因此，不论是从思想感情的角度讲，还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讲，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首的进步力量与乌斯满都是格格不入的。当三区领导层在政治观点上截然分为两派的时候，尤其是在人民起义成果被反动宗教上层篡夺了的历史条件下，乌斯满被任命为阿勒泰的专员，

理解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当时，尽管国民党新疆当局对乌斯满与三区进步力量之间的龃龉早有觉察，但远没有达到足以信任乌斯满的程度。直到1947年7月1日，乌斯满拒绝以三区代表身份进省赴任之后，他们方确信乌斯满是他们完全可以用来对付三区人民的工具。在其后的日子里，国民党顽固分子与乌斯满进行了多方联系，终于沟通了他们的关系。

1946年12月，阿合买提江以聚餐的形式，在乌鲁木齐南花园自己的临时住宅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阿巴索夫、伊斯哈克拜克·穆努诺夫，还有我。为了掩人耳目，我们都偕同各自的夫人，故意驱车穿行于通衢大道，然后在国民党宪警便衣的眼皮下，长驱直入阿合买提江住宅的大门。

我和阿依木到达时，阿巴索夫和夫人已早于我们提前到达。这时，我们只等伊斯哈克拜克·穆努诺夫同志了。约莫过了20分钟，伊斯哈克拜克的卧车停在了阿合买提江的住宅前的空地上。不等我们出迎，伊斯哈克拜克便偕夫人进了客厅。真不愧是军人的动作。

伊斯哈克拜克·穆努诺夫将军出生在新疆乌恰县的一个柯尔克孜牧民家庭。他体格魁梧，身躯挺拔，加上那配有中将军衔的军装，更显出他特有的军人气质。他的内心比他的仪表更令人敬佩。他为人坦率，厚道，性格爽朗。他虽然身居三区民族军总指挥的要职，但是，不论在前线的战壕

里，还是在后方的营地中，他对待下属，尤其是对待士兵，犹如父兄一般。因此，他受到民族军广大将士的由衷爱戴。

对于三区革命来讲，伊斯哈克拜克的功绩既不取决于他的军人仪表，也不取决于他的豁达为人，而在于他卓越地指挥了民族军在伊、塔、阿三个专区对国民党军队一系列成功的战役。他有极强的责任感和惊人的判断能力，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抵制艾里罕吐热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行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伊斯哈克拜克到达后，阿合买提江立即请我们进入他的客厅套间的书房。夫人们留在客厅由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夫人玛依努尔招待。

这次小型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就是确定对待乌斯满的措施。我们坐定后，阿合买提江同志严肃地说：“从阿布杜克力木掌握的大量情况看，乌斯满正在成为破坏三区革命的邪恶势力。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果断的决定。现在，先请阿布杜克力木把乌斯满最近的政治动向介绍一下。”

阿巴索夫习惯地转动着手里的双色铅笔，将乌斯满近几个月来与国民党顽固分子勾结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

他说：“乌斯满是反共、反苏的野心家。尽管他过去反对过盛世才，但是，他的目的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其做新疆世袭统治者的美梦。过去，艾里罕吐热等人支持他，把整个阿勒泰地区交给了他。他便把阿勒泰地区做为个人的资本，在艾里罕吐热的袒

护下，在阿勒泰地区搞残酷的封建统治，处处和三区政府分庭抗礼。我们赶走艾里罕吐热后，他本能地感到失去了靠山，甚至预感到下一个就该轮到他。在这种情况下，乌斯满便产生了另寻主子的念头。”阿巴索夫喝了口水，继续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看，从我们决定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开始，乌斯满便背着我们派人和国民党当局勾结了。因国民党一时不明乌斯满的真正意图，加之和谈即将开始，怕事情败露后影响和谈，采取了暧昧态度。和平条约签订、成立联合省政府时，作为省府委员兼阿勒泰地区专员的乌斯满拒绝进省赴任，明确向国民党表白他不承认自己是三区代表。毫无疑问，乌斯满此举博得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信任，他们加紧了与乌斯满的勾结。”阿巴索夫继续说，“从我们截获的最新情报看，乌斯满和国民党顽固分子几经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交易是：乌斯满以公开宣布阿勒泰地区脱离三区政府，欢迎国民党军队进驻阿勒泰地区为条件，换取国民党财经援助和武器、弹药和装备。为了保持联系，国民党的特务和电台已进入阿勒泰。”

对乌斯满的这些罪恶勾当，以往在一些内部会议上我也听到一些，但没想到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感到惊愕。同时又为阿巴索夫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如此大量的情报，感到由衷的高兴，尤其对阿巴索夫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工作深感钦佩。阿巴索夫看看我既惊愕又满意的神

色继续说，“情况万分紧急，如果乌斯满的罪恶勾当得以实现，将会给三区革命造成极其被动的局面，从而延缓我们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的步伐，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当机立断，除掉乌斯满，以解我们心腹之患。为此，民族军应立即投入战前准备。至于国民党军队开进阿勒泰的问题，在我们和国民党尚未就整个三区的边境地区如何防守问题取得一致协议之前，他们还不会贸然向阿勒泰公开派军队。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主要是要严防国民党顽固分子把武器弹药偷运进阿勒泰地区。”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接着说：“有关乌斯满这一时期的政治勾当，阿布杜克力木谈得很详细。军队情报部门截获的乌斯满近期与国民党往来书信的内容，也证明阿布杜克力木谈的情况是确凿无疑的。达列里汗掌握的情报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早已等待我们尽快作出消灭乌斯满的决定。我同意阿合买提江和阿布杜克力木的意见，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尽快消灭乌斯满这支邪恶势力。”

轮到我发言时，我表示坚决支持他们三位的意见。这次会议决定委托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立即着手制定消灭乌斯满势力的作战计划，大体确定了在冰雪溶化之前完成对乌斯满的作战。这是因为错过这个季节，春草复苏后要在偌大的草原上追逐乌斯满等人，就很不容易了。

会后，我们步出阿合买提江的书房时，已经是午夜10点多了。冬季的乌鲁木齐，10点多钟已经是相当晚了。夫

人们在餐桌边就座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在那动荡的岁月，她们早已习惯了这种不规律的生活。

当夜的“聚餐”零点才结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拜克将军和我的卧车一辆接一辆从南花园大门开出时，透过汽车车窗，只见那些乔装成卖瓜子、修皮鞋的国民党军警特务们，不停地跺着脚，正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发抖。

1947年1月，民族军一举击溃了乌斯满匪帮。乌斯满惊慌出逃，流窜到奇台、木垒一带。国民党顽固分子与乌斯满的勾结，也由秘密转入公开。这样，支持乌斯满和反对乌斯满，就成为三区代表与国民党顽固分子冲突的一个导火索。

三区方面委派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列里汗·苏古尔巴也夫少将兼任阿勒泰专员。很快肃清了残存的敌对分子，有效地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局面，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和平条款的第一次尝试。

达列里汗·苏古尔巴也夫将军出生在阿勒泰县的哈萨克族家庭，在达列里汗的身上体现了哈萨克族富于正义感的民族特性。1942年，他在布尔津县第一个举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不久，由他率领的游击队便驰骋在阿勒泰草原上，开创了三区革命之先声。

## 针锋相对

1947年2月25日，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一手策划下，

国民党的部分官兵乔装成平民百姓，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近万人，高呼：“拥护中央政府！”“反对三区特殊化！”“打倒阿合买提江！”“打倒阿巴索夫！”“三区的人滚回去”等口号，向联合省政府驻地进发。到达省府后，暴徒们高叫：“冲进省府去！”“我们要见阿合买提江！”“阿合买提江滚出来！”……边喊边冲，顷刻间，人群大乱。乘混乱之机，受国民党顽固分子唆使的一些亡命徒，暗中开枪，向人群扔手榴弹，死伤多人，妄图嫁祸于三区，挑起更大的事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误以为这是三区方面干的。他们在亡命徒的“杀死阿合买提江！”“活捉阿巴索夫”的狂叫声中横冲直闯。他们闯开了一道又一道隔门。最后，那些策划这次事件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和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热合木江和我一起被困在一所套间办公室。暴徒们狂叫：“阿合买提江出来！”

“阿巴索夫出来！”在这紧张的时刻，阿巴索夫悠闲地坐在窗台上吸着莫合烟，阿合买提江仰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而那些策划了这一事件的先生们则卷缩在角落里，不知所措。

暴徒们开始用器物撞击我们所在办公室的门窗。阿巴索夫坐在窗台上，平静地摆弄着手枪，对警卫人员说：

“如果暴徒闯进来伤害阿合买提江大哥，我们就开枪打死他们。然后，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用于我们自己。”说完用手枪指了一下角落里的人，



接着，阿合买提江对角落里的一伙人说：“死，我们是不怕的。今天，这间办公室要是流下一滴血，明天，全疆人民起来将把你们彻底打倒，你们将成为千古罪人。”那些人忙央告说：“我们绝对没这个意思，请不要发怒。”阿巴索夫说：“如果诸位真的没有这个意思，那么只需你们向外面的军人下一道‘向后转！’‘齐步走’的命令，骚乱马上就会平息。不信，你们自己试试。”

这场由他们策划的骚乱，果真由他们自己出面收场了。这就是国民党顽固分子一手制造的“二·二五”事件。

在“二·二五”事件中，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表现了大智大勇。他们一眼就看穿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幕后导演的这场闹剧。事实证明他们对事态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30年后，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到有些惊心动魄。

应该承认，当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环境。一方面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对和平条款的蓄意破坏；另一方面，是一些人对和平条款无意识的破坏，这些人尽管不完全属于三区方面，更谈不上受三区派遣，但他们在感情上确实倾向于我们。可惜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局势。阿巴索夫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完全不掺杂个人感情，这一点使我们为之折服。1946年底，一个叫乃买提江的鲁莽的小伙子，从乌鲁木齐来到吐鲁番，声称是受阿合买提江派遣来领导吐鲁番起义的。这时正值吐鲁番民主选举完县政府成员，三区方面的代表阿布杜热合

曼·穆依提任县长，巴吾东·玉素甫任公安局长。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这个小伙子的突然出现，引起国民党驻军的严重关切。由于此人到处以阿合买提江的名义招摇撞骗，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吐鲁番县长迫不得已用电话和乌鲁木齐联系，要求弄清此人的身份。电话转到阿巴索夫家里，阿巴索夫当即下令吐鲁番县长阿布杜热合曼·穆依提严加制止，并派人将乃买提江押解到乌鲁木齐。当时有人指责阿巴索夫处理得有些过分。阿巴索夫说：“我们革命者正大光明，既然签字了就要遵守，何况我们的这点成绩得来不易，是数以千计同胞的鲜血换来的。和平条款，既不允许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也不允许那些盲动分子破坏。”

事后，阿巴索夫向阿合买提江报告了处理情况，完全得到了阿合买提江的认可。

需要针锋相对的时候，阿巴索夫也能作到寸步不让。

1946年10月，乌纳巴依和道来提汗的游击队在哈密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他们不断夺取、炸毁从内地送往新疆的武器弹药，搞得国民党驻军不得安宁。

张治中派出省府秘书长刘孟纯，要求和我们就哈密游击队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决定派阿巴索夫与刘孟纯谈判。开始，刘孟纯提出的条件是：一、停止活动；二、低头认错；三、缴出武器；四、解散游击队。阿巴索夫回答：

“一、根据和平条款之精神，我们愿意向他们做工

作，劝其停止游击活动。二、要他们低头认错，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无错可谈，应该由迫使他们起来进行反抗的国民党当局检讨自己的错误。三、至于武器，要他们缴出，我想他们是不会接受的，只能由他们自己保存，可否，这问题应由他们考虑决定。”

第一次谈判因分歧很大而告吹。两周后，游击队的活动加剧，刘孟纯不得已又来找阿巴索夫要求再谈谈。阿巴索夫仍然坚持自己原先的立场，寸步不让。经过数次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达成初步协定：一、哈密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二、武器由他们自己保存。三、游击队负责人在哈密安置适当的工作。四、上述三点征得游击队的同意后才实施。谈判以对人民有利的前提下告终。

刘孟纯是国民党精明的政治家，平时和我们接触时，刚愎自用，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经过这次较量后，他在内部无可奈何地说：“他们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软骨头。在他们里边，尽管阿布杜克力木年纪最轻，可他胆略过人。对他们可不能等闲视之。”

按照协定，阿巴索夫前往哈密，和哈密游击队领导人乌纳巴依、道来提汗进行协商，征得他们同意后，一切均按协定处理完毕。

## 抵制麦斯武德

国民党当局既然决定撕毁由他们签定的条款，那么，

就很难指望他们会从乌斯满失败的教训中有所省悟。1947年5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委派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命令。这是他们蓄意破坏和平条款的第二次尝试。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三区方面对大土耳其主义分子麦斯武德的严正立场。

任命一经公布，社会立即哗然。进步力量坚决谴责国民党顽固分子蓄意破坏和平条款的阴谋；反动势力，尤其是麦斯武德、买买提明、艾沙一伙大土耳其主义分裂分子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则一时甚嚣尘上，又是颂扬，又是欢呼；大部分群众则感到无所适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一天中午，阿巴索夫急匆匆来到我家，向我通报了南京政府这一命令公布后社会各界的反响，并提出立即召开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议，研究时局，确定对策。我表示同意，并提出刻不容缓，越快越好。我们决定当天晚上就召开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议。同时还决定，由于时间仓促，外地中央委员都不通知。

当天晚上7时，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在阿巴索夫住宅的客厅召开。

阿巴索夫在宣布开会的时候，就会议的议题作了这样的说明：“应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仓促地举行会议。它说明情况是相当严峻的。因此，今天的会只规定一个议题，那就是讨论时局和我们的对策。”

尽管我们没有来得及向与会委员们事先通报情况，但

是，绝大多数委员对于今天发生的突变都已有所耳闻，个别因忙于具体事务而对此毫无所知的委员，也从会议的气氛，尤其是从阿巴索夫关于会议议题的简短说明中，预感到事态的严重。

阿巴索夫接着说：“几个月前，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乌斯满来破坏和平条款，妄图挑起新的事端，他们的阴谋在今年1月彻底破产了。今年2月他们制造‘二·二五’流血事件，又遭到彻底失败。现在他们又起用麦斯武德来企图达到他们的目的。一切都很清楚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已经堕落到了与大土耳其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同流合污的地步。如果我们容忍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们势必也要和麦斯武德同流合污。而这是我们党的立场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我建议人民革命党全体党员对麦斯武德采取坚决的反对的态度。必要时，我们宁可不要和平条款，也要坚持我党的政治立场，绝不与大土耳其主义分子合作。”

那天的会议上，我一直坐在阿巴索夫的身边。我从来没见过阿巴索夫象今天这样义愤。只见他颈上的动脉血管高高隆起，有力地挥舞着手臂。虽然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压低声音，但是，我仍然能听得到他说话时强烈的胸腔共鸣。我甚至感到，只要有一个诱因，他的义愤会立即转化为强大的感情爆发力。

那天的会议气氛严肃而激烈。发言的同志坚决谴责国

民党顽固分子与麦斯武德等大土耳其主义分子同流合污的罪恶行径，一致赞同阿巴索夫的建议，表示绝对不与麦斯武德合作。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午夜时分。阿巴索夫让自己的司机将几位离家较远的同志送回去。大厅里就剩下我和阿巴索夫了。回忆会上的情形，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突然萌发。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兄弟，不，同志，您总是这样充满信心。”

第二天一早，阿巴索夫和我来到阿合买提江的住宅。阿合买提江见了我们高兴地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听听你们对当前时局的看法。”阿巴索夫说：“我们都想到一起了。真是不谋而合呀！”阿合买提江问阿巴索夫：“你看麦斯武德这伙人还会干些什么勾当？”

阿巴索夫说：“看他们现在的气势，如果他们不怕地狱之火烧他们的嘴巴，他们大概连地狱都会一口吞下去。我们应明确表明态度，决不和麦斯武德等民族败类合作共事。”接着把他在昨天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议上讲话的精神重述了一遍。

阿合买提江接着又问我的看法。我说：“麦斯武德这伙人今天如此兴高采烈，按理说也是应该的。因为大土耳其主义分子尽管从30年代起就在新疆蛊惑人心，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得势。今天，这个反动思潮

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扶植下，一跃而成为占全国六分之一土地上的执政者。由此可见，国民党顽固分子已经墮落到了比新疆现代史上所有的反动分子都不如的地步！”

阿合买提江听完后说：“现在，我们要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无误地阐明我们坚决不与麦斯武德等大土耳其主义分子合作的态度。同时，我们还要向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尤其是向广大维吾尔人民——我们的同胞，揭露麦斯武德等人的丑恶行径。我想全疆各族人民也都有这样的要求。”

三区代表公开拒绝了与麦斯武德合作，并抵制省参议会，致使麦斯武德粉墨登场宣誓就职的丑剧草草收场。三区方面，通过自己的刊物和全疆各地进步力量所掌握的宣传工具，猛烈抨击了麦斯武德等大土耳其主义分子的反动立场，揭露了他们极不光彩的个人行为。麦斯武德、买买提明、艾沙等人一时声名狼藉，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与此同时，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首的三区代表的声望大大提高了。结果，一度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人士，也公开表示支持三区方面的立场。

## 支持吐、鄯、托人民起义

1947年6月，天山南麓的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爆

发了人民起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根据和平条款，省联合政府负责清查赎还盛世才时期没收的“逆产”。吐、鄯、托三县均有一批“逆产”需要归还原主，但当时恰值盛夏之际，正是吐、鄯、托三县收割的季节。原主要求立即归还土地，而“逆产”使用者则坚持庄稼收割后才肯接受赎款归还。这完全是“逆产”主与“逆产”使用者之间的纠纷。纠纷的双方既包括有汉、回等民族，也包括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纠纷的双方既不是按阶级组合的，更不是按民族组合的。只要双方能够达成一项折衷的办法，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吐鲁番的县长阿布杜热合曼·穆依提正在尽力调解这场纠纷。

然而，蓄意破坏条款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支持当地驻军向汉、回“逆产”主提供武器，将这场“逆产”纠纷恶毒地演化为民族矛盾。吐鲁番县雅尔湖乡成为第一个导火点。6月初，一批汉、回“逆产”主携带枪支到雅尔湖乡勘察地界，声言要在三天之内全部毁掉“逆产”地上的庄稼，收回土地。6月中旬，数十名维吾尔村民在村长赛甫力的率领下持械驱赶了“逆产”主。这些维吾尔村民全都是“逆产”使用者。这些被列为“逆产”的土地，是他们几年前从盛世才政府手中分到的。他们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这些土地上有着指日待割的庄稼。对于大多数“逆产”使用者来讲，这些庄稼可能就是他们全家赖以生活的唯一



财源。

维吾尔村民驱赶汉、回“逆产”主的消息传出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一方面在吐、鄯、托三县频繁调动和部署军队；另一方面，开动所有宣传工具恶毒地诬陷三区方面策划了这一事件。

吐鲁番县长阿布杜热合曼·穆依提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是吐鲁番县的第一任民选县长。

“逆产”事件发生之后，阿布杜热合曼·穆依提一连数次走访当地驻军，要求他们不要干预，并保证县府当局有能力处理这一事件。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些颇有点声望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早已设下了陷阱，布下了机关。

在乌鲁木齐市，省联合政府的机关大院里，一日数次地传递着吐鲁番事件的消息。这些消息中有许多都是国民党顽固分子为了耸人听闻而杜撰出来的。

那几天，我因病在家休养。一天，临近下班的时候，阿巴索夫来到我家。我急于知道情况，没等阿巴索夫坐下就急切地问：“吐鲁番的情况怎么样了？”他直视我片刻，语气平稳地说：“已经到了公开武装冲突的地步。”

我说：“可是，你怎么还显得若无其事？”

他淡淡地笑了笑，然后自己用桌上茶炊里的开水兑了一杯红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赛福鼎大哥，吐鲁番之事已成定局。一切都是他们策划的，但他们绝不会如愿。因此我们紧张与否已经毫无意义。”他的沉着、冷静缓和了我过

于紧张的情绪。我问：“那么，眼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阿巴索夫在桌子上不停地转动着手中的空茶杯。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方才我们得到消息说，阿布杜热合曼·穆依提县长和公安局长巴吾东·玉素甫已经逃出吐鲁番城廓，只是还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我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他说：“考虑到敌人可能会窃听我们的电话，所以阿合买提江大哥要我来，一方面看望您的病情，另一件事是，看是在你家里，还是阿合买提大哥的家里……”

我明白他的意思，立即打断他的话说：“阿合买提江先生公务很忙，我还可以勉强走动，我们到他家去。”

他说：“那好，晚上8点我们等你。”

我8点准时到达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的住宅。阿巴索夫的卧车已经停在阿合买提江客厅前的空地上。还没等我的车停稳，他们已经迎出客厅。平时，我们之间很少有这样的礼节程序，这一次大概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我有病在身，才多此一举。

我们一同进入客厅，公务员摆好茶点后，随即离去。我们三人围坐在一条长方形的桌子旁边。我留意地察看了下一他们俩的表情：虽然没有平时的轻松和幽默，但他们却显得非常平静。

阿合买提江询问了我身体恢复的情况。其实，三天前他专门到我家探望过。我想，这是阿合买提江大哥有意要

缓和我紧张的情绪。我揣测他对目前和未来的突变，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有了这个念头，我紧张的神经也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阿合买提江介绍了吐、鄯、托事件的背景和过程之后，概括地说：“现在，那里的事件不再是纠纷冲突，而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起义。起义群众已经组合成游击队。有消息说，游击队今天正在围攻胜金口国民党驻军营地。”

阿巴索夫接着说：“方才，刘孟纯对我说，围攻胜金口的‘暴民’有六千人之多。我说：‘刘秘书长，您虽然没有带过兵，但不至于连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懂吧？按照你们军队的编制，这六千人将是好几个团的兵力，你不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吗？’”

阿合买提江说：“他们夸大游击队的人数，无非是想为自己的属下败北开脱责任。如果他们那些不争气的属下接连败北，他们也许会把游击队的人数夸大到万人，甚至数万人以上。”

阿巴索夫说：“他们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恶化局势，加剧不安，为他们彻底毁坏条款，在新疆进行法西斯统治创造条件。”

那天，我们的主要精力用于讨论如何应付和处理吐、鄯、托起义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力争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最后，阿合买提江和我一致赞同阿巴索夫的意见：支持人民起义，决定立刻作好以下三件事：

第一、通过我们自己的舆论工具，广泛宣传吐、鄯、托人民起义的原委，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事端的阴谋。

第二、尽快与吐、鄯、托游击队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结构和动向。

第三、责成民族军立即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组织营救和接应。

当时，伊斯哈克拜克将军不在乌鲁木齐，因此阿巴索夫被委以实施三项任务的重任。

我感到决裂已经不可逆转。于是我提出：实施这三项措施的最终结果将是什么呢？

阿巴索夫沉思片刻，果断地说：“随时准备与他们决裂。”

阿合买提江补充说：“只能是这样，也必须是这样。”

新疆近百年历史上的又一转折点就这样确定了。我感到一阵轻松，下意识地拉长了领带的扣结，将衬衣领扣解开，想借此挥发掉因为精力集中而忘却的周身过多的热量。这时我才注意到大街上传来的阵阵手风琴声和充满活力的青年男女的歌声。我记起，这原来是乌鲁木齐最好的7月之夜。

当刊登了吐、鄯、托起义详细报道的伊犁各报在乌鲁木齐以及全疆各地散发之后，劳动人民群情鼎沸。各地进步组织或集会游行，或散发传单，号召人们奋起斗争，推

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方面惊恐万状。他们调动军队，广布暗探，大肆镇压、迫害。各族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冲突日益激化，正在演化为公开的武装抗衡。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偌大的天山南北被分割围困在孤零零的几处设防的城镇，应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俗语。

与此同时，三区方面已经与吐、鄯、托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得知了他们的结构和动向。这支游击队总数约300余人，由阿布杜热合曼·穆依提率领。根据三区方面的建议，他们取天山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堵截，于8月13日抵达尧勒杜子隘口，进入民族军防地，受到民族军指挥机关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

在吐、鄯、托三县人民起义期间，国民党动用武力对起义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游击队撤离三县后，国民党又派出大批警察、特务进行报复性的猛逮滥杀，大批无辜平民惨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再次犯下了滔天罪行。

## 第九章 南京之行

### 时机到了

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下简称国大）。新疆代表团共18人，包括省联合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和副秘书长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等三区代表7人。当时我们对“国大”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使我们高兴的是，在南京驻有党中央的代表机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想到此，我们振奋起来了。这年10月底，阿巴索夫在乌鲁木齐南梁安尼瓦尔·汗巴巴的家里，召开了人民革命党在乌鲁木齐的中央委员会议。会议授权阿巴索夫去南京，争取和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取得联系。

这几年，我们处处都在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行事。尽管如此，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我们时刻都盼望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此，我们利用一切途径寻找党。在伊宁时，阿巴索夫、赛甫拉也夫和我三人商量后，曾向苏联政府代表要求，请他们帮助我们派几个人去延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或者请党中央派

干部来伊宁领导我们工作。到乌鲁木齐后，阿巴索夫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负责同志商量，派了两个汉族年轻夫妻去延安，他们走后便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他们未能到达延安）。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怎么不让人高兴呢。用阿巴索夫的话说：“我们这些失去了母爱的孤儿终于找到自己的母亲了！”但是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如何和党的代表取得联系，这确实是个问题。经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利用的线索：李泰玉同志同在南京的几个地下工作者有联系，于是他就给其中的一位写了一封信，说明阿巴索夫南京之行的使命，请予以帮助。阿巴索夫还带去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

1946年11月初，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从乌鲁木齐乘飞机经上海前往南京。

后来，他讲起沿途见闻时曾说：“这次去内地使我大开眼界。飞机飞行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从舷窗下第一次看到了长城——这个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世界奇迹，我上小学的时候它就清晰地印在我的心目中。阿合买提江大哥对我说：‘在苏联，尤其苏联的普通百姓，把长城和中国是等同起来的，他们用“伟大的墙”这个词来表达长城这个概念，阿拉伯人则用“中国墙”这个词来表达长城这个概念。’听了他的解释，我说：‘俄语和阿拉伯语的表达太形象了，长城真象是一个伟大的墙，长城确实是中国的确。’”我从阿巴索夫的简短的谈话里，完

全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的自豪感。

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示对新疆代表的重视和关怀，蒋介石特意指示蒋经国亲自接待新疆代表团，尤其要“关照”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蒋经国对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友好与接近；但是，国民党当局对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并不放心。新疆代表的住所，以及他们的行踪，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

在南京出席会议期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一起拜谒了中山陵，参观了雨花台，还通过给他们开车的东北籍司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秘密地参观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天王府……

但是，阿巴索夫时刻都在想着他南京之行的使命，积极设法与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的代表取得联系。

## 去 梅 园

1946年12月2日晚8时，阿巴索夫走出了他下榻的饭店，只见一位小车司机打开车门，很有礼貌地请他上车，然后坐入驾驶座位上，回头向阿巴索夫亲切地一笑，未问他去何处就开动汽车。小车穿过大街，拐进了一条小胡同，走不多远就在一个行人稀少的地方停住了。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大个子走过来，迅速打开车门上了车。尔后，车子继续向前驶去。这人亲切地和阿巴索夫握手，然后，



自我介绍说，他姓张，是个铁匠，人们都叫他张师傅。小车继续前行，又上大街，驶过总统府门前。一直向城南奔出了城门。当汽车开到行人稀少的地段，张师傅对阿巴索夫说：“组织上知道你到了南京，今天派我来和你见面。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会转告南京办事处。”阿巴索夫说：

“我受新疆人民革命党中央和新疆人民的委托，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如果可以，希望能尽早见到他们。”张师傅毫不犹豫地说：“我转告你的要求，必要时这位司机同志会去找你的。他姓段，叫段廷英，你就叫他小段好啦。”

汽车驶过中山陵，向左拐，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行驶了一程，兜了一个大圈子，又返回中山陵，径直向城里飞驰而去。快进城门时，车被刹住，张师傅向阿巴索夫告别，下了车。然后汽车才将阿巴索夫送进城。

12月4日，司机小段找到阿巴索夫说：“今晚你如有时间，我送你去一个地方。”不巧，这天晚上阿巴索夫因事未能脱身。第二天晚上，会议安排了文艺演出。阿巴索夫提出要去看望一位亲戚。晚上9时，阿巴索夫走出饭店，一辆小车早已在饭店前等候。小车开进了一个胡同，停在一个饭馆门前，司机同志指了指饭馆低声告诉阿巴索夫：“请进去，张师傅在等你。”阿巴索夫刚刚下车，车便开走了。他走进饭馆，见张师傅若无其事地坐在一张桌旁，见阿巴索夫走进来，便起身向饭馆的侧门走去。阿巴索夫尾

随他走出饭馆，只见一辆吉普车正停在门前。张师傅请阿巴索夫上车后，车便急速开了出去。吉普车穿过几条小巷，最后停在一座门前。这便是闻名全国的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所在地——梅园。阿巴索夫刚一下车，就见从门里面走出一人来，请进院。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正房内发出暗淡的灯光，有一人站在庭院中央，见了阿巴索夫便迎上前来。此人年纪不大，个头不高，看起来挺精干。他一边同阿巴索夫亲切地握手一边自我介绍说：“我叫童小鹏，请进屋。”说完，把阿巴索夫引进了屋里。

这是一个里外屋，里屋是办公室兼卧室，外屋是会客室。外屋站着一个人，个头细高，留着稀疏的长胡须，亮额头，两眼炯炯有神。他满面笑容，快步向前和阿巴索夫热烈地握手，并说：“欢迎，欢迎！”童小鹏同志向阿巴索夫介绍说：“这位是董必武同志，是中央委员会驻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指了指沙发，请阿巴索夫入座。董必武同志非常关心新疆的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阿巴索夫一一作了回答。董必武同志听后很满意，不停地点头。接着，阿巴索夫向董老转达了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问候，转达了人民革命党全体党员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敬意，转达了新疆各族人民对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敬意，转达了人民革命党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议，并代表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转交了该盟致中共中央的信件。

阿巴索夫激动地说：“能见到您，我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为了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我们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阿巴索夫后来对我谈起会见董必武同志的感受时说：“我真没有想到，代表中国在美国旧金山签定联合国宪章的董必武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是那樣的平易近人，那樣的和藹，甚至我一和他握手就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

董必武同志亲切地看着阿巴索夫。他与阿巴索夫一见如故，以诚相待，使阿巴索夫深为感动。

阿巴索夫在谈到和董必武同志见面的情况时，深有感触地说：“当我和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一接触，我就深深感到这些人和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过去，我和林基路等共产党人接触时，他们的高尚品德就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现在见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并一直做党的领导人的董必武同志更使我万分钦佩。有了这样一批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阿巴索夫向董老介绍了新疆的概况，汇报了几年来我们进行的斗争中走过的曲折道路，用事实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疆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条真理。最后他向董老提出如下三点要求（大意）：

第一、请求党中央把人民革命党接受为自己的下属组

织。

第二、请党中央派几名领导干部来领导我们的工作。

第三、为了经常和党中央保持联系，请求派一名技术干部和电台去新疆工作。

听完后，董老考虑了一下说：“你谈的情况很重要，对我们了解新疆的现状很有帮助。你最后提出的三条要求都是重大问题。我个人无权答复，需要向中央报告，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再正式答复你。”

这天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童小鹏同志一边兼顾其他事情一边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谈话。正谈话时，又进来一个人，童小鹏同志介绍说：“这位是屈南昌同志。是我们办事处联络科的负责人。”屈南昌同志坐了一会儿，听完阿巴索夫提出的三条请求后出去了。

谈完话，阿巴索夫起身告别。董必武、童小鹏、屈南昌等同志一直把他送到庭院中。屈南昌同志一直送他走出大门。

董必武同志非常重视阿巴索夫这次拜访，立即致电延安向党中央报告，电文开头称：

“新疆国大代表阿布杜克力木，姓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原伊宁起义首领之一，来会我。称在新疆去年有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新疆解放区内公开，在迪化及其他地点还是秘密的，现有一万五千人。”接着列述了阿巴索夫的要求。

——要求我党承认和领导他们的组织；

- 要求接纳该组织的11位领导人入党；
- 要求派工作人员到新疆工作；
- 要求联络；
- 要求我党对新疆问题有明确指示。

电文中还写道，我答复三项：

- (一) 要求中央指示；
- (二) 我派不出人来；
- (三) 可约定与延安联络的办法。

电报最后写道：是否有当，请中央核示。并解释说，“阿是由新返延林启乐（即林基路）同志的学生，由新返延同志中有人知道他。”发电日期是12月6日。

延安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份电报。收到电报后当日即由周恩来同志亲笔起草了复电，并由刘少奇同志签发。复电开头称：

“电悉，望向阿同志询明：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他们组织之具体主张；阿同志能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如可以，可派一同志去。”

电报要董必武同志向阿巴索夫申明下列各点（大意）：

- 中共愿与该组织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
- 派去之代表，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
- 该组织领导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
- 派工作人员须视今后新疆政治情况及交通条件如何再定。

电报最后要求将毛主席著作、党章、少奇报告及其他印发文件交阿巴索夫，并希望阿巴索夫带回新疆译成维吾尔、哈萨克两种文字出版。

1946年12月11日晚10时左右，阿巴索夫得到董老要见他的消息。他急忙秘密来到了梅园。董老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董老说：“你介绍的新疆情况和提出的要求，我向中央报告了。中央很重视你的到来，对你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要我将研究结果转告你，这也是中央对你的答复。”

董老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愿意与新疆共产主义者革命党先建立友谊关系。”说到这里，阿巴索夫打断了董老的话，解释说：“我们党的名称叫人民革命党。我们的党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是公开的。以后逐步发展到迪化和全疆其他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在迪化还有一个地下革命组织叫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上次我交你的致党中央的信就是这个同盟托我带来的。我们的人民革命党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一致，因此，‘这两个组织在迪化市密切配合，并肩斗争。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合并这两个组织。’”

董老听后笑了，急忙说：“对，对。你上次说过，但我把他们混为一个组织了。”

阿巴索夫说：“可能是我受语言的限制，上次没有说

清楚……”

不等阿巴索夫说完，董老急忙说：“不，不。你的汉语讲得很好。上次讲的，我听清楚了，不知怎么搞的，又把两个组织混为一个组织了。这一点我还要向中央说清楚呢。”

董老那谦虚、认真、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更使阿巴索夫感动。他后来向我谈起这一情况时，曾感慨万分地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本不应该解释，我只想顺便说明一下，没有想到董必武同志那样认真，弄得我不好意思，暗暗责备自己不该讲。不过董必武同志的优良作风，使我真正认识到共产党人确实不同于其他革命党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人！”

董老继续答复他说：“第一步和你们的人民革命党建立友谊关系，以后视情况再定。你们党应成为领导中心，团结一切进步组织和人民群众，继续你们的斗争。能合并的组织，经过协商合并起来，这样有利于形成力量，更好地斗争。但在组织名称上，考虑到新疆情况的复杂，群众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不宜过早地打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和口号。这点请你们考虑。要求中央派代表去新疆，可以考虑，去后其任务只是起个联络员和观察员的作用，这个问题以后再定。至于派工作人员去新疆帮助你们工作的问题，目前尚有困难。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比较缺，一时难以派出，等以后根据新疆的政治情况和交通情况再说。你们党的 11 位领导同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

题，我们表示欢迎，具体手续等我们联络代表去新疆后再请示中央定。”

董老说：“至于你提出要一位报务员和电台的问题，中央完全同意，要我和你商量，看你这次能不能有办法把人和电台带去。如能带去，我们就把人和电台交给你。”

阿巴索夫听完董老的答复，非常激动，表示可以带回新疆。

董老说：“好。去的同志我们已定，待会你和他见见面。”

董老接着说，蒋介石政府大搞独裁，破坏政协协议，排除异己，独家召开了这次国大会。蒋介石的目的是，妄图在国大会上通过一个什么“宪法”，使独裁合法化，内战合法化，分裂合法化。这是蒋的妄想。在国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声明，揭穿了国大的分裂性和欺骗性。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激起全国广大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士的极大愤慨。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愿同全国人民、民主党派和爱国民士一道，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主张深得人心，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是蒋介石是不会放下屠刀的，他会与人民为敌到底的。从今年7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革命的战争。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反抗这种反革命战争。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



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已打响了。战争一旦打起来，就不由他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了。战争已进入第六个月。但是，从上个月开始，战争明显变化，蒋军开始转入被动，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主动，战局越来越对我们有利。说到这里，董老见阿巴索夫显得非常激动，用坚定的语气说：“我们一定会赢得战争的胜利，赢得全国的解放，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这个日子不远了。”

阿巴索夫深受鼓舞，满面笑容地说：“这情况太鼓舞人心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世代盼望的日子，终于要成为现实了。”

董老说：“新疆是个复杂的地方，内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宗教影响很深，帝国主义时刻窥伺着这个地方。你们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在全疆牵制住了国民党大量军队，和帝国主义代理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应坚持下去。”

“新疆是边疆地区，交通不便，加之，我们和国民党处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目前很难抽出干部去新疆工作，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希望以后保持联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你们提出来，我们尽力帮助你们。在斗争中，要注意策略，要把尽可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也就是说，除了国民党顽固分子，死心踏地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反动分子外，其他人都要团结起来。考虑到新疆人民的接受能力和

宗教的影响，可暂时不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口号，多进行正面宣传，逐步提高人民的觉悟。这也是策略问题。祝你们的斗争成功！”

阿巴索夫听后顿觉心里亮堂，信心倍增，进一步明确了今后要走的路，得到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他激动地说：

“衷心感谢你的答复。我已圆满地完成了我们党交给我的使命，明确了我们今后的奋斗目标。你的答复，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在新疆从事的革命事业和新疆人民群众的重视和关怀。回去后，我将如实传达你的指示，并按照你的指示去做。”董老忙解释说：“不是指示，供你们参考。”

11时以后，童小鹏同志领进一个人来。这人个头瘦小，但两眼炯炯有神，是个精明的小伙子。

董必武同志向那位同志介绍说：“这位是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同志，是新疆的少数民族。”然后向阿巴索夫介绍说：“这个小伙子带一部电台和你去新疆。他叫彭国安。”

阿巴索夫起身紧紧握着彭国安的手说：“太好了，欢迎你！咱们同生死共患难，一起战斗。”

董必武同志问彭国安同志：“你对去新疆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服从组织决定。”彭国安同志坚定地回答。

据彭国安同志的回忆，阿巴索夫和蔼可亲的态度，热

情开朗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阿巴索夫成了他最崇敬的同志之一。

夜深了，阿巴索夫返回饭店。他由于激动，难以成眠，陷入了漫漫的遐想之中……

“国大”在继续进行。“国大”代表绝大部分是国民党顽固分子、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或是被蒋介石收买的人。在蒋介石的导演下，闹剧在不断出现。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颂扬声，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攻击、谩骂声，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很多代表晚上进赌场、逛妓院，白天睡大觉，不少“代表”又是国民党的特务、暗探。他们对一些进步人士不断进行监视或公开威胁……会议不伦不类，一片乌烟瘴气。这就是所谓国民党的“国大”会。

对“国大”早已反感的阿巴索夫听了董老的一席话后，更觉得无法继续参加下去。他向阿合买提江谈了自己的感想后，阿合买提江表示也有同感。经商量，决定抵制“国大”。为此他们动员新疆代表团的其他少数民族代表，联名向蒋经国提出去外地参观的要求。他们的倡议立即得到多数民族代表的响应，之后便正式向蒋经国提出去外地参观的要求。蒋经国表示同意，特意派专机于12月31日送他们去北平、天津、青岛等城市参观，并指示各地予以特殊照顾。每到一地，都由当地官员迎送，举行盛大的招待会记者招待会，大肆宣传国民党蒋介石的伟大“政绩”。对此，阿巴索夫暗想：“想收买我们，这是痴心妄

想。”

1947年1月8日，新疆代表去外地参观返回南京后，当天晚上阿巴索夫和董必武同志第三次会面。董必武向阿巴索夫询问了去外地的观感。阿巴索夫谈了蒋经国用专机送他们去的情况，以及各地“特殊照顾”的情况。

阿巴索夫说：“我对中国历史极感兴趣。通过参观，我对祖国数千年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作为中国人我感到自豪。北平这座传统的历史名城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上海、天津和青岛非常美。这几座城市的建筑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突出的特点——殖民主义的痕迹处处可见。外国租界一个接一个，外国商号林立街旁，外国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视中国人如猪狗……这些严酷的事实，激起了我对殖民主义者的仇恨。

“通过参观，代表们进一步了解了祖国光辉的文明史，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又清楚地看到了祖国民贫国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真面目，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意志。这应该是代表们参加国大期间的最大收获。”

董必武同志听完阿巴索夫的讲述后坚定地说：“结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时候不远了。中国压在三座大山下面，受尽欺凌和压迫。不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就不可能获得彻底解放。希望你们在新疆把革命坚持到底，为推翻三座大山做出贡献。”

接着，阿巴索夫和董必武同志研究了如何把彭国安同志和电台带到新疆去的问题。为了掩人耳目，阿巴索夫和董必武商定，彭国安改名王安迪，以阿巴索夫的妻子吕素新二姐夫弟弟的身份（吕素新的父亲是青岛人），从青岛来南京准备随阿巴索夫一起去新疆探亲。

董老满意地说：“这样安排好。”然后他又问：“王安迪同志去新疆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阿巴索夫回答：“没有问题，新疆人是好客的。”董老听后放心了。

阿巴索夫对王安迪说：“我们现在既是同志，又是朋友。我们将在一起战斗。一切请你放心，老王同志。”

王安迪高兴地说：“按照组织的指示，我将尽力帮助你。至于我的生活，你不必多考虑，我会很快适应的。”他们最后商定，鉴于新疆代表团将要返回，就安排王安迪先住在一个旅馆等候。这任务交给了屈南昌。

阿巴索夫起身和董老告别。董老紧紧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

“祝你一路平安。回到新疆后向人民革命党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同志转达我的问候。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新中国的首都再相会。”

一股暖流流遍阿巴索夫全身，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阿巴索夫也说了一句：“一定……”再也说不下去了。

董老把阿巴索夫一直送到大门内，再次和阿巴索夫握手告别。

## 返回新疆

1947年1月9日晚10时，一辆小车驶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门前。车刚停，便从门内走出两个人。一个人拎着一只大提箱，另一个人拎着一只大包袱。他们走到车前，拎提箱的人示意让拎包袱的先上车。这两个人，前者是王安迪，后者是屈南昌。习惯于地下工作的司机小段按预定计划，有意穿行几条大小马路，最后把车开到一座叫安旅（音译）的旅馆。把老王送入预订的房间，等候接头人。

老王在旅馆等候了两天。1月11日，有一位接头的人告诉他，去新疆的起程时间从11日推迟到12日。原定走时由阿巴索夫亲自来接老王，现在来不了，改由接头人先把提箱送到阿巴索夫的住处，让他12日等候消息。说完便把提箱拿走了。

1月12日清晨，一辆汽车来旅馆把老王送到了机场。老王赶到时，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和其他代表正准备上飞机。阿巴索夫和站在他身边拎着那只提箱的人前来迎接老王，然后向国民党工作人员和其他代表说：

“这位就是我妻子的亲戚王安迪。”王安迪和他们一一握手。代表们上了飞机。飞机发动了，以蒋经国为首的前来送行的国民党官员挥手告别。飞机腾空而起，向西北方向飞去。

1947年1月14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一行到达乌鲁木齐。他们开始通过电波和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进行联系。1947年8月，国民党撕毁和平条款后，王安迪携电台随阿巴索夫等人来到了伊宁。这时党中央也已撤离延安，由于距离加大，加之电台功率小，无法继续和党中央保持联系，便将电台改装成收音机，收录每日的新华社电讯，在报纸上转载。

## 第十章 坚强的革命战士

### 旗帜鲜明

1947年8月中旬，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的主持下举行了在乌鲁木齐的最后一次会议。因为大家对形势都已了如指掌，因此，阿巴索夫没有过多地谈论时局问题，而将话题直接转入措施方面。

他说：“现在，我们与他们的合作不但已经失去了可能性，而且也失去了必要性。决裂已成定局。”

他所说的“失去了可能性”，是基于国民党顽固分子先后起用乌斯满和麦斯武德，蓄意破坏和平条款这样的事实；“失去了必要性”是指基于我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国民党反动派行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崩溃这样的事实。

会上发言的同志一致同意与国民党当局决裂的提议。这个决议得到阿合买提江的赞同后，立即付诸实施。联合政府中的三区代表以及各主管部门的三区负责干部，第二天均接到了“准备离开乌鲁木齐”的命令。

8月中旬以后，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同志为首的三区干部以省亲、出差或度假的名义先后离开乌鲁木齐，来到伊宁。这期间到达伊宁的，除三区军政干部外，还



有其他七个专区的参议和各族进步人士。其中数月以前陈锡华、李泰玉、何锐、范印中等一批汉族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奔赴伊宁参加三区革命的举动，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的关注。

三区方面与国民党当局决裂，新疆省联合政府不复存在的事实，很快便昭著于世。阿合买提江在伊宁对报界发表谈话，详细说明了三区方面采取这一断然措施的原委。三区方面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坚决支持和拥护。

确切地讲，这个时期人们不仅关注事情的真相，更关注三区方面的政治动向。政治形势要求三区方面必须尽快地对上述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首的三区领导层完全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严肃性和紧迫性。经过反复磋商，阿巴索夫被委以这一重任。这时已经是初秋季节。一个工作班子在阿巴索夫的亲自领导下经过认真、严肃、紧张的工作，于9月底完成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对时局作了全面的估计，并就应付的措施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它的要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将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必将彻底崩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三区方面：第一，必须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口号；第二，必须清楚表明，新疆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以上述两点为目标，三区应积极

协调诸方关系，尤其是民族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伊、塔、阿三个专区政局的进一步稳定，从而推动全新疆的政治局势，为迎接全国解放，积极作好准备。

措施的第一条表明，三区方面不仅与国民党新疆当局彻底决裂，而且将推翻国民党在全疆的反动统治作为自己的第一大政治目标。措施的第二条表明，三区方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的恶毒阴谋。现在和将来都将为祖国的领土完整而斗争。措施的第三条表明，三区方面将进一步肃清艾里罕吐热等人散布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余毒。彻底纠正民族关系上，尤其是在对待汉族居民的关系上发生过的错误。

10月初，阿合买提江以省联合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在伊斯哈克拜克的住宅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认真讨论并通过了由阿巴索夫领衔的工作班子提出的政策要点。阿合买提江最后宣布了领导层新的分工。阿巴索夫担当了实施上述政策要点的任务。

## 调整民族关系

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一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健全并充实了宣传系统，组建起完善的舆论体制，完善了维、哈、汉、俄等文字报纸的宣传工作。这些报纸已成为宣传三区方面政治立场的强大工

具。通过各地的进步组织，这些各民族文字的报纸被秘密地分发到天山南北的每一个角落，包括那些边远的农村和牧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名字，在全国六分之一的这块土地上被广泛正面报道，大力颂扬。三区方面提出的包括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迎接新中国，建立新新疆这样内容的政治口号在新疆劳动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和共鸣。

这一时期，阿巴索夫耗费精力最多、收效最大的，要算是他为调整民族关系所做的工作了。

识别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的危害和肃清其流毒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前者只要求认识上的升华，后者则要求在实际中的体现。历史的渊源，利益的得失，甚至宗教的情感，都一度成为艾里罕吐热等人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的社会条件，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一起提交的那份政策要点被通过之后，阿巴索夫立即给我一项新的工作。要我辑录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

由于阿巴索夫不时用电话询问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连那些帮我工作的秘书人员也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我们的工作节奏由按部就班，逐渐到加班加点了。

数天之后，当秘书人员誊清辑自列宁著作最后一段论述的时候，按照事先的约定，我立即向阿巴索夫打电话报

告，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电话打到他家里。阿巴索夫的卫士接到电话说：“首长正在吃饭。”得知是我打来的电话后，卫士立即报告阿巴索夫。

阿巴索夫在电话上用他惯有的轻松语调对我说：“我在洗耳恭听，赛福鼎大哥。”

我说：“秘书人员正在誊清最后几行字。你现在吃晚饭，要么明天……”。

“不要等到明天，现在我就去您那里。”阿巴索夫打断我的话说。

我说：“你不是正在吃饭吗？再说也该休息了。”

他说：“按时间计算，此刻是12点半，我吃的是早饭。”不等我开口，他说了声“在您的办公室见。”便挂上了耳机。

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从他家里到我的办公室汽车需要10分钟，加上他和司机、卫士吃饭的时间，这样，再过20分钟他们才能到我这里。这些天，不分昼夜的工作节奏，使我感到十分疲劳，哪怕是20分钟的时间，我也想加以利用。于是我身子一歪，将头放在沙发扶手上，便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约听到汽车的刹车声。接着走廊里传来了皮靴触地的声音。我恍惚地意识到是阿巴索夫来了。当我睁开眼睛，强制自己坐起来时，阿巴索夫已站在我的身边。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总共才睡了10分

钟。

我惊奇地说：“你来得真快！”

他说：“我自己开车来的。”接着又诙谐地说：“您一定是做了一个甜蜜的梦。”

我理了一下蓬松的头发，自我解嘲地说：“现在，那些甜蜜的梦早已不敢走近我的身边了。”

我们的对话引得伏案工作的秘书人员暗暗地笑了起来。

我和阿巴索夫面对面地坐在办公桌两侧以后，我将装订整洁的一大本辑录放在他的面前。他认真地翻阅了几页后，对我说：“您还可以睡一小时的觉。我读完后再叫醒您。”

我说：“这么说，你今晚没有睡觉的打算了？”

阿巴索夫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说：“离天亮只几个小时了。对我来讲，几个小时的觉已经毫无意义了，放开睡的话，我此刻需要一连睡48个小时。”

这句话，说者也许无意，但我作为听者，却深深为之感动。返回伊宁后的这几个月来阿巴索夫常常一连10几个小时，奔波于一个又一个岗位。他的眼睛因熬夜而红肿了，他的面庞因疲劳而消瘦了。

我让秘书人员全部回宿舍休息，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阿巴索夫两人了。

我说：“我陪着你。”

他默默地看了一下我，点了点头。然后全神贯注地开始阅读。办公室里刹那间一片寂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有节奏的“滴答滴答”的声音。我无所事事，顺手拿过一张几天前的《真理报》，翻阅着影剧广告栏，读着莫斯科近期上演的电影和歌剧预告，消磨时间。

约莫两个小时后，阿巴索夫突然停住了。半晌，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现在正在读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这段论述。”

我放下手头的报纸，不解地问：“你在想什么？”

“有些人拿列宁的这段论述好象要证明别的一种想法。”阿巴索夫习惯地转动着手里的双色铅笔，有所领悟地说。

对于这些，我早有一些耳闻。因此我在辑录列宁的这段论述时，曾反复地学习过，同时还参阅了列宁的其他有关论述。我对阿巴索夫说：“显然，那些人曲解了列宁的原意。列宁的这段论述是针对殖民主义体系而讲的，是以国际范围为前提的。而我们所说的‘民族平等’是中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

阿巴索夫听完我的意见后，猛地向桌面拍了一掌，兴奋地说：“您的这个理解太重要了。”然后他双手捧起那本辑录，将它亲切地触了触额头，高声地说：“有马列主义领袖们的论述，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解决我们面前的问

题。”

这时墙上的挂钟清脆地敲了五下，阿巴索夫看了看挂钟，幽默地说：“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建议咱们将这一小时当作八小时，睡上一觉。8点我们到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办公室，一块起草讲稿。”

事实上，我们都已经没有睡意了，我躺在沙发上，他躺在并在一起的办公桌上，断断续续地交谈着全国的形势，追述着这几年走过的道路，到东方泛白的时候，不知道谁先入睡，交谈才告中断。

不到7点，我们就匆忙起床，简单的洗漱之后，在办公桌上吃过公务员送来的早餐，便来到院内的停车处。阿巴索夫的司机和卫士已经等候在汽车旁。他们的神色告诉我，他们对阿巴索夫昨晚自己开车“擅自”外出，很不放心。

阿巴索夫和颜悦色地对司机和卫士说：“二位早上好。”

卫士是去年入伍的“乡下兵”，跟随阿巴索夫已有半年多。在这个上等兵身上很难区分古板和严肃的界线。他对警卫条例背得滚瓜烂熟，凡事都想按条例办。他跨前一步，对阿巴索夫行了个军礼，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报告上校，请允许我向保卫部上尉参谋报告您昨晚不带卫士和司机，擅自外出的情况，请求上尉参谋给我以军纪处分。”

阿巴索夫拍了一下卫士的肩头，微笑着说：“我们此

刻必须去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办公室，到了那里，你有的是时间去打电话向上尉报告。”说完他打开前座车门，对卫士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自己敏捷地打开后座车门，坐进汽车。

如果由司机和卫士们去评说他们各自的首长，他们一个个简直象技巧娴熟的画家，很快便能勾勒出各自首长的形象。阿巴索夫的司机和卫士，除了在公共场合下，几乎从不以官衔和军衔称呼他，而是亲切地称他为“阿布杜克力木大哥”。阿巴索夫和他们谈话时，也象和知心朋友谈话一样，直接用第二人称单数。夏天的时候，饭后茶余，他喜欢和卫士、司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坐在临街渠边的长凳上，观看来往的车辆和人群，或者海阔天空地谈些典故和趣闻。冬天，工间休息时，他常和卫士、司机、秘书，围站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悠闲地吸着莫合烟，聊些狩猎、滑雪、冰球之类的新闻。

上午8点，我们的汽车准时停在阿合买提江同志的住宅前。值班军官陪同我们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我们开始全力以赴地准备阿巴索夫的演讲稿。

上午，我们逐段地学习了马恩列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下午，我们便开始拟定演讲稿的要点。讨论是如此认真，每一个具体的概念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遇到一些重要的段落，为了准确地表达各自的意见，我们三人同时执笔当场起草，最后由阿合买提江定夺。



10月的伊宁，已经是秋意甚浓的季节了。略呈黄色的白杨树叶，湛蓝的天空，飘渺的淡淡白云，使人有一种庄严、沉静、和谐的情调。在阿合买提江的这间装饰简洁而大方的办公室里，我们却全然是另一种节奏，另一种色彩。因为我们正在将伊、塔、阿三区人民革命事业的步伐，融汇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我抬头看看阿合买提江，他的领带已放松到了最大限度，一股强大的感情爆发力似乎就要从他的内心迸发而出。阿巴索夫的上身军服斜挂在椅背上，只穿着一件衬衣。他们时而交谈，时而深思，时而疾书。

秘书轻轻走到阿合买提江的身边低声地请示晚饭在什么地方吃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机关早已经下班了。想到阿巴索夫这些日子如此忙碌，我真希望阿合买提江作出明天再工作的决定。可是，不等阿合买提江回答，阿巴索夫便对秘书说：“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吃饭。11点钟还要吃夜宵。”秘书应了声“是”，才要转身的时候，我说：“等等。”然后，我对阿合买提江说：“阿布杜克力木从昨天到现在，只睡了两个小时的觉。”

阿合买提江有些歉意地说：“那么，明天再……。”

“我建议我们去打场台球。”阿巴索夫打断了阿合买提江的话，随后又对我说，“今天务必有个结果。”

阿合买提江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示，我只好随大流，跟着走进隔壁的台球房。大家舒展了一下四肢，便都操起

了球杆。打了几轮之后，阿合买提江一边选择角度，一边信口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是造成家庭不协调的因素。一是科学家，一是革命家。据说，牛顿有一次居然把和自己同车回家的妻子当成了陌生人。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列宁在家里的时间只占他全部时间的六分之一还不到。”

我明白，阿合买提江的这句话是对我方才那句话的解释。他幽默而含蓄。有时，他的含蓄和他的幽默一样，都给人以亲切之感。

事实上，我们三个人的心思都不在台球上。我们都思考着还没有完结的讨论。

晚饭以后，没有任何间隔，便继续下午的讨论。直到午夜12点以后，这篇演讲稿的轮廓才全然明朗。逻辑层次，段落结构，甚至应该注意的正字法，都清楚了。余下的工作，就是用文字将其贯穿起来。这件工作交给我去完成。在我们分手之前，又商定了会议的时间。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值班人员都等候在那里。我通知：“两小时后有任务。现在抓紧时间先去休息。”等他们离去后，我立即开始工作，耳边不时地萦绕着阿合买提江在台球房关于科学家和革命家那段趣谈。

过了近三个小时，我正准备将那些字迹潦草的文稿整理在一起，叫醒值班人员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我拿起听筒，传来的是阿巴索夫的声音。

我关切地问：“你是睡了一觉后打这个电话呢，还是压根儿没有睡觉？”

他回答说：“睡了一觉。想起几件事，认为应该立即和您交换一下看法。”

得知他睡了一觉，我放心多了，于是对他说：“好，我洗耳恭听。”

他在电话上谈了许多细节。最后，他特别要求在谈到三区民族问题的根源时，除了要提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艾里罕吐热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外，还要强调大土耳其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

我将他的意见作了详细的笔记，最后我说：“15分钟后，我就将草稿交秘书人员誊清，然后我要睡觉，希望明天8点在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办公室见面之前，我们俩都能安静几个小时。”

他明白我的意思，大笑着说：“谢谢您的美意，我此刻立即入睡。”

放下电话，我叫醒值班人员，将一叠草稿交给他们，要他们立即分头抄写。这些秘书人员都训练有素，无需过多的交代，他们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由于过度紧张，我根本就没有了睡意，到院子里呼吸了一阵新鲜空气，就回到办公室校阅誊清的抄件。

清晨8点，我在电话里向阿合买提江报告了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况，请示还有什么安排。阿合买提江在电话里

说：“誊清的抄件派人送来。至于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立即平心静气地睡一大觉。”合上电话耳机，我看着值班秘书携带着抄件离去以后，来不及伸展一下四肢，便倒头睡在了沙发上。

## 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1948年5月1日举行报告会，会上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做了题为《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的报告。阿合买提江主持了会议，结束时讲了话。阿巴索夫在报告中谈到三区革命、我们的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正确的方面和取得的成绩。报告中着重谈了民族问题上所犯的 error 和坚决纠正这些错误。阿巴索夫指出：“我们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国外帝国主义和他们的爪牙的民主运动。因此，我省各族被压迫人民积极响应并参加这一运动。我们民主革命运动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把政治上受压迫、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旧新疆建成一个政治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繁荣昌盛、文化上得到发展的新新疆。”阿巴索夫谈到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时还说：“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实现上述目标正确地解决了每个问题，同时对民族问题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斗争的初期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就指出新疆是多民族的省份，我们承认这一事实。1947年阿合买提江同志在乌鲁木齐的一

次会议上谈到我们如何对待各民族时指出：‘我省有许多民族，我们从来不反对汉族。我们反对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国民党的统治。’”

阿巴索夫在报告中说：“三区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在贯彻民族政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例如：允许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出版各民族语言的教科书，出版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汉文、俄文、锡伯文、蒙文的报纸，出版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的期刊杂志，召开一些民族的代表大会，组织包括汉族在内的促进会等。”

阿巴索夫在报告中指出民族政策的正确方面和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错误。他说：“上述情况并不是说我们在民族解放的革命过程中没有犯一点错误。我们不隐瞒所犯的错误，要揭露它，找出产生错误的根本原因，加以改正。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没有很好考虑不是生来就有压迫民族这话的含意。因此，有时不能把压迫民族内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正确区分开。出现了将国民党统治下同样被压迫的汉族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混为一谈的情况。例如曾做过这样一些错事：我们内部极少数坏分子把汉族人视为敌人，不能平等待人，甚至对他们进行威胁、恐吓，以至抢夺他们的财物，以前欠的债也不予偿还；更有一些流氓掠夺汉族人的财产，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等。”

阿巴索夫在结束发言时强调说，这些错误给我们的

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今后要坚决纠正民族问题上的这种偏向，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教育。各民族要团结一致，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要和汉族人民好好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靠山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要坚决反对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行为。

那天，足以容纳五六百人的礼堂里座无虚席。阿巴索夫声音浑厚而清晰，表情端庄，深沉自信。他的演讲，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我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同志们，他们都很年轻，有些人脸上还带有明显的稚气。就是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阿合买提江同志也只有30几岁，正在演讲的阿巴索夫，只有26岁，但是在政治上他们都显得如此成熟，真使人为之高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轮廓似乎已经呈现在他们眼前。尤其是坐在后排席的那些尉级军官，还不时地发出“讲得好！”的欢呼声。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些人的面部表情捉摸不定。尽管阿巴索夫的一些观点对他们来讲过去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今天的演讲会对他们多少也有了些触动。

演讲会结束以后。很多军政领导干部簇拥在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的周围，用最简短、最明了的词句，表达了他们完全拥护阿巴索夫演讲的态度。

离开会场的时候，阿巴索夫一定要我搭乘他的卧车。汽车开动以后，他激动地对我说：“我们的干部都有着令

人敬佩的觉悟。我们大家最终在革命中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判断，学会了辨别。我们将以这样的干部队伍迎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深情地看着阿巴索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静静地聆听着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他那高大的形象，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

这次会议对于结束三区革命在民族问题方面所犯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点。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领导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例如：举行各种会议，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教育“新盟”成员。同时还开办汉族学校，关心汉族文化事业，出版汉文报纸等。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号召大家贯彻执行新制定的民族政策。阿合买提江在这方面采取直接有效措施。他在许多会议上的发言、报告和撰写的文章中多次谈到民族问题，给大家以教育。他说：民族主义不能组织起各民族统一的力量，它只会在民族间制造矛盾，引起冲突，只能使其他民族对他（民族主义分子）的民族产生敌意。从逻辑上讲，民族主义者是要庇护本民族中的败类和叛徒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希望使自己的民族得到解放的人，都应与其他民族的解放而斗争。所以对民族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就是个条件。民族主义分子是民族的败类，他们决不会放弃个人私利去为民族谋利益的。民族主义分子无论怎样替自己辩护，也总是要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息息相通的，从投靠其主子

的那一天起，就在共同反对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

三区革命的领导人在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进行反对民族主义斗争的同时，向人民群众明确指出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引导人民前进。阿合买提江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若干错误》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把民族解放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自由的敌人——凶恶的反动派及其靠山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和中国各民主阶层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封建官僚主义和代表其军事、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及它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斗争。为解放全中国而斗争的人民和各民主阶层是我们的同盟者。中国的军阀、反革命的国民党分子和帝国主义是我们解放运动凶恶的敌人。在今天不可能把民主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截然分开。现阶段真正民主问题的任务是迅速纠正民族解放运动第一阶段在民族问题上产生的错误。在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没有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统治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新新疆。

从1948年上半年开始彻底纠正民族工作上的错误之后，民族工作取得了一步步重大进展，到1949年已有显著成绩，民族团结加强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民族关系问题在当时不可能完全解决，重要的是纠正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纠正了破坏民族团结、敌视汉族同志的错误，制止了流氓抢劫行为与罪恶活动，坚决地打击了一些坏人。这场斗争进行得很不容易，一些反动分子、地主、富农利用手中的权力竭力反抗。一些掌权者



煽动坏人阻碍这项工作的开展。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依靠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群众挫败了他们的反抗和阻挠，使之未能得逞。这一胜利对于促进三区革命与中国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从1948年9月起，伊犁出版的各种文字的报刊，成为向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等兄弟民族，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人民解放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要阵地。阿巴索夫的绝大部分精力用于这些方面了。一些重要的消息都是他亲自编排、翻译的。

阿巴索夫通过新华社电讯和各种渠道获取消息，密切地关注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将胜利捷报及时传播到天山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全疆各族人民打倒国民党，解放全新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心。1949年，有一天，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苏联的消息，阿巴索夫受阿合买提江的委托走访了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请求他们通过莫斯科，沟通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联系。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应承了这个要求。

## 第十一章 为了光明的明天

### 在赛力木湖边

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首的三区代表返回伊宁后，一年来，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过度疲劳，他们的体质明显下降，经医生再三建议，阿合买提江同志决定让三区领导干部分批分期去外地休息两个星期。8月初轮到了阿巴索夫和我去休息。

8月初，果子沟的柯克沙拉峡谷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山坡上长满了茂密的幼松。山下小溪里，流淌着雪山上溶化的雪水清凉而甘美。白桦树繁茂的枝叶交织在一起，浓荫蔽空。树荫下绿茸茸的草地恰似一块美丽的地毯。这里风景旖旎，令人心旷神怡。真是避暑度假的理想之地。

树荫下，草地上，铺着一块地毯，地毯上摆一小圆桌，桌上有一只马奶罐，四只小碗盛满了马奶。我和阿巴索夫围坐在圆桌旁。一边喝马奶，一边聊天，开始了两个星期的度假生活。

哈希汗姨妈，一只手牵着一岁半的孙子毅力强，一只手抱着刚出生的幼孙柯尤木从毡房里向我们走来。毅力强

看见爸爸，高兴地挣脱了奶奶的手，迈着不稳的脚步，踉踉跄跄地奔向阿巴索夫，一头扎入他的怀抱。阿巴索夫搂着毅力强，轻轻地抚摸他、吻他。他那小儿子，前不久出生在果子沟里的柯印布拉克，因而为他取名“柯印”，以后又变音成柯尤木了。

离我们稍远的地方，有一座用石块垒起的简单炉灶，阿依木和阿丽娅（即吕素新）正忙着烤羊肉串。8月的“杜能”马奶，配以烤羊肉串，真可谓美味佳肴。加上幽雅寂静的环境，微风送来各种奇花异草的芳香，使我们食欲大增。

我们喝着马奶，边吃着烤羊肉，边谈着有趣的话题……过了好长时间，卫士来报告：“马已备好。”阿巴索夫和我，加上两个卫士共四骑，扬鞭催马向赛力木湖奔去。

走过柯克沙拉瀑布，沿着左边的人行小路向上走去，一直走到瀑布的源头。那上面是一个不大的湖泊。我们从湖的东边绕过去，沿着湖北的一条山脊继续往上走。左边，果子沟那气势磅礴的山脉尽收眼底。山腰间绵延不断的松树林带郁郁葱葱，极为壮观。在林带以上，是终年不化的雪线，直伸延到山顶。皑皑积雪，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我们越上升，果子沟山脉就越下降，只见盘山公路从上往下伸延到远方。

阿巴索夫头戴军帽，身穿草绿色的运动衣，脚登黑马靴。看上去他很象军队的政工人员。他一边轻轻地挥舞马鞭，一边哼着《艾来玛》歌曲的调子。他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会弹奏曼陀林。尽管弹得不十分熟练，但他可以自弹

自唱。他喜欢弹唱俄罗斯和塔塔尔歌曲，尤其喜欢《艾来玛》这支歌。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这支歌儿？”他说：“我也说不上来，好象这支歌能解除人们的忧愁，使人得到某种慰藉。”今天，他又兴致很浓地哼起这支歌曲。我们几个骑手，在他的歌声中不断地向高处走去……

当我们绕过一处长满松林的山坡时，蓦地，我的卫士买买提指着松树林深处大喊：“看！那儿有只鹿。”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块岩石上 一只大公鹿，正在昂首凝视着我们。阿巴索夫喜出望外，急忙对买买提说：“把步枪给我！”

他接过步枪，压好子弹，举起枪后又踌躇起来。他问我：“角度正好，怎么办？”

“不准捕杀鹿是政府的决定。我们是政府的成员，不能违背这个决定吧？”我笑着说。

“咳！有什么法子。”阿巴索夫摇了摇头，深感遗憾地把步枪还给了买买提。

鹿，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两只鹿角，就象两颗小树。它傲慢地盯着我们好象在说：“能把我怎么样？”我们无可奈何地从它前面走过去。

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这座山正在松树头达板的南面。我们的前面，辽阔美丽的草原由南向北缓缓地往下伸展。往北望去，是碧绿的赛力木湖。左边是果子沟山脉，

从湖的西面一直往北伸延过去，和湖北东西走向的青山相连，青山的东头和湖东的一座石山相会。这便是以赛力木湖为中心的高山小盆地。赛力木湖周围是理想的夏季牧场，尤其是湖西和湖北的辽阔草原，水源充足，牧草肥美，是有名的阿克巴衣塔夏季牧场。

8月是牧区的黄金季节，草原上盛开着万紫千红的野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馨。极目远眺，整个草原到处是马、牛、羊群。毡房星罗棋布，炊烟袅袅升上晴空。湖水潋滟，显得宁静而深沉。湖之南，三台的房屋依稀可见。再往南，一条公路从东向西，沿着湖的南侧一直上升到松树头达板。公路上不时有大小汽车来往。天空，一朵朵白云在缓慢地飘向远方……我们并排在马上兴趣盎然地观赏着这美丽的景色，谈论着各自的感受。

“这儿真美！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我向阿巴索夫建议。

“好！对这么好的地方无动于衷是不公平的。”阿巴索夫一边下马，一边说。接着他又笑着开玩笑说：“人间的小伙子和天上的仙女要是找相会的地方，不会找到比这儿更美的地方了。”

两个卫士拴好马的前腿，御下笼头让它们去吃草。而后，我们找了一块树荫地，铺上线毯，打开餐布，摆好带来的包尔沙克，再从马背上取下盛马奶的皮袋，将马奶倒入银边木碗内。我们一边喝马奶，一边观赏美丽的大自

然。

“这是多么美丽、富饶的地方！”我说，“可惜这美好的土地，这些财富还不属于创造它的主人。”

“对，创造世界的人当家做主的时候不远了。”阿巴索夫指着前方说，“你看，这整个盆地多么象一顶美丽的桂冠，赛力木湖又象镶在桂冠中央的一颗明珠。这顶桂冠使我们新疆显得分外妖娆。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

阿巴索夫这一席话，好象使我受到启发，心中顿时涌出诗的灵感。

“赛福鼎大哥，你瞧，这美景确实能使人产生诗的灵感。”阿巴索夫好象猜着了我的心思。他接着说：“如果我是诗人的话，我一定作一首诗。哎，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好，这样的地方不产生灵感，就不称其为灵感了。怎么样？朗诵吧。”

我稍加整理自己的感受，便朗诵了一首诗：

啊！赛力木，

你是故乡美丽的桂冠。

你表面沉默，

但怒火在你胸中翻滚。

爆发吧！

让大地颤抖、震荡！

你的怀抱，

将迎来胜利的欢庆。

他听完后高兴地 from 衣袋里掏出笔和本子说：“你再朗诵一遍。”我又重复了一次。他记下后，自己又朗诵了几次，满意地望着我说：“太好啦，是一首好诗。确实，赛力木表面的污痕消失了，但它内部翻腾的怒火尚未爆发出来。你说得对，应该让它爆发，让它那巨大的威力迎来真正解放的节日。”说到这里，他又谈起了前年和董必武同志告别时，董老讲的话。他说：“形势发展的太快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已跑到广州。全国除新疆、西藏、台湾和个别沿海省份外，都已解放。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情况完全按董必武同志的预言发展。人民解放军很快就会打到新疆来的，我们也做好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新疆的准备。新疆解放了，这些山山水水，地下宝藏，整个赛力木都将回到人民的怀抱。”

阿巴索夫所讲的，也是这个时期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此时此刻，谈起这些，使人更为激动。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他继续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为此，我感到幸福和自豪。以后，我们的道路还是遥远的，真正的革命还在后头，我们还要加倍的努力。”

革命的问题，更是我俩经常谈论的主题。今天我们的谈论从大自然开始，谈到人民解放战争，谈到他的南京之行，又慢慢集中到“革命”这一主题上来。回顾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阿巴索夫和我一致认为：三区革命是一场具有深

远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但由于没有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从彻底革命的含义讲，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在三个地区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走狗，给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是，从彻底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讲，尚未做什么，甚至在某些方面封建剥削阶级攫取了比过去更大的利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谈到这里，阿巴索夫满怀信心地说：“更大的革命还在后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把这场革命搞彻底。”

阿巴索夫的话，言简意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说出了一条真理。使我感受最深的是，经过这几年革命斗争的磨练，阿巴索夫越来越成熟了。在三区革命运动中，我为能涌现出象他这样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见我陷入了沉思，不解地问：“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回味你的话，想我们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走的更加光荣、更加伟大的路。”

我们两人幸福地笑了。

日头已偏向西方，夕阳照在赛力木湖上，给湖面蒙上了一层玫瑰红的薄纱，把赛力木湖打扮得更美丽了，我们



上马下山，向赛力木湖走去。

## 和老牧民谈心

我们来到湖畔。在湖边，散落着无数大小不同的毡房。每个毡房周围，都聚集着各类牲畜。牧民们在繁忙地从事着各种劳动。

我们来到了一座又高又大的白色豪华毡房前，这个毡房属于伊宁一位有声望的大巴依（财主）。大巴依的儿子——这个毡房的主人（人们称他是“花花公子”）和五六个人迎上前来扶我们下马，请进屋内。屋内陈设豪华，应有尽有。阿巴索夫问花花公子的父亲有多少牲畜，花花公子只说出各种牲畜的圈数，未能说出具体头数，可见他家财产之多。问全家人中有几人参加劳动时，花花公子说，他家有近20口人，但无一人参加主要劳动。所有牲畜全都是雇工放牧。整个赛力木草原都是他家的。在城里的财产也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心里明白，三区革命对这样的人没有什么触动。

主人很快端来了手抓羊肉。吃完，我们便告辞。走出毡房，阿巴索夫建议说：“我们再去一家贫苦牧民家，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如何？”

“正合我意。”我回答。于是我们便向远处一座又矮又小的简陋毡房走去。

毡房前，一位年迈的牧民正在做木工活，见到我们，他立即起身向我们躬身问安。此人身体魁梧、健壮，尽管他须发皆白，但双目有神。从他的衣着看，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他想请我们进屋坐坐，但又怕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招待我们，面有难色，不知所措。阿巴索夫体察到老人的难处，对老人亲切地说：“老人家，我们是来看望您的，可以进屋吗？”老人听后，笑眯眯地打开了房门。我们进了屋，坐在上首的一块旧线毯上。毡房内没有任何摆设，只有一些饭碗、一只烧水壶、一只铁锅和几床破旧的被褥。老人铺好餐布，捧了一捧包尔沙克摊在餐布上之后，又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清茶。

“孩子们，请喝茶。吃了穷人的包尔沙克可以强健牙齿。我们没有可宰杀的羔羊，请原谅。”老人的话不多，却使我们感到亲切。

临时陪同我们的三区高级法院干部莫卡巴依正要向老人介绍阿巴索夫和我，老人打断了他的话：“不用介绍，我认识他们。去年达列里汗回阿勒泰时，阿合买提江先生和他们两人来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送走达列里汗后他们返回伊宁去了。”他指着阿巴索夫说：“这位的名字叫阿布杜克力木。”又指着我说：“这位叫赛福鼎。”他笑着问大家：“对不？”

老人言谈和蔼，性格直爽，我们很想和他谈谈心。阿巴索夫先开了口：

“老人家，我们刚才去那座大毡房看了看。他们一家人不劳动，但吃好的穿好的，而你的情况和他们完全不同，你整年劳动，却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是巴依，我们是穷苦人，因为人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就不一样了。”老人回答说。

“你说得对，老人家，可是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问他。

“你问原因么，有人说，穷人和巴依是胡达造就的。这话我不信。巴依是依仗手中的大棒和皮鞭富起来的，穷人只好养活巴依，因为在巴依的背后有县太爷。赛力木的所有草原只属于住在城里的一位巴依所有，草原上的牲畜都是这个巴依的。说这儿的一切都是胡达创造的，那么为什么苏联那边的哈萨克牧民可以成为他们草原的主人，而我们新疆的哈萨克牧民就不能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呢？”老人愤愤不平地说。阿巴索夫听后激动不已，没有想到这位老人能讲出如此深刻的道理，他的话道出了广大贫苦牧民的心声。为了多听听老人的话，阿巴索夫转了话题：

“谈谈你自己的情况好吗？”阿巴索夫说完，拿了一支烟递给老人。

老人用我划着的火柴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感慨万分地说：

“我的情况一言难尽。我儿子、儿媳和他们的两个孩

子放牧着巴依的一圈羊，一年四季人不离羊群，可是得不到温饱。被巴依打骂是常事儿。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不光是我一家，绝大多数哈族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

“老人家，现在我们不是解放了吗，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莫卡巴依添了一句。

“解放？什么叫解放？也可能是你们解放了，巴依们、花花公子们解放了，他们比过去更自由了。是的，手中有刀枪的官吏被打倒了，可是，手中有大棒和皮鞭的巴依们仍然还在，而且比过去多了。新政府是限制他们呢，还是支持他们呢？从政府首脑的言行看，好象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我们总是看不到事实。国民党打倒了，但是，贫苦人民仍然过着贫苦生活，这怎么能说解放呢？”老人停下来看了看我们，缓了一口气，继续说，“请原谅，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因为阿布杜克力木是我们信得过的好人，心里的话，不给你们说，给谁说呢！”

老人的话使阿巴索夫感到莫大的安慰，他高兴地说：

“老人家，你讲得很对。穷苦人脖子上的大刀被消灭了，可是皮鞭仍然还在。今天你给我们上了一堂好课。”他拍了拍老人的肩膀，继续说，“你说得很对，今天我们得到的不是彻底的解放，我们一定要走苏联人民走过的道路，为彻底解放而奋斗。苏联人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了那一天，你和象你一样的穷苦人，就会当家做

主，成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整个草原将会是你们的，你们将会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到了那时，就不会有穷富之分了。老人家，你应该相信，幸福生活一定会到来。”

“太好啦，阿布杜克力木先生。这些话要是别人说，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你的话我相信，因为你是我们穷苦人的好朋友。”

阿巴索夫问：“你怎么知道我是穷苦人的好朋友呢？”

“人们都在这样说。”老人回答说，同时给客人续了茶，继续说，“请喝茶。我这个人直心快。今天见到你阿布杜克力木先生，还有你赛福鼎先生，我很高兴，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也是我们穷苦人经常谈论的问题。”老人又歉意地对阿巴索夫说：“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等你说的好日子来到后，请你们一定来做客。”

我们告别了老人。阿巴索夫和我一边走一边回味着老人的话。我说：

“老人确实给我们上了一课。人民在想什么，他们希望什么，这不恰恰证明了我们刚才在山顶上谈论的问题吗？”

“是的……”阿巴索夫好象找到了答案，显得格外满意。他说：“刀和枪，大棒和皮鞭，巴依和穷人，官吏和人民……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斗争。这位老人的话寓意深刻，很有哲理。”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决不能辜

负人民的期望！”

傍晚，我们告别了赛力木湖，上马往柯克沙拉走去。当我们登上达板后，总觉得有人在背后叫我们，我们不约而同地勒转马头再一次向赛力木望去。从果子沟山峰的云层中洒下的霞光给整个赛力木披上了一件五彩缤纷的轻纱，赛力木显得格外美丽多姿。我们停留了好久，终于勒转了马头。

在我们身后，赛力木湖以它那红润的面颊，含着微笑向我们告别。前面，被霞光映染的彩云轻轻抚摸着果子沟的群峰，美丽的果子沟热情地向我们伸出双手，敞开了宽广的胸怀。

故乡的桂冠赛力木，美丽的大自然和慷慨的大地，都以深情的微笑和我们告别。

## 北京喜讯

我们从赛力木返回柯克沙拉后，阿巴索夫因事提前返回伊宁，过了三四天，一天上午赛甫拉也夫同志带着阿合买提江同志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乘车来到柯克沙拉。信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请速回伊宁，有要事相商。”我立即把家眷安排了一下，和赛甫拉也夫一起离开柯克沙拉。

路上，我问赛甫拉也夫：“阿合买提江同志在信中说

‘有要事相商’，不知是什么事？”

赛甫拉也夫显得很激动，他说：“北平来人了！这人我还未见，可能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我一听，高兴地说：“共产党可能派联络员来了，我们终于盼来了，太好了。”小车上了公路后，尽管时速表的指针指向了90，我还嫌跑得慢，不停地催促司机加油，恨不得立即就赶到伊宁。

我们到达伊宁时，已是傍晚时分。我们径直到了阿合买提江同志家里。阿巴索夫、伊斯哈克拜克、热合木江等人正在等候我们。阿合买提江兴高采烈地讲：“你们来得正好，告诉你们一个重大喜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的联络员邓力群同志已经到达伊宁。黎明已经开始，曙光很快就要照临天山南北。”接着阿合买提江激动地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为之奋斗的解放、繁荣、强大的目的就要实现了。”我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高声地说：“真是天大的喜讯！实现中国人民、新疆人民宏伟理想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请看这封信。”阿合买提江同志将一封信递给我说：“请看看毛泽东同志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了何等的评价！”我双手接了过来，急切地默读起来。

毛泽东同志的信全文如下：

新疆伊宁特区人民政府

阿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订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了。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的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北平

毛泽东同志对三区各族人民进行的武装斗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三区人民流血牺牲所解放的这个地区赞誉为“伊宁特区”；将各族人民组织的三区政府赞誉为“人民政府”，并承认阿合买提江同志为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的首脑。尤其令人欢欣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明确肯定三区革命的意义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



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当我读到“我们衷心的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这一段话时，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泪水。毛泽东同志邀请三区革命的代表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共商国家大事，这对三区人民和全疆人民，是个极大的荣誉，这确实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接着，阿合买提江同志宣读了以他的名义给毛泽东同志的复信。

复信说：

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主席，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您的来信收到了，信中所提的问题是我省全体人民长期所盼望的。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胜利，也是我省和全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

我们无限感谢您来信中所提的问题，同时，我们高兴地表示同意派代表去北平。

顺致

敬意

特区人民代表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

我表示完全赞同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复信。

接着，我们初步研究了参加全国政协代表的人选和去北平的路线。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取道苏联去北平，这

就需要和苏方商谈。我们还研究了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汇报的三区情况报告。决定：关于军事情况的报告由伊斯哈克拜克准备；关于文化教育情况的报告由阿巴索夫和我准备；关于经济情况的报告由热合木江准备。同时，考虑到三区和全疆的情况，我们决定一切准备工作，和起程上路都要绝对保密。

我们在阿合买提江同志家用过晚餐后，阿巴索夫带我去拜访邓力群同志。路上，阿巴索夫告诉我：力群同志是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携带了一部大功率的电台取道莫斯科来到伊宁的。

我们走进力群同志的房间时，力群同志正和陈锡华、彭国安同志谈话。阿巴索夫将我和力群同志互相介绍过后，我们热情握手，互致问候。

力群同志概要地谈了他奉中央指示来伊宁的使命，谈了他来后会见了三区的领导同志的情况。力群同志最后说：“有你们的帮助，我相信一定能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向力群同志表达了读过毛泽东同志来信之后的激动心情，表示热烈欢迎力群同志带来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力群同志风度潇洒，性格豪爽，我们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虽然我们的谈话是短暂的，但非常投机，他那横溢的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力群同志将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复信报告中央后，中央要求我们上报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并在9月10日以前到达

北平。

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 伟大的历程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确定了代表团成员。团长是阿合买提江同志，团员是阿巴索夫同志、伊斯哈克拜克同志、达列里汗同志和罗志同志共五人。代表团还配有秘书、翻译和其他工作人员。剩下的工作便是准备汇报材料和制做服装。一个星期后，这些工作都准备就绪。代表团先乘汽车从伊宁去阿拉木图，再乘飞机经西伯利亚到我国东北边境，而后乘火车去北平。

以阿合买提江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决定在8月27日起程。上路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对行前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一切就绪。接着我们研究安排了代表走后家里的工作。决定家里的工作总的由我负责。具体分工如下：军队工作由列斯肯负责；公安工作由那比江负责，“新盟”的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由艾斯海提和赛甫拉也夫负责。

根据当时三区的形势和各阶层的思想动态，研究确定了工作方针，即：提高警惕，严防坏人捣乱；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团结；最根本的是注意做好军队工作，紧紧依靠军队。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随着三区革命拨正航向不断深入，以艾克木拜克霍加为首的一部分上层阶级官吏，对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日益不满。艾克木拜克霍加等人在革命初期是有一定贡献的，他们便以“功臣”、“英雄”自居，称王称霸，飞扬跋扈。为了使三区革命按照他们的意志发展，他们便不择手段地造谣惑众，恶毒攻击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甚至妄图挑起民族纠纷，扰乱社会，制造暴力事件，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除此，在知识分子队伍内部的团结也不怎么巩固，存在着不少矛盾。群众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局势不很稳定。尽管情况严重，为了让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安心去北平参加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为了维护三区广大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我愉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散会时，夜幕已降临。阿巴索夫来到我家，我们又进行了长谈。这夜阿巴索夫很激动。这是因为他就要去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就要见到多年来朝思暮想的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了。他欣喜若狂，象孩童一样手舞足蹈，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他眼含激动的泪水，不断地说：“我要去见毛泽东了！我要去见朱德了！我要去见董必武了！……”我想再和他具体谈谈他们走后的一些工作，他哪里听得进去呢！他打断我的话说：

“其他话不谈了。你知道吗？我要去见毛泽东！去见毛泽东同志了！……”我拿起笔想记些什么，他一把夺过我手

中的笔说：“你想写什么？什么都不要写。我们的问题就要解决了。你知道吗？我要去见毛泽东了！他会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你就等着好消息吧！”他沉醉在幸福的狂喜之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停地重复着自己的话。看他欣喜万分，我不忍心冲淡他欢乐的心情，但是考虑到他还有许多事儿要准备，看看夜已深了，我便对他说：“你明天上路，还要连夜赶路。准备准备，早些休息吧。”他不愿离开我，希望让我也分享他的欢乐，一直到深夜12时才离去。每当我回忆起阿巴索夫时，他在这夜幸福的笑脸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笑容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 烈士精神永存

1949年8月27日晚7时，代表团在浓浓的夜幕中分乘几辆小车，怀着胜利的喜悦，带着炽烈的希望出发了。

阿巴索夫行前和家人告别时，右手抱起毅力强，左手抱起柯尤木，将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一边轮番吻他们的小脸，一边说：“再见了，快快长大。”两个孩子用小手不停地抚摸着阿巴索夫的脸。谁曾料想，阿巴索夫走后不久，两个可爱的孩子就相继夭逝了。阿巴索夫离开伊宁后才出生的女儿，我们为她取名哈吉亚<sup>①</sup>，以示永远怀念

---

<sup>①</sup> 意为赠品，维吾尔女孩多取此名。

阿巴索夫。

他们走后，我们对外只说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去阿勒泰处理要事。两天前，阿合买提江同志在同盟组织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也暗示过他要去阿勒泰。因此一般人都以为他们去阿勒泰了。

代表团离开后，工作千头万绪，我们陷入了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沉重的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睡眠不足，对青年人倒是无所谓。使人不安的是，担心在伊宁发生乱子。对此我们必须严加防范。艾斯海提、赛甫拉也夫、那比江我们几个几乎每天都要碰一次或数次头。遇有重大问题，我们就一起处理，总算维持住了局面，未发生问题。

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不断将代表团的行止告诉我。四五天后，苏联领事馆告诉我代表团从阿拉木图乘飞机向新西伯利亚飞去的消息，以后又得到代表团从新西伯利亚飞抵伊尔库茨克的消息。此后就没有音信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仍无音信。

9月3日中午，因为要审阅《前进报》的一篇社论，我比平常早些就来到了办公室。下午两点整，伊犁发电厂准时拉响了汽笛。从30年代伊犁发电厂建成起，这个厂的汽笛就成了伊宁全体居民和公务人员作息的时间信号。过去我不曾留意过这些定时的音响，但是自从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应邀去北平后，由我主持这里的工作以来，大概是因为我觉得责任太重大的原故，我甚至连公务员是否按时

上班都特别注意了起来。正当我下意识地听着这音响时，我办公桌上的那架军用电话突然铃声大作。这是一架只用于紧急事务的电话。我一把抓起耳机，立时传来了值日军官的声音：“报告赛福鼎同志，苏联领事馆请您立即去一趟，有事相告。”我先是一怔，不由自主地自问：“什么事情这样紧迫？”我放下电话，将审阅过的稿子交给等候的编辑，立即乘车去苏联领事馆。

这是伊犁金秋季节极平常的一个日子，街上人群熙熙攘攘，街道两旁的林荫下到处堆放着瓜果和各种农副产品。空气中飘浮着烤羊肉的青烟。叫卖声、招徕声、马车的串铃声、汽车的笛鸣声，构成这座边境城市特有的音响效果。我的汽车穿过喧哗的街道，驶入了苏联领事馆。一位领事馆工作人员已在门内的草坪上等候着我。他客气地将我引入客厅。使我感到诧异的是，领事、副领事和一位领事馆的高级职员都严肃地站在客厅中央。见我进来，他们急步迎上来，但是没有平时热情的寒暄。领事和我握手后，请我入座。不等我开口，他便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电文，语气沉痛地说：“我们收到了莫斯科的一份急电。”接着他用俄语宣读了电文：“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为首的代表团所搭乘的飞机，途经伊尔库茨克市，飞抵外贝加尔山附近时，由于气候恶劣，不幸撞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

这个噩耗，如雷击顶，我顿感魂失魄散。刹那间，我

只能隐约听到他们在对我说着什么，模糊地分辨出他们沉痛的面部表情。显然，他们在解劝我，安慰我。我的意识犹如电闪，在判断，在推理，在作结论。“不会的，他们离开伊宁才只有几天，这些可敬的人们怎么会这么快就离开人间？不，绝不可能！”我失去控制地跃然而起，大声地说：“这绝不可能！”说着，从领事手里几乎是夺过了那份电文，飞快地默读了一遍。顿时，我的双手颤抖起来，泪水夺眶而出……

搭乘这架飞机的，除了代表团的五位成员外，还有秘书、翻译等工作人员：艾尼、阿布杜热西提、乌斯曼江等三位同志，其次是莫斯科派出的三位陪送官员和六名机组人员，共17人。

我匆忙离开领事馆，立即驱车去邓力群同志下榻处，告诉他这个噩耗。力群同志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完全震惊了，他神色突变，木然而立。半晌，他热泪盈眶，近似自语地说：“不幸的消息，太不幸的消息！”

理智终于克制了悲痛，我和力群同志商量决定，立即由力群同志向中央报告这个消息，等候中央指示。同时决定，暂时要对阿合买提江等同志遇难的消息绝对保密。除艾斯海提、赛甫拉也夫、那比江等同志外，这个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当时伊犁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

当晚，我们就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回电对阿合买提江等同志的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要求立即组成新的三



人代表团赶赴北平。根据中央指示，经与力群同志和其他同志讨论决定以我为首与涂治、阿里木江三人组团。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我要沿着他们的足迹去继续走完这段征途，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

1949年9月8日早晨6点15分，我们来到伊宁机场。在登机之前，苏联领事向我介绍了一位中等个头的中年俄罗斯人。他姓列索夫，是昨天从莫斯科专程前来陪送我们去北平的。

飞机发动了，只有五六个前来送行的人向我们挥手告别。尽管我们这次开始的是一次遥远的和不平凡的航程，但是不能有更多的人前来送行。因为我们这次的行动仍然是保密的。

飞机从伊宁起飞后，途经阿拉木图、新西伯利亚，降落在伊尔库茨克城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上。几位军官将我们迎接到宾馆。稍事休息后，主人设晚宴款待了我们。饭后，我们各自进入客房准备休息。苏方派来陪送我们的列索夫进来对我说：“有两位同志想给你说说阿合买提江一行遇难的情况。”我表示同意后，他领来了两位军官，一位是大校，一位是少校。他们概要地讲了飞机失事的情况。据他们说，阿合买提江一行乘坐的飞机从阿拉木图起飞后，经新西伯利亚飞抵伊尔库茨克。因气候异常，能见度极差，飞机在这儿停留了两天，第三天才飞行。当他们的坐机飞越贝加尔湖上空，准备升高飞越贝加尔山时，机

组向地面报告：“狂风大作，气候突变，飞机无法上升。”机场立即发出返航的命令。从飞机传来了回答：“开始返航。左转弯30度……60度……”突然电讯中断，电波消失。机场指挥人员预感到飞机失事，立刻派出飞机去空中观察，发现在一处深谷里有一片树木在燃烧，证明飞机失事了。他们遵照莫斯科的指令，派出一支登山搜寻队。搜寻队几经努力，费时一星期左右，也未能登上飞机失事的地点。据大校说：他们又组织了第二支搜寻队，近日即将派出。

这一夜对我来讲，真可谓难眠之夜。极度的悲伤，无限的哀思，似睡非睡，似梦非梦，送走了难眠的长夜。

第二天黎明，我们又起飞了。飞机从伊尔库茨克的一侧向南飞去。这时东方刚刚破晓，大地尚未苏醒。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灯光寥寥。我们飞行了一程，抵达贝加尔湖上空。我们在三千米高空飞过了黑沉沉的浩渺湖面。飞机继续上升，准备飞越贝加尔山脉。当飞机上升到4千米高空时，机下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林带和高山峡谷。这时列索夫将我领进驾驶舱，向我指了指机下的山谷说：“这就是飞机失事的地方。”说完他递给我一个望远镜。我用望远镜望去，只见山谷一处不大的地方树木已烧光，象是一片绿色的地毯上抹上一片黑墨。列索夫也用望远镜观看。突然，他紧张地说：“你注意看那几个黑点。”其实，我已注意到了那几个零星散落的黑点。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尸

体呢，还是烧焦的树杆？机长尤素波夫大尉告诉我：那些黑点可能是尸体，那些再远一点的可能是飞机的残骸。我再也不忍心看下去。神情恍惚地走出驾驶舱，木然坐在靠近舷窗的一个座位上。

第二天改乘火车继续南行，抵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后，受到从北平专程前来迎接的同志们的欢迎。

到了北平后，第二天周恩来同志便接见了我们。第三天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除毛主席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也在座。当我们走进客厅时，他们都起身肃立，为牺牲的烈士致哀。致哀毕，毛主席说：“以阿合买提江同志为首的新疆代表团全体成员的不幸牺牲，不仅是新疆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说罢，毛主席请我们入座。入座后，周恩来同志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我们听过董必武同志有关阿巴索夫同志的情况介绍，他是一位远见卓识的优秀青年。阿合买提江等同志的牺牲，确实使人深感悲痛。”

毛主席说：“欢迎你们。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你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在新疆牵制了近10万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贡献。”

毛主席还谈到了人民革命党。他说：“你写的你们党的情况报告我看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们党被停止，这

没有什么，你们应该想得开。事实上，你们党的干部、党员转入新盟后，都已成为新盟的骨干力量。新盟的成绩，也就是你们党的成绩。”说到这里，毛主席指着我们对周总理说：请你告诉王震同志，他们党的中央委员，都应吸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不久，就落实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

这天，董必武同志还专门来看望我们。他首先对死难烈士表示哀悼。接着说：“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同志是一位才华出众、很有抱负、很有希望的青年。他是新疆人民忠实的儿子。前年，在南京他和我几次短暂的接触，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告别时我们还说定，胜利后在首都见面呢。多可惜，他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人世，使人深感悲痛。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是的，这位人民忠诚的儿子，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了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所追求并为之英勇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里，民族平等已经实现，民族团结日益加强。如果阿巴索夫在天之灵有所感应的話，他一定会对我们如此辉煌地实现了他的遗愿而欢欣。

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离开我们已有38个年头了，但是新疆人民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忘怀这位英雄的战

士，他们将永远缅怀自己这位忠诚的儿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封面  
目录  
正文